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历程探析

程 萍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1170)

[摘要]本文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百年发展历程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四个历史时期为分水岭,梳理了其先后呈现出的兴起、迟滞、重兴、创新等特点,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紧密联系,并重点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先进性、与群学的亲和性解构其顺利中国化的原因,以期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时代回应。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历程;中国化

[作者简介]程萍,女,江苏涟水人,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文化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教育社会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数智化时代高职院校‘精准思政’改革探索”(项目编号:2024BSKY26)。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3001>

[中图分类号] C91-0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产物。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深度嵌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理论体系逐渐完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逐渐彰显。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阐释中国经验”的时代使命更加艰巨。鉴于此,有必要梳理其百年发展历程,在分析思辨中增强理论自觉和范式自觉。

一、出场形态:全球化与本土化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出场形态蕴藏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两个维度。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由工业革命或大机器工业生产推动的自由竞争阶段,空前残酷的阶级压迫激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社会环境动荡不安,社会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由此引发许多学者对社会的思考,探寻实现社会团结、维护社会秩序、解决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方法。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在其著作《实证哲学教程》中首次提到“社会学”一词,针对性地对其概念进行详解及学科框架构建,社会学这一学科应运而生,并在争鸣探索中,逐渐形成了韦伯取向的社会学(或称解释社会学)、涂尔干取向的社会学(或称实证社会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或称批判社会学)。韦伯、涂尔干、马克思作为社会学古典三大家,被称为社会学真正意义上的三位创始人,或曰理论源头。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及方法论引导下产生的社会主义科学,其从哲学角度分析人与社会的关系,看待社会发展,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秩序,具有极强的批判性、开放性、科学性、全面性及发展性。其主张以唯物史观为研究角度来认识、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变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进行社会建设,不仅严谨客观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存的矛盾及带来的发展弊端,对资本主义思想进行深刻批判,而且立足于现实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在对历史情况进行总结归纳及未来发展进行科学展望的基础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为社会建设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新方法、新模式。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凭借明确的引导性、先进的理论性及科学的实践性,不仅使其在经典时期同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形成了明显区别和不可替代的学术地位,而且也使其在经典社会学之后的发展历史中保持了旺盛的活力,其理论内容和文化内涵被许多社会学家及后继者扩充与延伸,在各国的传播与发展中实现了本土化,构建和呈现了不同的民族特色。在俄国,形成了以列宁、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形成了以李大钊、瞿秋白、李达、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欧洲,出现了卢卡奇、马尔库塞、列斐伏尔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或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二、发展历程:兴起、迟滞、重兴、创新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主张,不仅要批判旧世界,更要建设一个新世界。依据“旧世界(资本主义社会)—新世界(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类型,学术界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历程简要概括为两种,即“革命批判性的形态”和“维护建设性的形态”,二者既不同又统一,“革命批判性形态只是它的一种过渡性的、预备性的形态,维护建设性的形态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可以说是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遵循这一脉络,本文结合细分的历史时期进行梳理,了解新中国成立以前马克思主义革命批判性形态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研究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维护建设性形态社会学在中国的崛起和新发展。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兴起阶段

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萌发,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必然结果。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达、毛泽东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在寻求救国图存之路的过程中,成长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中国化的最主要代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极为重要的开创者。陈独秀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以“科学归纳法作根据”而具有科学的精神,因而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社会学”来进行宣传的。李大钊在《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中提出,社会学得到唯物史观这一重要法则,“使研究斯学的人有所依据,俾得循此以考察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而易得比较真实的效果。这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会与对于史学上的贡献一样伟大”。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没有把历史唯物论划归哲学,而是划归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因为他认为,哲学是研究社会思想的。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读书储能观、社会改革观、阶级斗争政治观、革命实践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犯过“左”或“右”的错误,但总体来说,中国共产党坚持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探索中国社会区别于俄国社会的基本属性和发展规律,最终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推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中华民族随着新中国

的成立迎来伟大复兴的曙光。所以,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应用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宣传与推广,实现了由部分地区特殊发展到全面范围内普遍发展的有效转变,由机械式、教条化使用到根据中国社会实际发展情况灵活化应用的有效转变,在这一阶段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单独理论研究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发展历程。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迟滞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处于百废待兴的局面,但中国社会学还是遭遇了近30年的禁闭:在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工作中,社会学系的相关专业被撤销或合并到其他专业中,社会学的相关教育工作者也被调往其他专业领域,不仅西方社会学思想被拒之门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很少被提及和研究。

然而,虽然这一时期社会学学科发展的中断,造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术层面的“失声”,但就实践层面来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其实并没有“离场”,主要表现为: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来解决新中国成立初期所面临的关于稳定社会运行、消除社会矛盾、规范社会秩序、维护人民利益、处理阶级关系的相关问题,坚持以辩证的态度、开放的视野、发展的眼光、联系的观点、实事求是的原则看待社会发展,注重使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寻求脱离社会困境的对策。换言之,毛泽东是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特点,灵活应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来领导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可以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与延续的重要象征,毛泽东思想代表着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重兴阶段

1978年之后,随着社会学的学科恢复与重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缓慢起步中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作出学科回应,确切地说,其以“建设一个新世界”为皈依的“维护建设性的形态”在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两个维度得到了一定发展,但相较而言,前者因为历史原因基础薄弱,明显滞后于后者。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探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系统性并不太强,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借鉴历史

学研究范式,结合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时代背景,考证早期共产党人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之间的渊源,通过梳理他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独特贡献。二是在学科建构和发展视域下,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一般性学理问题的研究,如对历史使命与学科地位、基本思路、理论辨析、研究对象、社会模型(即社会经济形态)、研究重点、社会功能等的探讨。三是对学科本土化的专门探讨,比如陈国庆、李巾运用历史分析和归纳研究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作了概括;姜方炳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是“文化自觉”的具体体现,而“文化自觉”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现中国化的一种必需;免平清指出,坚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由边缘走向中心、提升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之一;郑杭生呼吁系统、深入地总结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丰富内容,澄清对它的偏见和片面理解;刘少杰重点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薄弱的原因,提出应明确认识其本质特点和历史地位,在空前有利的机遇下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

与此同时,党的第二、三、四代领导集体在实践中探索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灵活应用的重要象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这种自上而下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倡导和应用,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有效的学术动员。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创新阶段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脉相承地对新挑战与新机遇进行了全面分析,提出“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以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进行统一的规划和明确的指导,在实现创新与守正结合的基础上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基于历史比较,近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总体来说内在细胞得到一定激活,“现场回应”越来越积极,在问题意识、分析视角、研究方法、理论构建等多个层面呈现较明显的转型与提升。

景天魁、赵万里、张明波、刘少杰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进行的脉络化、全景式、宏观性梳理,依然是极为重要的基础

研究,在学界得到了较为一致的认可。沿着这一轴线,学者们在更广阔的视阈下,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再出发进行了展望,如沈东深入剖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清冷低沉”的原因,主张应加强面向实践的“进行式、未来时”的“增量理论”生产。与此同时,一些交叉性、应用性、创新性研究开始出现,开始彰显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的广泛适用。

三、发展动因:先进性与亲和性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是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最重要、最坚定的力量源泉,除此以外,还有两大原因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

(一)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先进性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其实践论的基本立场、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超越以涂尔干为代表的实证社会学和以韦伯为代表的理解社会学,打通了实证与理解的藩篱。涂尔干把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指出应根据社会事实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及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并主张将功能分析与因果分析区分开来,在分析自杀、宗教等社会现象中取得重要成果,在推动社会学成为独立的基础学科方面做出重大贡献。韦伯在社会学研究中以人的社会性行动作为核心,认为人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由无数的人组成,人的主观意识和实践行为会影响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因此在社会建设中应高度重视人的作用,在保持社会学客观中立的同时从人的主观视角分析解决社会问题的对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将批判作为重点内容,其对涂尔干和韦伯的社会学思想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指出其理论中的不足之处并肯定其中的先进理论,由此架构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社会学理论。马克思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将社会的客观现实及人的主观能动性联系在一起,反对涂尔干不变革社会关系的主张,指出当前的阶级矛盾是造成社会问题的主要因素,要解决该问题必须集结无产阶级的力量进行阶级斗争,调整经济结构;同时对韦伯的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并针对性地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经济因素在形成社会、政治结构中的优先作用,重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马克思这种最深刻、最彻底的批判视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展现了更为显著的全面性、优越性、先进性和发展性,这种鲜明特质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能够流传至今并迅速实现中国化的根本原因。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的亲和性

群学是我国的古典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群学之间存在较高的亲和性,这是其中国化进程快速推进的重要原因。其一,两者在群众观点方面具有一致性。马克思认为人是具有社会性质的动物,即其处在社会现实中,组成并影响着社会关系,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独立的个体才能产生相互的联系,社会关系才能汇总成为整体的社会。这种观点与群学中的“人之生不能无群”高度契合,人之所以能为人,主要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通过社会关系产生了群体。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群学均强调社会关系对人的重要性,认为要从群体角度来分析人、理解人。其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和群学“以民为本”的思想具有高度的同向性。马克思指出人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群众通过参与社会活动创造历史、发展历史、改变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发展好是社会发展的应有之义,针对资本主义思想引起的阶级矛盾,要进行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民为邦本”“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等传统思想影响着群学的发展,群学把“民”作为“群”的基本组成部分,认为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群”要强大必然要爱“民”,兼顾每个“民”的利益,为其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民”要更好地生活、实现自身的人身价值,需要去“合群”“能群”“善群”,在此基础上做到“乐群”。其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都重视群体与个人间的公私关系。马克思指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相互影响的,只有协调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才能高效取得社会利益,对资产阶级独占和垄断生产资料的行为进行了强烈批判与谴责,提倡生产资料公有制。群学受中国传统“崇公”思想观念的影响,主张先公后私,即将群体利益放在首要地位,鼓励人们树立利他主义的群德。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公私观和群学的群己关系都强调公共的利益,具有一定的亲和性。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的高度契合使其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获得坚实的思想基础,一经传入就被中国广大先进知识分子研究与探索,对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迅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语

“与时俱进”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应该进行持续的探索与完善,保持自身的“与时俱进”。立足两个大局,中国马克思主义社

会学面临更多时代性课题,需要继续加强中国化、时代化探索,进一步钩沉、发掘和深耕。

参考文献:

- [1]王力平.出场学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再诠释[J].社会科学辑刊,2014(2):47-51.
- [2]常向群.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方法[J].社会学研究,1990(2).
- [3]刘少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地位与理论贡献[J].中国社会科学,2019(5):78-99,206.
- [4]郑杭生.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3):11-15.
- [5]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卷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 [6]郑杭生.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N].光明日报,1985-7-29.
- [7]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8]李大钊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9]李玲.青年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社会学史探源[J].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2021(2):15-25.
- [10]周一平.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贡献[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6):1-7.
- [11]王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历史使命与学科地位[J].中国社会科学,1995(2):195-196.
- [12]常向群.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思路[J].社会学研究,1989(3):46-56.
- [13]张向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辨析[J].社会学研究,1986(4):107-113.
- [14]王训礼.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对象[J].临沂师专学报,1988(2):1-7.
- [15]常向群.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社会模型——社会经济形态[J].社会科学战线,1989(1):203-206.
- [16]于光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历史与当前研究的重点[J].社会科学辑刊,1981(4):5-11.
- [17]郑晨.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社会预测功能[J].社会,1984(4):3-6.
- [18]陈国庆,李巾.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60-64.
- [19]姜方炳.“文化自觉”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必要性[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0(4):51-55.
- [20]奂平清.“理论自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郑杭生的社会学理论立场及意义[J].甘肃社会科学,2012(3):9-14.
- [21]刘少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历史与机遇[J].江海学刊,2008(5):124-131.
- [22]刘国胜,肖霞.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现实逻辑[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40(5):20-24.

[23]赵锋.涂尔干的两个道德理论及其社会学问题[J].
社会科学研究,2021(3):116-129.

[24]王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解韦伯的社会学
思想[J].甘肃社会科学,2005(1):120-122.

[25]孙旭,孔扬.马克思对涂尔干现代社会道德与价值
共识重建的超越[J].社会科学战线,2021(7):246-251.

[26]景天魁,高和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发展
100年[J].社会科学战线,2021(2):33-47.

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xist Sociology

CHENG Ping

(School of Marxism, Jiangsu Maritime Institute, Nanjing Jiangsu 211170,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century-ol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xist sociology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and taking the four historical periods as the watershed, this paper sorts out its characteristics of rise, delay, revival and innovation, reveal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Chinese Marxist sociology, and focuses on deconstructing the reasons for its smooth sinicization from the advanced nature of Marxist sociology and the affinity with group studie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response of Chinese Marxist sociology to the times.

Key words: Marxist sociology; development; sinicization

新时代青年政治引领的价值意蕴、核心要义与实现路径

卢佳丽,杨贵兰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政治引领是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时代特征与青年发展需要实施的战略举措。以政治方向、政治认同、政治信仰与政治担当为重要内容,进一步深化青年政治引领,不断提升青年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仅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要求,更是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青春力量的根本要求。立足时代特征与青年发展需要,以强化理论武装筑牢青年政治引领的思想根基;以观照青年现实解决新时代青年的思想困惑;以创新方式方法增强育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以实践养成锤炼青年政治引领的行动自觉。

[关键词]青年;政治引领;核心要义;价值意蕴

[作者简介]卢佳丽(1999—),女,新疆图木舒克人,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杨贵兰(1999—),女,贵州思南人,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3002>

[中图分类号] D432.6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年政治引领,在2019年4月2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以及在2023年6月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多次强调要切实抓好青年的政治引领工作,要着力加强对广大青年的政治引领,“引导广大青年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这些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明确了加强青年政治引领是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和首要目标。新时代加强青年政治引领,不仅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关键举措。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社会思潮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正在加深,多元文化相互碰撞,西方错误政治思潮的渗透、网络信息的复杂多样,使得青年一代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面临着诸多挑战。因此,着力加强对广大青年的政治引领,具有极端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加强青年政治引领的价值意蕴

青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作为党的事业的继承者和开拓者,承担着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因此,高度重视并着力加强对广大青年的政治引领,具有多重战略意义。

(一) 筑牢新时代青年思想防线的必然要求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正经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青年一代的思想和价值取向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国际视野看,全球思想文化交融交锋呈现新态势,各种敌对势力从来没有停

止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争夺青少年是其重点领域。西方极端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借助新媒体技术进行隐蔽传播,对我国青年进行价值观渗透、误导,部分青年在价值选择中出现困惑,过度追求物质享乐而忽视精神成长,甚至出现价值认同危机。从国内发展看,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带来的价值多元、利益分化等现象,使部分青年在理想与现实、权利与义务、小我和大我、民族与世界等关系认知上出现偏差,“躺平”“佛系”“摆烂”等亚文化现象的滋生,反映出部分青年奋斗精神的弱化与主体意识的缺失,这不仅影响青年个人的成长与发展,也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构成潜在挑战。因此,全面加强政治建设,着力优化思想引领成为党的青年工作的突出重点。

(二) 巩固和扩大党执政青年群众基础的战略考量

政治引领作为现代政党的重要功能,通过教育、宣传等手段传播政治理念和主张,以先进思想引领社会成员,增强政治认同,从而巩固和扩大政党的社会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强政治引领的重要性,指出这一工作不仅有助于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还能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汇聚强大的政治力量。党中央确立的“党管青年”原则,彰显了党对青年群体的殷切关怀和充分信任,指明了新时代青年需紧密团结在党的旗帜下,与党在目标和行动上保持高度契合。在党的引领下,青年一直是党的得力助手和核

心力量,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在新时代背景下,确保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揭示了党与青年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青年作为“最积极、最有生气”的社会力量,是党执政的重要资源,其思想认同和支持是党执政资源的重要基础,也是确保党长期执政稳定地位的关键。因此,必须从筑牢党长期执政的青年群众根基这一战略高度着眼,切实将团结、帮助并重视青年摆在突出位置,为确保党的事业血脉永续、后继有人提供根本性保障。

(三) 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实践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战略任务,这一重要论断既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又立足新时代赋予青年成长的新内涵,明确了青年政治引领的根本目标在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民族复兴使命担当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新时代加强青年政治引领既是适应青年成长规律和中国青年运动特点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新时代好青年培养目标的实践路径。政治引领通过系统的政治教育和实践活动,使青年深入理解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建立对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引导青年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伟业。当代青年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主体,其命运与民族复兴进程深度交织。加强青年政治引领的价值体现在:其一,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才梯队,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可持续的青春动能;其二,通过深化青年对国家发展大局的认知,促进个人价值与国家需求的有机统一,使“小我融入大我”从自觉行动升华为价值追求;其三,激发青年的历史主动精神,使其在服务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实践中实现人生价值。

(四) 促进青年自身健康成长的内在需求

青年时期是塑造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关键阶段,如何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三观,帮助青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走上正确的政治道路,使新时代的青年能够以敏锐的眼光洞察世界、以清醒的头脑担当使命、以坚定的信念保持定力,是关乎国家未来发展的根本性课题。处于人生“拔节孕穗期”的青年,思想活跃、学习能力强、接受新事物快,但是,这一群体在知识体系搭建、价值观念定型及心理成熟度方面尚处于动态发展进程,导致其在自我管控、行为约束及理性判断方面能力较弱,容易受到外界复杂因素的影响。在当前全球化加速的时代背景下,多元思潮碰撞,境外势力通过文化渗透、信息操控等手段推进意识形态领域的“软对

抗”。在这样的环境中,部分青年在理想信念、政治信仰和政治意识等方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动摇和滑坡,表现为政治判断力、领悟力和执行力的不足,以及政治参与积极性和获得感的下降。这些问题不仅影响青年自身的成长,也对国家发展构成了潜在风险。政治引领通过理论武装和实践引导,帮助青年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清醒的政治定力,抵御不良思潮的侵蚀。

二、新时代加强青年政治引领的核心要义

政治引领是引导人们形成一定政治观念的活动,政治观念来自阶级、政党关于政治目标和政治路线的政治思想,本质上是引领人们在思想和行动上与阶级、政党所确立的政治方向和政治道路保持一致。新时代青年政治引领,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教育宣传、组织动员等方式,对青年的政治方向、政治认同、政治信仰、政治担当等进行培育和引导,实现对青年政治价值观的塑造和政治行为的调适,使其认同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新时代青年政治引领的核心要义包括把准青年政治方向、增进青年政治认同、坚定青年政治信仰与强化青年政治担当。

(一) 把准青年政治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的第一位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因此,政治方向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对青年政治引领的核心内容,主导着政治引领的总方向。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指明了政治方向和政治道路。因而,新时代青年政治引领的本质就是引领青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强对青年的政治引领就是要把青年的政治方向引导到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方向上来。这是由于:其一,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助于确保青年与党和国家事业同向同行。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只有把准政治方向,青年才能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明确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将个人的理想追求与党和国家的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成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其二,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利于青年抵御错误思潮的侵蚀。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各种错误思潮和不良价值观不断涌现,对青年的思想观念产生冲击。把准政治方向,能够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自觉抵制错误思潮的侵蚀。其三,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助于青年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更好地理解和贯彻党和国家的决策部署,成为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的“国之强者”。

(二) 增进青年政治认同

认同是指个体或群体在心理上对某一对象产生的归属感和情感依附。它涉及自我认知和社会定位,回答“我是谁”“我们是谁”的问题,从知、情、意三个层面呈现出“同一和等同”“确认和归属”“赞同和同意”的态度。政治认同是认同的重要维度,属于政治建设的范畴,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前提,其核心要素包括:制度认同、政策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等等。新时代青年政治引领的根本任务是增进青年政治认同,这既是把青年团结和组织起来的重要凝聚力量,又是激励和促进青年共同奋斗与前进的重要思想基础,同时还是青年群体共同遵循的价值目标和理想归宿。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交织的背景下,增进青年政治认同具有三重意义: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薪火相传;增强社会凝聚力,抵御错误思潮侵蚀,形成团结奋斗的思想共识;激发青年奋斗动力,使青年主动投身国家建设,在民族复兴征程中贡献青春力量。面对全球化、信息化带来的价值多元化挑战,新时代青年政治引领必须增进青年政治认同,构建系统化的政治认同培育机制。这不仅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凝聚社会共识、激发青年奋斗动力的关键所在,更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一代代青年接续奋斗中变为现实的根本保障。

(三) 坚定青年政治信仰

政治信仰是个人对政治体系、政治理念和政治价值的深刻认同和坚定支持,并且坚信在该政治制度中个体可以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只有坚定政治信仰,青年才能自发自觉地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主动担当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因此,坚定政治信仰是新时代青年政治引领的灵魂所在。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年政治信仰的树立,指出新时代青年坚定政治信仰就是要“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而青年作为社会发展的先锋力量,其政治信仰的坚定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走向。

青年正确的政治信仰必须建立在对科学真理的深刻理解上、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规律的清醒认识上,以及对我国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新时代加强青年政治引领必须始终将青年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引领青年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理解青

年的责任与担当,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性认同和坚定追随,从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思想上与党同心同向、在行动上与党同频共振。

(四) 强化青年政治担当

担当是责任的主动承担与实践履行,是将使命感转化为行动力的关键能力。政治担当则具体表现为对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的自觉承担和切实践行。青年正处于人生成长的关键期,政治担当的培养不仅关乎个人发展,更关乎国家未来。只有具备强烈政治担当的青年一代,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勇挑重担,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

从历史维度看,青年始终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先锋力量。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实践表明,青年群体的政治觉醒与担当精神深刻影响着国家发展进程。新时代赋予青年新的历史使命,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青年唯有强化政治担当,才能在复杂环境中保持政治定力,在时代浪潮中找准奋斗方向。从青年自身特点看,青年思维活跃、创新力强,具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和变革精神,但也容易受到多元思潮影响。强化政治担当,能够引导青年在思想激荡中坚定理想信念,在价值碰撞中校准人生坐标,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从社会地位看,青年既是新时代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一代代青年接续奋斗,而政治担当是青年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精神纽带。只有强化政治担当,青年才能自觉扛起时代责任,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关键领域主动作为,使青春奋斗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

三、新时代加强青年政治引领的实现路径

当前,国际国内环境的复杂多变影响青年政治认知,网络空间中亚文化动摇青年政治信念,西方错误思潮的渗透弱化青年政治认同,新时代青年呈现新变化与新特点,政治引领工作面临着种种挑战。为此,青年政治引领工作必须不断探索,创新引领方式方法,拓展引领途径,构建完善的引领体系。

(一) 强化理论武装:筑牢青年政治引领的思想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青年作为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必须通过理论武装保持思想上的统一、意志上的坚定和政治站位的提升。夯实青年群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需要构建系统化、层次化、时代化的理论武装体系。

其一,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教育青年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青年群体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通过系统学习这一思想,青年能够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历史使命,明确“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其二,用马克思主义信仰引导青年坚定政治信仰。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青年能够深刻理解“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明确“为绝大多数人谋幸福”的历史使命,从而坚定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念。其三,用党史学习教育增进青年政治认同。党史学习教育是青年群体汲取智慧、增进政治认同的重要途径。党史中的光辉事迹和英雄人物,如五四运动的青年觉醒、长征精神的艰苦奋斗、脱贫攻坚的无私奉献等,能够激励青年以史为鉴、以史为师,树牢政治原则,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勇担使命。其四,用“中国梦”激励青年强化政治担当。“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景,也是青年群体奋斗的方向和动力源泉。青年作为实现中国梦的主力军,必须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情怀,主动承担起时代赋予的责任。

(二)观照青年现实:解决新时代青年的思想困惑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历史证明人类社会所开展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现实生活中个体的利益。从心理学上讲,一个人政治思想、价值观方面的问题,大多源于困难得不到解决、需要得不到满足。新时代青年成长于经济社会快速变革的时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然而,在物质条件极大丰富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承受着来自学业、就业、婚恋、住房、心理健康等多方面的压力。教育部数据显示,2023届高校毕业生规模达1158万人,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调查发现,有10.8%的青年学生认为自己“压力很大”,43.3%的青年学生认为“压力较大”,《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揭示18~25岁群体焦虑检出率达26.3%。这些数字背后,是青年在“内卷”与“躺平”间的艰难抉择,是“理想丰满”与“现实骨感”的剧烈碰撞。这些现实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仅会影响青年的个人发展,还会直接影响到青年学生对党和国家的看法、评价。

新时代做好青年的政治引领工作,必须全面准确了解青年在思想情感、学业、升学就业、经济生活、人际关系、政治参与、权利表达等方面的困惑困难和诉求需要,回应青年关切,解答青年疑惑,解决青年困难,满足青年合理诉求,实现好、维护好、发

展好青年的利益。因此,加强青年政治引领,不能仅停留在理论灌输和口号宣传上,而必须观照青年现实,聚焦青年的实际需求,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困惑和困难,使政治引领真正走进青年的内心,增强他们对党和国家的信任与归属感,自觉将个人奋斗融入强国建设,真正成长为可堪大任的“国之强者”。

(三)创新方式方法:增强引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在新时代背景下,做好青年政治引领工作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青年政治引领工作是针对青年这个特殊群体开展的实践活动。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新时代青年群体,是做好青年政治引领工作的起点和基础。当代青年成长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时代浪潮中,被称为“Z世代”“网生代”“数媒土著”,具有思想独立、思维活跃、兴趣广泛、视野开阔等鲜明特征,习惯于碎片化阅读、互动式交流、沉浸式体验,对传统的单向灌输式教育方式接受度较低。这些特质与以往任何时代的青年群体都迥然不同。因此,要提高青年政治引领工作的针对性,必须正确认识和分析青年群体这一教育对象,深刻把握青年群体的心理、思想、行为等基本特征,必须创新引领的方式方法,使其符合青年的时代特征、政治观念和行为习惯等具体特点。

只有不断创新方式方法,才能真正做到以青年为本、与时俱进,使政治引领工作既有高度又有温度,既有意义又有意思,最终实现入脑入心的效果。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创新:一是运用新媒体技术,打造“互联网+政治引领”新模式。通过开发青年喜爱的短视频、动漫、H5等新媒体产品,在B站、抖音、小红书等青年聚集的平台开展互动式宣传。二是创新活动形式,将政治引领融入青年喜闻乐见的活动中。如开展“红色剧本杀”沉浸式体验活动,组织“青年说”主题辩论赛,举办“我与祖国共成长”微视频创作大赛等。三是建立分层分类引领机制,针对大学生、企业青年、新兴领域青年等不同群体特点,量身定制引领方案。如对大学生可侧重理论研学,对企业青年可突出岗位建功,对自由职业者可强化价值认同。四是发挥朋辈引领作用,培养一批政治过硬、能力突出的青年骨干,通过“青年影响青年”的方式增强引领效果。需要注意将政治引领与解决青年实际问题相结合。

(四)注重实践养成:锤炼青年政治引领的行动自觉

实践是青年内化政治信仰、外化价值行动的根本路径,也是实现政治引领从“知”到“行”转变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实践育人的价值,多次强调,青年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这为新时

代青年政治引领指明了方向。新时代青年政治引领兼具政治性与实践性双重导向,不仅要求青年树牢政治原则、坚定政治信仰,更需通过实践锤炼政治本领,将党的政治要求落实到学习生活细节中。这种双重导向决定了政治引领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必须通过实践将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

从“知”到“行”的转变,需要青年将外化的政治认知内化为思想自觉。这种内化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实践不断深化的过程。实践是青年将理论与现实结合的重要途径,也是将政治信仰转化为政治行为的核心环节。通过参与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基层调研等活动,青年能够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检验理论的科学性,增强对党的政治要求的认同感。实践是锤炼青年政治担当的重要途径。青年通过实践提升政治素养和行动能力,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在实践中,青年不仅能够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能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感受党的政策成效,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实践是实现政治引领根本目标的关键环节。政治引领的最终目标是将青年培养成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自觉将“小我”融入“大我”,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实践的支撑。通过实践,青年能够将政治引领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物质力量,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154.
- [2] 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45.

[3] 余金金,龚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内涵、理论特质及其价值意蕴[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4,10(4):47-57.

[4] 于昆.习近平关于青年政治引领重要论述:生成逻辑、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J].思想教育研究,2024(8):3-8.

[5] 靳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J].红旗文稿,2020(20):4-8.

[6] 朱凯玲.新时代青年政治引领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23.

[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93.

[8] 邱海峰.新时代青年学生政治引领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9.

[9] 董亮,何伟,杨梓.红色记忆与政党认同——以西藏红色旅游中的大学生旅游者为例[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7(2):161-169.

[10]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5-1.

[1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12] 本报评论员.在培养造就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执政骨干队伍上积极作为[N].人民日报,2023-3-4(5).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6.

[14] 1158万背后的就业关切[N].中国青年报,2023-3-10(1).

[15] 沈壮海.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2015[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254.

[16] 2022年国民心理健康调查报告:现状、影响因素与服务状况[EB/OL].http://psy.china.com.cn/2023-08/09/content_42453596.htm,2023-8-9.

The Value Implications, Core Essence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Youth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the New Era

LU Jia-li, YANG Gui-lan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46, China)

Abstract: Political leadership is the first and foremost issue in you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and it is a strategic initiative implemen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on the ba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the needs of youth development. Taking political direction, political identity, political belief and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as important contents, further deepening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of young people, and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ir political judgment, political comprehension and political execution are not only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but also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s for uniting the power of young people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young people, we will strengthen the theoretical armament to buil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youth political leadership; address the ideological confusion of young people in the new era by looking at the reality of young people; enhance the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ng people with innovative ways and means; and refine the action consciousness of youth political leadership by practicing and nurturing.

Key words: youth; political leadership; core essence; value implication

廉洁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探赜： 理论耦合与现实路径

谭娅琪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 410082)

[摘要]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显著成效,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为应对新时代腐败问题新挑战,国家出台系列政策推动廉洁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廉洁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两者之间具有价值理论合辙、教育内涵交融、问题境遇契合以及实践教育相通等彼此耦合的要素。当前大学生廉洁教育存在淡漠化、功利化、碎片化等现实困境,高校应积极探索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应然路径,以优化融入主体、营造融入氛围、丰富融入内容、改进融入方式、完善融入机制等实践路径,切实推动廉洁教育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培育具有廉洁素养的新时代大学生,构建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廉洁教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策略

[作者简介]谭娅琪(2002—),女,湖南怀化人,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研究”(项目编号:XSP20YBC084)。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3003>

[中图分类号] G641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坚定不移地将反腐倡廉作为党的重大政治任务,持续不断地推动其深入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开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习近平在2024年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新时代十年坚持不懈的强力反腐,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问题依然存在,并呈现年轻化、高学历化、形式多样化的新特点。腐败问题在高校中也有所体现,影响了校园政治生态和健康发展。

为应对这一挑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如《关于加强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和《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等,强调高校在廉洁教育中的责任和使命。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化高校廉洁教育,促进廉洁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引导青年学子增强廉洁自律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廉洁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 廉洁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1. 健全预防腐败体系之重要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不仅严厉惩治腐败,更注重构建反腐倡廉的教育、制度和监督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从源头上治理腐败。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将廉洁教育融入思政教育,是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基础工程。党中央坚持采取标本兼治、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旨在从源头上有效治理腐败,打破腐败现象的循环怪圈。

2. 培养党和国家建设者接班人之现实需要

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全球正面临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以及社会信息化的多重挑战,大学生群体易受复杂信息影响,存在政治信仰模糊等风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青年兴则国家兴,

青年强则国家强”,作为国家的未来,他们更应具备清正廉洁的品格,自觉抵御不良风气。高校应将廉洁教育融入思政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增强廉洁光荣的意识,以抵御不良风气,肩负起培养国家栋梁的重任。

3.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之应然要求

作为立德树人重要阵地,思想政治教育要在“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这个核心点上持续用力。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严峻性增强,廉洁教育成为思政教育的必要补充。它不仅丰富了思政教育的内容,还通过实践教学增强了教育的实效性,实现了专题教育与系统教育的统一,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道德素养和品格塑造。

4.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基础

《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发挥廉洁教育基础作用,强化形势教育、纪法意识、警示震慑、示范引领。廉洁教育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对党百年奋斗经验的凝练,也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创新动力。通过廉洁教育,大学生能够自我审视,激发内在变革力量,服务于社会。廉洁教育的实施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关怀,以及对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的深思熟虑。

(二)廉洁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性

1.理论价值不谋而合

廉洁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多个维度上展现出高度的契合性,为两者的融合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条件。

从知识谱系来看,两者均以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根基。在理论基础方面,两者共同遵循“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强调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廉洁品格。价值导向的同源性上,二者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倡导廉洁自律、服务人民等理念,与集体主义价值观一脉相承。育人目标的契合性上,廉洁教育侧重培育法律遵守与诱惑抵制能力,思政教育注重道德观念与法治意识塑造,虽各有侧重,但均以学生全面发展为宗旨。这种理论同源性目标一致性,使两者在知识体系构建中形成互补,共同服务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2.教育内涵交融并进

在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廉洁教育均面向高校学生,且在教育内容上存

在重合之处。如思政教育涵盖的理想信念塑造、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等,与廉洁教育中的法制与诚信熏陶、社会公德树立等相辅相成。教育功能的互通性也是两者融合的重要支撑,两者在思想引导、品质培养、行为规范以及社会承担方面存在显著交集。两者都致力于塑造学生的思想观念、培养廉洁正直的人格品质,并引导学生恪守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纪律。

3.问题境遇彼此契合

当前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与廉洁教育在教育环境和现实问题上面临显著契合性。新媒体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使信息的传播变得快速而及时,各类移动客户端成为社会舆论的催化剂和传播文化、交流思想的重要平台,不仅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思想引导的新挑战,也使网络成为腐败扩散的新渠道。社会转型期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共同影响两者。二者均面临学生思想淡漠、教育实效不足的困境,且在课堂内容融入新元素、师资专业素养提升等教学资源建设中存在相似难题。这些共同挑战为二者融合提供契机,促使双方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相互借鉴、协同完善。

4.实践教育相得益彰

思想政治教育与廉洁教育在实践教育领域展现出相得益彰的态势。二者参与主体均以高校学生为核心,便于共同开展社会实践、企业实习等活动,高校可统筹资源支持实践项目。双方均注重联合社会各界建立实践基地,强化参与主体衔接。在实践方式上,思政教育的活动组织经验与廉洁教育的案例教学优势相互借鉴,二者还借助网络平台开展在线互动、共享经验。此外,双方在评价体系与保障机制建设中相互学习,共同完善工作体系,推动实践教育深度发展。

二、廉洁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与归因

(一)廉洁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困境

1.淡漠化困境

首先,一些高校领导在全局规划性工作中存在一些看法和问题,导致廉洁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建设过程中存在一些淡漠化困境,其中包括认为廉洁教育仅限于党员干部,与其他师生无关的错误看法;以“干部得病群众吃药”为由,不认可廉洁教育的必要性的错误看法;将廉洁教育视为“泛化”反腐工作,认为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是“小题大做”的看法等,导致高校融入建设工作中出现部分领域关

注度缺失的境况。

其次,部分师生在参与度上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师生对廉洁教育缺乏重视,参与热情和主动性不足;有的师生难以将廉洁理念转化为自觉行为,廉洁修养面临考验;也有师生政治认同和廉洁信念存在动摇,难以形成内在驱动。

2. 功利化困境

教育部将高校廉洁教育目标定位为培养职业道德,仅关注职业伦理规范,忽视大学生廉洁人格与精神追求,存在明显功利主义倾向。这导致教育内容局限于法规知识传授,忽略行为与思想培养。此外,部分高校仅针对特定专业学生开展教育,违背人的全面发展理念。并且部分高校考核评比中泛行政化倾向严重,管理上重形式轻实效,既未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也未能对接社会反腐实践,使廉洁教育沦为表面工程。

3. 碎片化困境

高校廉洁教育面临显著碎片化挑战,贯穿内容、对象、方式及管理等环节。教育内容上,多数高校未将廉洁教育纳入正式课程,仅在思政课中零散涉及,内容单一且聚焦反腐,忽视理论与历史文化,更新滞后;少数开课高校也偏重反腐,未形成包含理论、案例、心理的完整体系。教育对象覆盖局限于公务员类专业,忽视理工科及研究生,难以全周期普及。教育方式依赖传统讲授,缺乏参与式、案例式等互动教学,未善用社交媒体等新渠道,与学生生活脱节。教育管理上,多部门协同不足,目标分歧、分工模糊,缺乏校级统筹,资源浪费严重;监测评估与奖惩机制缺失,影响教育科学性与协同性。

(二) 廉洁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归因

1. 高校廉洁教育重视程度仍欠缺

高校对廉洁教育的重视程度,直接决定了其在教育体系中的位置与成效。当前,部分高校对廉洁教育的认知存在狭隘化倾向,将其简单等同于反腐败教育,忽视了廉洁文化、廉洁价值观等更深层次的培育。这种认知偏差导致了对廉洁教育重要性的低估,进而在资源投入、课程设计、师资配备等方面显得力不从心。高校领导层的决策导向、教师的认知态度以及学生的参与热情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使得廉洁教育在生态构建上显得支离破碎,难以形成系统性、持续性的教育合力。

2. 高校师资队伍建设和有待优化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承担着神圣使命。专业的师资队伍是廉洁教育有效实施的基础。然

而,现实中,高校廉洁教育师资普遍面临数量不足、专业性不强的问题。而廉洁教育任务往往被分配给思政课教师或辅导员,他们虽具备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基础,但缺乏专门的廉洁教育训练和实践经验,难以深入理解和传授廉洁教育的精髓。此外,专业课教师在廉洁教育中的角色定位模糊,他们往往更侧重于专业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专业课程中蕴含的廉洁教育资源,导致廉洁教育与专业教学“两张皮”,难以形成协同效应。

3. 高校廉洁氛围营造有待提升

高校廉洁氛围的营造,对于激发学生廉洁意识、形成良好校风学风至关重要。列宁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同理,廉洁意识的培养离不开廉洁知识的“灌输”,然而,当前高校廉洁教育活动往往缺乏针对性,采取“一刀切”的教育方式,导致教育效果大打折扣。同时,廉洁培育载体的运用也显得单一且传统,难以吸引学生的兴趣和参与。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已成为学生获取信息、交流思想的主要渠道,但高校在网络平台利用方面尚显不足,缺乏创新性和互动性,难以适应新时代学生的需求。

4. 高校廉洁教育机制不健全

健全的教育机制是廉洁教育持续发展的保障。但高校廉洁教育在考评机制、制度体系、师生协作以及认知管理等方面均存在不足。高校过于追求论文、课题的功利化评比,使得德育的初心使命“喊在口头,落实在文件”,众多高校显现出“无经费、无教材、无课程、无师资”的四无现象。考评机制的缺失使得廉洁教育的效果难以量化评估,缺乏有效的反馈和激励机制。制度体系的不完善则导致廉洁教育在教学内容、方法、考核等方面缺乏统一标准和规范。师生协作机制的缺乏使得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沟通不畅,难以形成教育合力。而认知管理机制不足使各部门在目标定位、资源配置上缺乏协同,无法构建高效的教育生态系统。

三、廉洁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新征程,高校应持续深化并优化廉洁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融入效果。具体而言,高校需围绕廉洁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交融点,聚焦当前存在的关键问题,灵活把握教学规律,采取精准施策、综合施策的策略,推动二者在育人过程中的深度融合,使高校主体在认知上拒腐明廉、行动上弃腐倡廉。

(一) 优化融入主体: 多方主体自主协同参与

1. 优化师资水平及结构比例

“建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是大学建设的基础性工作。”高校需选拔政治素质过硬的教师,通过理论研讨与教学培训强化专业素养,并将廉洁教育成效纳入绩效考核,激发教师参与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对教师来说,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自己首先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要求教师在日常教学中自然融入廉洁元素,实现教书与育人的统一。

2. 引导多方专业人员配合协作

高校廉洁教育的有效实施,离不开校内各部门之间的紧密协作以及校外资源的有效整合。整合教育主管部门、高校多部门(教务处、纪委等)、社会专家及学生群体资源,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教育主管部门制定政策规划,高校将廉洁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同时邀请法律专家、企业家通过法规解读、职业经验分享增强教育实践性,构建平等师生关系以形成教育合力。

3. 增强教育对象廉洁自律意识

大学生作为廉洁教育主体,需激活自律机制以释放内生动力。当前高校存在失信、学术不端及学生组织“模拟腐败”等问题,需充分尊重学生主体地位,鼓励党员骨干带头自主创新学习形式,如在北京成立第一个大学生廉洁社团,学生自发组织廉洁教育活动,努力为在校大学生廉洁素质的提高服务,得到了各方面的肯定。引导学生实现“应廉”到“想廉”的认知升华。

(二) 营造融入氛围: 特色廉洁环境区域融合

1. 挖掘廉洁元素融入校园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广泛开展文明校园创建,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格调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高校可通过创新举措将廉洁教育融入校园文化:利用走廊、教室等空间布置廉洁标语、雕塑,营造文化氛围;挖掘校史、校训中的廉洁元素,融入校庆、开学典礼等活动,通过主题演讲、艺术创作赛等激发学生参与;发掘本土廉洁资源,以实地考察、纪录片等形式构建特色廉洁文化地图,并推广校园廉洁模范,以先进事迹强化教育效果。

2. 实施家校联合廉洁共育工作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因而家庭的教育作用不容忽视。高校定期举办家长廉洁培训班,邀请专家讲解教育要

点,鼓励家长参与学校廉洁活动,如观看廉洁影片、主题班会,通过分享家训与现代案例,建立家校合作长效机制,凝聚育廉合力。

3. 强化社会廉洁教育引导功能

社会环境作为廉洁教育的广阔背景,其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且深远的,需政府与各行业协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氛围。政府需加大廉洁教育投入,媒体强化舆论监督,通过举报奖励、法律制裁形成制度威慑。高校联动企业、社区开展廉洁实习与宣传活动,构建社会协同的廉洁教育生态。

(三) 丰富融入内容: 高校廉洁教育校本素材扩充

1. 挖掘思政课教材中的廉洁元素

大学课堂是思政教育前沿,思政课为主阵地。深入挖掘教材中的廉洁元素,使其自然地融入思政教育,增强教育实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作为主体课程,虽现框架未明确廉洁内容,但与其耦合度高,可为主要依托教材并适当增补廉洁内容。其余教材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均含丰富廉洁知识与思想,可分别剖析腐败根源、梳理党史廉洁品格、分析反腐倡廉形势、融入历史廉政经验,既融合廉洁教育于“两课”,又丰富思政教育内容与方法。

2. 在课程思政中融入廉洁教育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在专业课中渗透廉洁理念,采用案例讨论、模拟实践等形式,在新生入学、专业实习等关键节点嵌入廉洁教育,实现显性与隐性教育互补。

3. 挖掘拓展廉洁案例教学资源

高校廉洁教育需结合实践,不能仅限于课堂。高校可与司法监察部门合作,共享案例资源,同时利用网络平台整合资源,实现共享互利。案例选择应典型、针对性强,贴近学生实际,涵盖“硬腐败”与“软腐败”,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认识复杂腐败现象。此外,挖掘特殊廉洁案例资源,如构建英烈楷模案例库,结合校史资源,如中国矿业大学融合古代廉政文化与校风,利用明朝于谦《咏煤炭》中的“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的古代廉政文化与校风建设相结合,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廉洁知识,树立崇高信念,全面提升廉洁教育效果。

(四) 改进融入方式: 教学模式与方法多维拓展

1. 线上线下相结合: 利用新媒体合力教学

全媒体时代,网络成为高校廉洁教育前沿。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廉洁教育应利用“互联网+”,结合传统课堂优势,运用廉洁短信、微电影、慕课等新平台,创新话语表达,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构建“两微一端”网络教育平台,拓宽渠道,设计专题网站和活动,实现线上线下无缝衔接。同时,设立隐私保护的线上咨询室,为学生提供及时正确引导,确保廉洁教育深入有效。

2.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创新实验室”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廉洁教育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考验。理论上,我们既可借鉴西方的政治理论与中国古代廉政智慧,更需深入马克思主义廉政建设思想。实践上,要注重理论向实践的转化,通过实景教学、社会实践等方式,让学生亲身体验廉洁文化。为此,可构建思政教育场景创新实验室,利用VR技术生动展现廉洁教育内容。同时创新“行走式课堂”模式,引领学生参与社会实践项目,如“三下乡”“西部计划”等,安排学生到关键岗位实习,直观感受廉洁的重要性,促进廉洁内化为行为准则,让廉洁教育真正走进学生心中。

3. 课内课外相结合:打造第二课堂串联教学模式

高校应将廉洁教育融入课堂与课外实践,形成紧密联系的教学体系。教师需精心策划课程,确保深入实效;团委等部门应协同设计多样课外活动,如知识竞赛、主题演讲等,巩固课堂成果。实施“课内结合课外”模式,组织参观廉洁教育基地等社会实践,安排学生参与论坛等,与各界交流,拓宽视野,让学生走出思政小课堂,走进社会大课堂,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五)完善融入机制:管理体制与保障机制改革

1. 健全统一灵活的管理体系

高校应将廉洁文化融入大学章程和管理规章,特别在日常教育相关文件中,需结合管理、监督,构建稳定有效的组织制度,确保活动规范、连续。管理协调上,学校党委应引领校、院、部“多层次”协同机制,确保党委领导、纪委监督、部门协同、师生参与,有效防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倾向。确保每一环节都得到有效执行,确保廉洁教育实现全面覆盖和深入实施。

2. 构建协同配合的保障机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高校需建立资金保障制度,确保廉洁教育有足够物质支持。面对复杂社

会环境和大学生特点,需提前规划准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同时,要明确责任担当,构建监督反馈机制,促进意见交流,优化舆情监控,及时应对风险,不断改进教育方法,为大学生成长和社会廉洁建设提供支撑。

3. 建立长效追踪的考评机制

要建立高校廉洁教育长效追踪考评机制,教育部门需设立合理评价框架,搭建评估平台,进行系统性评估。考评体系应涵盖知识理解、认同内化、行动外化三维指标。建立评价反馈机制,实时掌握学生动态,提供支持和指导。马克思指出,“把人和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可结合绩效管理和奖励机制,关心师生合理利益,构建一套具备显著激励作用的奖励机制,激励践行廉洁价值观,提升整体廉洁文化素养。

四、结语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廉洁文化建设,强调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将廉洁教育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是培育时代廉洁新人的关键途径,也是高校预防腐败滋生、坚守教育初心的重要手段。

进入新时代,廉洁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情况将更加复杂,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出既与时代特征契合,又和主流价值一致的新路径,我们坚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努力下,廉洁教育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融入将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为培养具备高尚道德品质和廉洁自律精神的新时代大学生以及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做出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N]. 人民日报, 2024-1-9(1).
- [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 人民日报, 2017-10-28(1).
- [3] 习近平. 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 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N]. 人民日报, 2024-5-12(1).
- [4] 中办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22-2-25(1).
- [5] 王智, 霍朋. 微信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困境及对策[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7(4): 37-39.

- [6] 彭波,张聰,倪弋.迈出建设网络强国的坚实步伐[N].人民日报,2019-10-19(1).
- [7] 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9(1).
- [8] 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6.
- [9]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5-3(2).
- [10]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 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王沪宁陪同考察[J].党建,2022(5):4-6.
- [11] 中国青年网.2017 全国大学生廉洁领袖夏令营在北京联合大学开营[EB/OL]. http://news.youth.cn/jsxw/201707/t20170719_10329490.htm,2017-7-19.
- [12] 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9(1).
- [1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84.
- [1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78.
- [15]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97.
- [16] 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6(6):4-12.
- [1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39.

An Exploration of Integrating Integrity Education into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oretical Coupling and Practical Pathways

TAN Ya-qi

(College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China)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laces a high priority on anti-corruption effort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but the situation remains severe and complex. To address new challenges posed by corruption in the new era, the government has introduced a series of policies to integrate integrity education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tegrating integrity education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both necessary and feasible. There are several key elements that align these two areas: value theory convergence, educational content integration, situational fit, and practical education alignment. Currently, integrity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faces issues such as indifference, utilitarianism, and fragmentation. Universities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effective pathways for integrity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focusing on optimizing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creating a supportive environment, enriching educational content, improving methods, and enhancing mechanisms. This will help effectively integrate integrity education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steri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integrity qualities and contributing to a clean and positive soci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integrity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tegration strategy

解构与重塑: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价值范式的超越

陈雨昇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价值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突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认知误区,为全球现代化提供了新的价值选择。在价值主体层面,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体系,解构了西方现代化以资本增殖为核心导向构建的“资本至上”的价值体系,强调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重构了以人为本的价值逻辑。在价值客体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倡导“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走出一条绿色可持续的现代化道路,化解了西方现代化的“生态悖论”。在价值观念层面,中国式现代化提倡以全人类共同价值破解西方鼓吹“普世价值”的霸权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现代化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西方现代化;资本逻辑批判

[作者简介]陈雨昇(1998—),男,新疆塔城人,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哲学基础研究”(项目编号:XJ2024J00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新时代‘红石榴’文化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疆实践研究”(项目编号:XJ2025G055)。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3004>

[中图分类号]D61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现代化独属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拓以西方现代性思想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迫使世界一切国家与民族想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遵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接受资本价值尺度的唯一性。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中国式”,摒弃了西方现代化的弊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破除了西方现代化“唯一性”的价值理念,重构了现代化价值尺度,为世界现代化贡献了中国范式。

一、价值主体:从“资本至上”到“人民至上”

中国式现代化秉持“人民至上”理念,坚持将人民作为价值创造主体与价值评价主体的客观现实,坚持现代化成果由人民共享,重构了西方“资本至上”的价值理念。

(一)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价值主体

西方现代化本质上是以资本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其核心价值在于资本的无限增殖,倡导资本是价值增长的主体与源泉。在工业化进程初期,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成为资产阶级实现资本扩张的桎

梏。这种矛盾促使资产阶级发起社会变革,变革对广大劳动者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劳动者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中获得形式上的自由;另一方面,却因与传统生产资料的强制分离,沦为资本原始积累的牺牲品。结果导致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劳动者沦为资本附属物。

资本成为价值主体导致“目的与手段的颠倒”,人从发展的目的沦为资本增值的工具。以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体系中,资产阶级将追求利润最大化奉为最高价值准则。为实现这一目标,资本家通过雇佣劳动制度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将工人阶级的劳动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工人的劳动价值被工资的形式掩盖,资本成为价值源泉。当国内剥削空间趋于饱和,资本对利润的无限渴求便驱动资产阶级突破国界限制,将殖民扩张与世界市场开拓作为新的剥削场域,由此形成了以资本掠夺为特征的全球经济秩序。西方资产阶级凭借着生产力的极速发展,依靠经济、科技、军事的优势把控其他民族和国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命脉,通过殖民扩张、贩卖人口、资源掠夺等方式进行强取豪夺,迅速积累资本。在当代,金融资本的扩张更是将资本的逐利性发挥到极致,股票市场、期货交易、金融衍生品

等工具层出不穷。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增殖机会,资本成为一切价值的来源,物化了一切事物,一切东西都变成了可以交易与买卖的对象,甚至是爱情、良心、信仰等等,使得人们的社会关系甚至家庭关系也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在以资产阶级主导的西方现代化社会中,资产阶级“目的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资本支配人民,劳动不过是创造价值的手段,不断扩大人们的物欲,形成“拜物教”,一切以金钱至上,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限制人们全面发展,强制人们按照资产阶级的需要提升某方面的能力,人民成为西方实现现代化的“手段”。总之,资本主导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就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资本是价值的实现,人民只是资本资源配置的人力资源,财富更不会由人民共享。

(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价值主体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无产阶级运动的重要形式,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带领与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经历艰难建设起来的。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在现代化建设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生产关系中人民占据主导地位,人民的创新精神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同时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民是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主体,人民的生产力发展程度决定着对自然资源的运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因此,人民是现代化的价值和成果的创造者。

中国式现代化的目的是实现现代化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2020年年底中国实现了现行标准下全部人口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灭了绝对贫困。2021年起实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立防止返贫动态监测机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持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突破,开创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将人的本质回归于人,实现人自由全面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必须紧紧围绕“人”,以人的发展为目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

出“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以人民幸福作为现代化成果的检验标准,人民即是价值创造的主体,又是价值评价主体。

二、价值客体:从“生态悖论”到“生命共同体”

西方现代化以资本逻辑为导向,致使价值客体严重扭曲。自然界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人的存在意义被异化为对物的无尽追逐,造成生态危机。中国式现代化遵循客观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重塑合理价值客体。

(一)西方现代化的“生态悖论”困境

西方现代化的核心是资本的无限增殖,必然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无限索取和生态环境的肆意破坏,从而形成资本逐利无限性与生态资源有限性的冲突,产生发展的“生态悖论”。

从工业革命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通过无节制地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式迅速地实现工业化。然而,西方资本主义通过以劳工剥削与生态攫取为特征的发展模式,不仅完成了资本增殖的物质基础构建,更通过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网络,使自然生态系统被迫服从于商品化生产的需要。在此过程中,传统社会的生态平衡机制被彻底打破,代之以追求无限利润为导向的资本化自然观,这种异化关系最终导致人类文明发展陷入生态悖论。资产阶级将自然资源作为不变资本投入生产过程中,而这一过程只是服从资本增殖的现实需要。自然界被异化为可让人类赚取更多利润的有用性工具,这也导致人类对自然资源不合理的开发与利用,对于自然资源的索取远超于人类的需要,“不断突破维持自然界独立价值的界限”。

在资本主义运行机制中,资本积累的客观要求与资本的无限增殖形成双重驱动。这种资本扩张逻辑不仅促使民众消费异化,更导致生态系统的代际补偿机制持续失效。在资本逻辑下,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也必然带来生产产品的过剩,产品无法交换以致资本无法达到增殖目的。资本家为推动产品快速交换便制造需求,便向民众传播资本消费理念,创造异化消费,向民众灌输只能以消费产品获得身份认同与价值认同,把人的本质物化于消费之中。资本不断激发人的贪欲,用工业制品彰显人身份的尊卑,将民众套入享乐主义的陷阱,推动“生产—消费”的快速循环,加速资本积累。而消费快速更迭的结果则是由劳动人民利用自然资源生产的商品又以废弃物的方式回归自然,导致自然资源的浪费,因此,资本增殖的无限性与自然界恢复的有限性的矛盾必然引发全球生态危机。资本的本

质决定资产阶级不会承担本应该由资本承担的修复与保护生态的责任,通过对国家机器的掌控,以法律的形式,将原本资本的责任转嫁给全社会共同承担,而原本归于全社会的生态福祉则归于资产阶级私人所享有,资产阶级私人占有的性质与生态保护的社会性质之间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突破西方现代化的“生态悖论”,将人的本质复归于人,使人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生成与确认自己的本质。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人与自然共同构成生命共同体。一方面,人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与生活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自然地理条件是社会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必须依靠自然界才可以存活。另一方面,人作为区别于动物的自然存在物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通过实践活动根据自我意识作用于自然,改造自然以满足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马克思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马克思通过实践活动揭示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动态发展过程,强调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双向互动,体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的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深刻把握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重构了人类文明的存在根基,人的全面发展与生态系统的永续性形成了价值耦合。自然价值评判标准发生根本转向,即其存在意义不再是资本增殖的工具理性范畴,而升华为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载体。人的自我实现路径也从消费主义的物化生存模式,转向以劳动创造美好生活,摆脱了人在资本逻辑下“对物的依赖”,明确了人与自然之间价值关系的相对性,动态平衡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使人与自然回归于相依相存的共同体。

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框架下,规定生产资料归广大人民群众所有,现代化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由此,良好自然环境所产生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等正向价值,同样作为社会公共福祉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企业与组织得以绿色健康发展既能获得效益同时也承担社会责任维护生态环境,资本私人占有与生态环境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得以化解。自然界既是人们赖以生活的客观世界,也是人们创造价值的

客体来源。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性、实践性地正确处理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揭示了资本逻辑发展下西方现代化掩盖自在自然真实价值的屏障,实现了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

三、价值观念:从“普世价值”到“全人类共同价值”

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强势兜售“普世价值”观念,妄图以其为自身的全球扩张与霸权行径披上“合法”外衣。中国式现代化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致力于世界价值体系的重构,为全球价值体系的完善贡献独特力量,为世界发展开辟全新路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西方资本主义大肆宣扬“普世价值”观念

西方“普世价值”根植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自然权利理论,主张“人生而平等自由”。在西方语境下,“普世价值”一般包括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博爱”等内容,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在西方国家大肆推广与宣扬,被确认为世界范围内具有统治权的话语体系,实质上是为资产阶级全球扩张与掠夺的“合法性”辩护,维护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利益。

“普世价值”本质上是服务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统治与扩张。一是,资产阶级价值“正确性”和“合法性”的依据,“普世价值”本质是将资产阶级特殊利益包装为“普遍真理”的意识形态。西方经济学认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是人的“自然状态”。资产阶级将本阶级的特殊利益抽象地形成一套“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价值体系,且将其美化为“人类的永恒追求”,使人们深信这套理论体系并作为精神蓝图,使“普世价值”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观念外壳”。二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霸权的现实途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通过剥削与殖民掠夺积累巨大原始资本,构建了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世界格局,将发展中国家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为维护西方霸权地位,持续主导国际秩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迫使任何民族与国家必须遵守“普世价值”观念,实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加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序列,扩大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这不仅使“普世价值”所构建的抽象世界更具有“真理性”力量,而且能够消解非西方文明的主体性,维护西方资本主义的霸权地位。三是,资本主义文明终极性的伪证。“普世价值”将资产阶级观念抽离客观规律无限拔高并普世化,认为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宣扬为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民族、所有

国家的绝对真理,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具有通往现代化的唯一性。

(二)中国式现代化构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西方资本主义标榜现代化道路只有一条,必须遵守“普世价值”观念,才是人类社会唯一出路,掩盖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忽略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立足于“两个大局”,提出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共同价值理念。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而且是对世界文明进步的客观现实的科学把握,阐明了全球发展的交往内核与价值共识。

中国式现代化倡导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共同发展环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先于中国进入现代化,但西方现代化是充满剥削与掠夺的,并凭借先发优势对非西方国家肆意掠夺甚至发动战争,宣扬“普世价值”妄图对他国进行全面控制。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世界各国需求合作而非对抗来实现各自的发展目标,和平与发展是保障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和平是发展的基础,发展是和平的实现。只有拥有和平的国际环境才能保障各个国家能够有发展的客观环境,而每个国家只有得到平等的发展机会与权利,才能更好地保证国家间的和平。各国之间保持和睦友好的邻里关系,全球才能共同繁荣。

中国式现代化践行公平与正义的国际发展原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充斥着“强国必霸权”丛林法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强大实力,建立一系列不平等国际制度,霸凌行为愈演愈烈,使得国际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公平、正义”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内涵,倡导打造公正、平等的国家秩序。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既是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诉求,也是化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出现的风险与挑战的必然要求。只有建立可靠秩序与基本原则,国家之间的纠纷才能得到妥善处理,各国才能得到协调发展,破除西方主导的狭隘价值体系,维护国际公平与正义。

中国式现代化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国际价值理念。西方将其民主、自由观念包装成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文化的“普世价值”,但本质上是少数利益集团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其民主往往被金钱、权力所操纵,是精英主导的民主,自由更侧重于个人主

义的绝对自由,忽视个人与社会的影响。“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理念,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与历史背景,从而有着不同的民主制度,对民主与自由都有着不同的理解,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这打破了西方“普世价值”资本主义制度的独断的民主与自由,强调各国根据本国实践,制定出能够推进本国社会发展的民主制度。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念尊重各国在现代化实践中特殊性 with 一般性的辩证统一、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四、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通过解构西方现代化价值体系的资本逻辑的宰制性,将现代化的核心从“物的积累”转向“人的解放”,从“自然的掠夺”转向“生命的共生”,从“文明的霸权”转向“价值的共建”,从而打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单向度扩张的历史宿命,证明现代化并非单一的价值移植或模式复制,而是扎根本土实践,尊重历史规律、回应人类共同关切的创造性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价值主体的人民性、价值客体的共生性、价值观念的包容性,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为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引与实践方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价值共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自觉与全球担当。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63.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42.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8-179,207-208.
- [4]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24-7-22(1).
- [5] 王冠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价值超越与实践路径[J].浙江学刊,2024(6):12-18.
- [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425.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How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ranscends the alue Paradigm of Western Modernization

CHEN Yu-sheng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00, China)

Abstract: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as systematically reconstructed the value system of Western modernization, breaking through the cognitive misunderstanding that “modernization equals Westernization” and providing a new value choice for global modernization. At the level of value subjects, the people-centered value system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as deconstructed the “capital-first” value system built by Western modernization with capital accumulation as its core orientation. It emphasizes common prosperity and all-around human development, thus reconstructing the value logic of putting people first. At the level of value object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dvocates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life for man and nature”, blazing a green and sustainable path of modernization and resolving the “ecological paradox” of Western modernization. At the level of value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promotes the use of universal human values to counter the hegemonic idea of Western-proclaimed “universal values”, and it advanc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ontributing Chinese wisdom to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estern modernization; critique of the capital logic

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青年发展的价值引领与价值意蕴

李晓彤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江苏南通 226011)

[摘要]党的二十大举国关注,世界瞩目,它的召开对我国进一步发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至关重要。党的二十大精神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时代意义和实践意义。青年人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习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寄语青年,要求全党将青年工作视为国家发展的首要任务,要视同于战略性工作,这体现了党中央对广大青年发展的高度重视。党的二十大精神蕴含着引领青年成长和发展的独特力量,贯彻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有助于引领当代青年成长、成才,有助于促进青年培养自信心、进取心和使命感,这充分体现了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青年发展的价值意蕴。

[关键词]精神力量;中国式现代化;主力军;先锋力量

[作者简介]李晓彤(1997—),女,山东淄博人,法学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3005>

[中图分类号]G64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引言

新时代青年躬逢盛世,恰值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既承载着强国建设的时代重任,又怀揣着实现中国梦的远大理想。党的二十大擘画的宏伟蓝图,为当代青年成长成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其精神内涵正持续激励着广大青年与时代同频共振、为未来砥砺前行。忆往昔,革命先烈以热血青春铸就今日之和平盛世,他们在烽火岁月中用奋斗描绘出青春最绚丽的篇章;看今朝,作为民族复兴的生力军,新时代青年更应赓续红色血脉,深学细悟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胸怀民族大义。青年人要有将个人理想融入集体理想的自觉性,用青春的力量推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真正使党的二十大精神成为指引青年成长成才的思想灯塔和行动指南。

一、党的二十大精神内涵阐述

(一)党的二十大召开的意义

党的二十大召开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征途中重要的里程碑,是我们顺利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同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发起挑战的重要议程,是我党的行动纲领,它指引着我们党和人民共同实现社会主义新的胜利。党的二十大被广大群众所关注,主要原因在于人民深深切感受到了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复兴都源于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而且,未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又和党的二十大密切相关。党的二十大举世瞩目,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国

际影响力,中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世界发展需要中国,世界要重新认识今天的中国,就要认识如今的中国共产党,就要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

党的二十大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希望,放眼全局,它深刻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并以科学的视角规划了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核心任务和重大政策,对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具有重大意义。

(二)党的二十大精神内涵

学习领悟党的二十大精神,对于把握其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具有深远影响,可以促进宣传学习党的精神的热潮,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群众团体中落地生根,结出理想果实。

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有助于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国家助力国家发展的首要政治任务。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需要领悟“两个确立”的真实含义和决定性意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带领下,经受新征程中的任何风浪和考验,对我们而言都是时代赋予我们宝贵的财富,经历风雨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生活的高品质提升。其次,要更加坚定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同时在思想、政治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最后我们要深刻领悟过去五年里我党在新征途中作出变革的意义,深刻领会最新理论成果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时刻将其作为自己践行使命的行动指南,时刻谨记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式推进民族复兴重任,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和中国特色。新时代新征程要求我们必须深刻理解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本质,把握时代要求,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开创新局面。

知为行之始,学为用之先。只有贯彻学习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通过全面把握、和深刻理解,坚持和运用好其立场观点和方法论,在实践中指导和推动工作,从而充分彰显党的创新性理论和实践性力量,引领我们以奋发向上的精神品质努力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

二、党的二十大精神对青年发展的价值引领

洞悉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齿轮,可以看出国家的发展离不开青年群体的主导力量。“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寄托于青年人的发展,只有青年群体以身作则投身于社会事业的建设中,才能促进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青年的发展离不开精神力量的支撑,历史实践足以证明,精神的力量足以推动青年人不断成长与进步。

(一)新时代新征程新主题的引领

党的二十大报告内容基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制高点,对我国今后的发展作出了初步的判断,并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发展计划,开启了社会主义发展新征程,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的新的发展目标。历史方位和征途目标的确认为我国青年的奋斗之旅确立了新的坐标。青年在新时代新征程和新主题的引领下,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明确自身肩负的责任,齐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担,以奋斗目标为原点,切实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到实处,在日常的工作学习中积极扮演现代化建设接班人的重要角色,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切实将自身的力量凝聚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各项工作中。

新时代背景下,青年的发展镌刻着时代的印记,新时代的主题点明了青年发展的要点,为青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主题始终围绕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不断激励着青年不懈奋斗,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与党的发展目标保持高度一致,青年一代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强劲力量,要时时刻刻心系祖国、心系人民,要保证祖国的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与党一道与民一心,共同造就新时代新伟业,才能让激昂的青春乐

章永远奏响在祖国大地。

(二)党的理论创新最新成果的引领

党的二十大报告凝聚了最新理论成果,并在先前的理论成果基础上,再次对最新理论成果作出新的阐释形成新的论断。新时代新时期,青年的发展需要先进思想、科学的方法论的引领,以及党的最新理论成果的指引。可以看出,党的指引为年轻人的成长指明了新的方向,党的二十大精神是观念转变和理论创新的产物。永恒不变思想和理论会迫使我们陷入“形而上学”的陷阱中,导致思想僵化,不知变通。所以,思想理论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青年要科学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涵,才会深刻理解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这样,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才能引领青年夯实思想新航标,助力青年茁壮成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全新诠释,更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起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精神力量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制胜法宝,也是引领青年成长成才的思想武器。青年在发展的过程中要时刻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最新理论成果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高度理解“六个必须坚持”,深刻把握其立场观点,自觉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把我国打造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任务当作自身不可推卸的责任,进而把握成长成才的真谛。

(三)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任务的引领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这样宣告。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国家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的,国家的每一次发展,都离不开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青年同志的不断奋斗。报告中提到的“现代化强国”“中国式现代化”无不彰显着国家奋斗的决心与使命。“中心任务”的提出不仅为当代青年确立了新的奋斗目标,而且为其规划了新的实现路径。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党和人民的精神硕果,引领着青年树立崇高的精神追求,奋力把这种精神力量转化为青年成长成才的精神支柱。

党的中心任务凸显了“一切为了人民,以人民

为中心”政治立场,回望历史,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全心全意对人民负责的决心。正是这种“以人为本”的价值指引,中国共产党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这是一条惠及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之路,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道路,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也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体现了现代化的普遍特征,更展现了中国特色,打破了现代化模式固定不变的迷思,让所谓“西方现代化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谎言成为历史笑柄,也为后发展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多种选择,深化了对人类社会从传统迈向现代这一普遍规律的认识。所以,中国式现代化是人民的选择,更是时代的选择。处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下,青年发展面临着更多的选择和机遇,同时也会面临更多挑战。党的二十大精神将帮助青年们强化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脚踏实地地走好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

青年在成长成才的过程中要做到自立自强,在历史主动精神指引下深刻理解人民主体作用,要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把握历史规律,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努力谱写成长成才征途中的新篇章。

三、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青年发展的价值意蕴

精神是一个国家赖以长期生存的灵魂。党的二十大精神能够超越时空的界限,转化为一股强大的推动力,激励和支持人们不断取得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实现的,我们应该鼓励青年一代不断增强能力和作风建设,发扬责任精神和奋斗精神,站在时代前列,争当时代先锋。在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下的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所有青年大有作为的时代。

(一)增强青年发展的自信心,勇做新时代的捍卫者

新时代和新主题引导青年锚定新生活坐标,努力确定自己努力的起点,拓宽纵轴和横轴,需要实现当代青年的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高度一致,需要落实当代青年力量在党的二十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中得以发挥。回首过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既抵御了各种来自国内外、各层面的困难和挑战,又在艰难探索中摘取了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丰硕成果。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归根到底还是马克思主义行。我们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当作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并不断地用实际行动去证明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我们的党和国家赖以生存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我党的灵魂

和旗帜,是引领我们正确前进的方向标。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我们将强化青年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同,让处于人生关键阶段的青年真正领会思想的伟大之处,能够更深层次地理解真理的力量,不断精进自己的思想意识,并始终秉持“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政治信仰。通过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及其中国化,来丰富我们的政治意识,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把握和引领时代不断前进的趋势。目前,我们应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和新发展,使马克思主义能够中国化、现代化并普及开来。

当代青年应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强大的指导地位,并强化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想和信念,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取其精华形成属于中国自己的思想精华。青年作为推动新时代发展的主力军,应时时刻刻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将其观点、方法、立场应用于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努力充实自己,提升自身思想素养,摆正政治立场。年轻人的理想和信念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未来,他们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是国家和人民进步的基本动力。对理想的坚定信念是年轻人成长的第一步。青年的发展与理论武装,与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合”是不可分割的,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使青年能够更好地吸收这种精神力量的营养,成为新时代的好捍卫者。

(二)激励青年发展的进取心,善做新征程的领路人

“学习二十大,永远跟党走;扬帆再起航,奋进新征程。”青年肩负着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青年成长成才是促使青年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既梳理了历史又展望了未来,并聚焦于“创新”这一要点进行论述,坚持理论创新,贯彻创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的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性思维,在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不断地发现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理念,从而为各项国家事业的顺利发展提供科学的思维方法。作为新时代的先锋力量,青年群体拥有强大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是推动理论和技术创新的中坚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需要具有进取心、创新力的青年人才加入,要提高国民素质教育,形成人才竞争优势,将广大青年人才聚集到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来。同样,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为广大青年人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的全新舞台,而科教兴国的战略则为年轻人提供了坚定的政策支持。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为中国年轻人全面展现才华所营造的良好社会氛围。这些都可以给予青年人无限的创作动力和强大的进取心,促使他们团结一心,不断攻克难题、锐意进取。新时期背景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全局性特征预示着中国复兴道路的锐不可当,中国共产党在两个“百年变局”时期引领青年,把握他们的思想动向,并帮助他们抵御外部风险的影响,为他们提供强大的支撑力,激励青年在民族复兴道路上积极进取,善做新时代、新主题、新征程的领路人。

(三)提升青年发展的使命感,争做新时代的接班人

建设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这一伟大梦想,是一场接力赛。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指引年轻一代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并将个人自我融入祖国和人民的宏大自我之中,将个人利益融入关乎党和国家的集体利益之中,以初心和使命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党的初心使命贯穿报告始终,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引领青年勇于担当新时代的接班人,促使他们务必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当作完成新时代新目标的根本保障。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做有志气有骨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的四有青年,永远紧紧簇拥在党的周围,积极投身于党的革命建设,谱写肩负使命与责任的青年之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2022年到2035年,现在的青年正处于学习和成长的黄金时期,从2035年再到本世纪中叶,你们年富力强,将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各条战线担当重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明了国家发展的方向,同时也明确了时代对年轻人所寄予的厚望,要求他们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以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青年,鼓励青年听党话、跟党走,练就过硬本领,领悟时代主题。

一方面,党的二十大精神蕴含党的百年光辉历史,用历史感召青年,激励他们敢于斗争、勇于斗争,是推动青年成长成才的着力点。加强党史教育,让当代青年产生情感共鸣,从而凝聚自身意志,推动他们在前进的征途中不怕艰难,勇毅前行。另一方面,党的二十大精神蕴含着党的丰功伟绩,用党的丰功伟绩感染青年,激励青年奋发向上,是促进青年成才的必要条件。奋斗既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也是判断青年人精神品质的价值尺度。奋斗是青春最靓丽的底色,走向成功的道路没有捷径,唯有砥砺前行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国家事业步入新征程,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青年,用毅力和胆量挑战前进道路中的苦难险阻,时刻不忘自己是

新时代发展的接班人。

(四)磨练青年发展的意志力,敢做新征程的主力军

“不论学习还是工作,都要面向实际、深入实践,实践出真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这样语重心长地对青年学生说。青年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最终都要落实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具体实践中,青年人要努力做经得起实践磨砺和检验的时代新人。“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对青年发出的伟大号召。新时代新征程上,将坚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扛起时代责任。引领凝聚青年、组织和动员青年,使他们能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光彩。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忘自己的初心使命,坚持不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始终把民生问题当作是国家主要大事之一。“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我们必须带领青少年坚定不移地听党的话,跟随党的脚步,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积极地把自身的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建设中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求青年要从历史深处追寻初心,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走群众路线,进一步去了解党为什么从一直以来始终坚持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目标。实现民族复兴是近百年来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事业。立志千秋伟业,实现伟大梦想,百年只是开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时代赋予当代青年的崇高使命,需要通过一代代有理想、有奋斗的青年持续努力。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推动青年发展,关键在于深刻体恤人民的情感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融入年轻人的血脉之中,并引导年轻一代明确自身的根脉和发展目标。党的根基在于人民至上,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是确保党永葆生机活力的重要保障。青年一代在与群众联系方面必须与党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特性与中国的以人为本思想相结合,继承好中国共产党百年以来“系民初心”的优良传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不断磨炼心智,以人民为中心,增强自身的意志力,以及国家归属感和认同感。让人民的深厚感情助力青年人的成长,成为乘风破浪的不竭动力。培养青年人服务人民的奉献精神,弘扬雷锋精神。

学习英雄榜样,努力成为榜样。把个人的人生理想融入国家的需求之中。培养热爱国家和民族的理想信念,大爱之心、无私品质、进取精神。在关键时刻,年轻一代必须挺身而出,勇敢面对,坚韧承受,奋勇向前,以辛勤的汗水践行青年人的无私奉献,在群众需要的地方挺起脊梁,做无愧于新时代的奉献者。让我们肩负起民族复兴的使命,成为实现伟大中国梦的筑梦人才!

四、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信任和关爱青年群体,将培养、团结、依靠青年作为党务工作的重要部分,引导青年选择和坚持正确的成长方向,认识、担当和履行历史使命,让青年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中充分发挥主力军的作用。中国青年的先天年龄优势和创新潜力,以及他们追求进步过程中最宝贵的特质,不仅关乎自身的发展及前途,还关系到国家的未来与希望。在中国式现代化大背景下,在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全新征程中,青年们需要勇于行动,以不畏艰难险阻的雄心和毅力不断前进,加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学习,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通过理论学习、实践探索来提升技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不负习总书记的那句:“无论过去、现

在还是未来,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参考文献:

- [1]广泛凝聚组织引领服务广大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团干部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心得集萃[J].中国共青团,2022(21):17-21.
- [2]张会静.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青年成长成才的精神力量[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23(1):6-12.
- [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5-19(1).
- [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5]李纪才.深刻认识党的二十大的重大历史意义[J].东岳论丛,2023,44(2):5-10,191.
- [6]黎成才,刘永荣.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青年成长成才的逻辑向度与实践路径[J].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22,31(4):12-16.
- [7]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240-241.
- [8]张霞.坚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青年凝聚青年服务青年 让青春在新征程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N].平凉日报,2022-12-4(3).

The Spiri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uides the Value Guidance and Value Meaning of Youth Development

LI Xiao-tong

(Jiangsu Vocational College of Business, Nantong Jiangsu 226011, China)

Abstract: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whole country and the world, and its convening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China's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realization of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The spiri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epoch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his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ent a message to young people, urging the whole party to regard youth work as the primary task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o treat it as strategic work, which reflects the great importance that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ttach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young people. The spiri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tains the unique power to lead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young peopl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and study of the spiri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ll help lead the growth and success of contemporary young people, and help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self-confidence, enterprising spirit and sense of mission among young people, which fully reflects the value of the spiri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lead youth development.

Key words: spiritual strength;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main force; vanguard force

解构与重构:媒介融合视阈下历史虚无主义对大学生理想信念的侵蚀机制及算法正义治理研究

姚琛,陈慧文

(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泰安 271018)

[摘要]历史虚无主义在媒介融合中借助算法推荐与碎片化传播,通过解构历史整体性、消解集体认同、异化价值取向,侵蚀大学生理想信念。基于传播学与批判理论视角,其运作机制呈现三重路径:以生活化叙事渗透日常话语,借否定性逻辑差异化解构主流历史阐释,利用西方理论重构本土认知框架。侵蚀效应表现为历史认知断裂、集体记忆情感疏离以及价值实践的犬儒主义倾向,根源涉及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社会转型矛盾、思政教育创新滞后与网络治理不足的交织。治理需构建算法正义模型以优化意识形态内容过滤机制,开发沉浸式“四史”教育数字孪生系统增强叙事交互性,实施家庭红色记忆档案工程激活代际传承的情感联结,实现数字治理与人文价值浸润的深度耦合。该路径为破解媒介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困境提供系统性方案,并为算法赋能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拓展方法论空间。

[关键词]媒介融合;历史虚无主义;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算法正义

[作者简介]姚琛(2002—),女,河北衡水人,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与发展。通信作者:陈慧文(1981—),女,江苏盐城人,副教授,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山东省社科联人文社科课题“新时代背景下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23-DYZX-35);2024年山东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情怀引领·能力塑造·行动实践’:农科研究生思政育人体系创新与实践”(项目编号:SDYJSJGC2024046);2024年山东省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人工智能赋能农业高校思政课教学数字化发展的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M2024123)。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3006>

[中图分类号]G64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加强对广大青年的政治引领”,认为“青年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中国青年才会有力量,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才能充满希望”。但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重评历史”“还原真相”为名迅速扩散,对大学生理想信念造成一定消极影响,为此,高校及其思政教育工作者需制定并实施相应策略,以有效解决相关问题。

一、历史虚无主义理论及属性

历史虚无主义究其本质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范畴,其蕴含的鲜明阶级特性表明,这一思潮实为唯心史观的具体呈现。该思潮以抽象人性论诠释历史现象,呈现出“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价值标准,炮制“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谬论,本质上构成虚无主义的实践形态。

(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基本内涵

“虚无主义”一词译自德语“Nihilismus”,源自拉丁语“nihil”,指“完全毁灭的过程”。虚无主义视野下,传统意义的价值标准或遭消解,或被摒弃,个体偏好取代普遍规范成为价值判断的主要依据。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非科学的认知范式,在于通过对史实进行选择性的裁剪或全盘否定的方式,重构出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主观化历史叙事,这种认知方式本质上与唯物史观相背离。该思潮通过解构历史的规律性及进步意义,割裂历史延续性。

(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及本质

习近平指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我们需要清晰认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

及本质。

一是历史虚无主义具有浓厚政治色彩,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呈现出学术与政治的双重属性。究其本质,其外在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核心诉求在于通过解构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发展史来动摇思想共识,最终实现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图谋。历史虚无主义者惯以学术创新为幌子,“重评历史”“还原史实”等史学领域的所谓学术争论,实为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社会传播的隐蔽手段。

二是历史虚无主义具有否定性特征,历史虚无主义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其动机并非致力于历史真相的客观还原与公正评判,而是基于特定目的,通过主观臆断与虚构来重构历史叙事,胡乱编造历史。它具有鲜明的否定特性,即试图质疑党的领导的正当性,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抹杀中国革命与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并通过解构英雄形象来消解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割裂历史文化遗产。

(三)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学与批判理论解析

在批判性传播框架中审视历史虚无主义,其核心叙事策略体现为一种符号编码与议题嫁接机制,议程设置在历史领域中呈现出明显的片断化属性,以社会民生问题为切入点,例如医疗、教育、就业等,议程设置者往往过分关注细枝末节与非主流事件,罔顾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核心脉络与关键点。

在传播规律层面,议程设置理论揭示历史虚无主义借助热点事件重构公众认知焦点,通过筛选、放大特定历史细节,如片面引用档案质疑革命叙事;利用社交媒体算法将边缘议题“重新评价殖民统治”推入公共议程;影视剧中对历史人物的“人性化改编”;矮化英雄为“权谋家”等,本质是以“多元叙事”之名,将历史虚无主义议题植入大众文化消费,使公众在无意识中接受解构逻辑。

文化霸权理论揭露历史虚无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本质,即争夺“常识”领域的领导权。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学术话语包装,如滥用福柯“权力—知识”理论,将中国历史叙事污名化为“权力建构的虚假共识”,同时将西方现代性价值塑造为“普世标准”,如曲解葛兰西“霸权”概念,原指无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却将其扭曲为“中共历史叙事是意识形态压迫工具”,进而否定中国道路的合法性。

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影响及原因分析

历史虚无主义对高校青年群体的思想渗透呈

现出日益严峻的态势,其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危害程度持续加深,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影响

一是历史认知的解构与混乱,历史虚无主义通过解构历史的整体性与连续性,将历史认知异化为碎片化信息的无序拼贴,最终导致社会成员对历史认知的混乱。

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媒介环境下,算法推荐机制与社交媒体平台放大“去语境化”的历史叙事,历史事件被切割为孤立片段,如短视频“五分钟读史”;“辛亥革命是列强操纵的结果”。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宣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消解历史研究的实证基础;利用信息茧房效应强化认知偏见,形成“选择性虚无”,否定主流叙事的权威性。大量非理性舆论表达使社会陷入“后真相”现象频发的困境,具体表现为事实扭曲、情感极化、价值错位。

二是集体记忆的疏离与认同消解,英雄人物作为集体记忆的情感锚点,其意义直接关联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历史虚无主义将英雄叙事从情感共鸣对象转化为理性批判靶标,体系化瓦解集体记忆的情感纽带。

网信办近年公布的典型案例揭示了这种解构机制的现实危害:江西南昌某网民发表侮辱英烈违法言论案;“某南论坛”个别账号散布涉历史虚无主义信息,诋毁英雄烈士;“辣笔小球”诋毁戍边英雄案等,这些事件导致年轻群体对历史英雄人物的情感共鸣度持续弱化与情感疏离,并使代际间的记忆传承断裂,集体记忆无法通过情感共鸣转化为价值共识,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三是价值取向的异化与政治冷漠,历史虚无主义最终导向的价值危机,体现为从认知混乱到行为异化,当历史认知失去客观坐标、集体记忆丧失情感温度,主流价值观的权威性便遭遇根本性质疑,这种质疑演变为价值取向的异化与政治冷漠。

青年群体中“躺平主义”的流行与投票率的下降,正是这种异化的现实投射。政治冷漠是历史虚无主义摧毁社会成员价值再生产机制的结果,历史无法提供合法性论证,如“改革开放史被简化为权贵资本史”;英雄无法充当道德示范,如“模范人物被扒皮为虚伪人设”,主流价值观便失去历史根基与人格载体。年轻一代在“一切都是建构”的认知下,将政治参与降维为“利益计算”或将公共事务视为“虚无剧场”等,这种异化导致无法凝聚改革共识,难以抵御极端思潮渗透。

(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原因分析

一是西方价值观的传播和渗透,21世纪以来,西方依托新兴媒介平台,采取阵地占领、话语解构和文化输出等策略。

近年来,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渗透呈现出明显的“精英化”趋势。部分高校在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过程中,存在通过组织宗教文化课程等活动载体进行价值引导的现象。从传播对象来看,其主要将研究生群体作为重点目标群体,其网络传播机制依托高校网络平台展开,通过结合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热点事件实施观念输出,贬低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解构特定国家的历史正当性与文化主体性,实现意识形态嫁接与价值体系置换。

二是国内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形势,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在广度、深度与质量水平层面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在深化改革开放与推进人文交流合作的进程中,虽然有效促进了国际认知拓展与世界文明互鉴,但也需警惕部分非本土化的价值观念与理论范式在跨文化传播场域中产生渗透效应。某些国际政治势力依托数字媒介的技术特性,借助全球话语流动的传播势能,持续介入我国意识形态博弈场域,系统传播抽象价值体系、历史虚无主义、西式民主等异质性思想资源。

三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不足,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持续存在并渗透至高等教育领域,也反映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从教学实践层面来看,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着多重挑战:其一,课堂教学话语模式与时代发展要求的适应性有待提升;其二,课程内容与学生认知需求之间的契合度需要加强;其三,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应对机制尚需完善;其四,教师教学能力与教育目标要求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在当代技术革命与社会转型的驱动下,传统思政育人模式面临适应性挑战。教育工作者需要深刻认识教育目标与信息技术变革之间的关系,推动教育方式现代化转型。

四是网络监管力度不足,数字化传播技术的迭代演进客观上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历史虚无主义在媒介化社会转型过程中呈现出多维传播策略,具有强隐匿性、内容虚伪等特点,国内

部分媒体工作者盲目追求商业利益,在内容选取上以博取眼球为主要目标,传播失真信息,助长了网络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蔓延。

网络已成为大学生获取学习和生活信息的主要渠道,网络信息获取方式缺乏有效监管,青年学生面临着信息筛选机制缺位与批判性思维培育滞后的双重困境,导致其价值判断易受非良性信息流的侵蚀性影响。与此同时,部分传媒机构为提升用户覆盖率,在优化搜索引擎排名机制与广播电视内容生产流程中采取过度宽松的审核标准,过度追逐商业利益,忽视其对公共价值导向的维护责任,导致潜在社会风险未能得到有效防控。

三、防范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影响的策略

历史经验与现实实践充分表明,意识形态工作效能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并遵循意识形态工作的社会管理规律,通过治理策略有效应对历史虚无主义带来的风险,切实维护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价值安全与文化认同,确保青年一代的价值观念与政治认同不受侵蚀。

(一)构建“算法正义”模型,实现内容推送的意识形态把关

随着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融合程度的不断加深,算法作为网络空间行为规则的影响也逐渐延伸至现实空间。在维护意识形态算法正义方面,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算法模型对思想观念体系的传导路径、扩散范围及作用效能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

秉持算法正义理念,采取措施规范和优化算法,构建科学合理的“算法正义”模型,实现内容推送的意识形态把关。一方面,优化算法技术源点,从源头规避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意识形态的渗透;另一方面,规范算法推动过程,对算法的设计、应用和传播环节进行合理化规制,确保其符合主流价值观。执法监管机构也应当构建多元协同的算法治理体系,引导平台企业、行业组织及网络社群等主体参与监管实践,明晰部门权责边界,建立精细化监管机制,严肃处理算法黑箱、数据窃取、平台滥用权限等损害网络空间安全与破坏社会公平正义的算法案件,落实人民群众所期盼与拥护的算法正义,实现内容推送的意识形态把关,确保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风清气正。

(二)开发情景化学习系统,推动“四史”教育深度沉浸

情境化教学实践可借助交互性叙事手段、环境渲染、仿真场景构建及游戏机制融入等手段优化用

户感知体验,实现深度教育目标与情境化知识传递。通过整合视听娱乐与互动元素,创新性地多维度感官参与与认知活动相结合,构建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统一的教育范式。

开发“四史”教育情景化学习系统,可通过构建虚拟历史场景、还原重大历史事件、设计角色扮演任务等方式,让学习者“穿越”到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关键节点,亲身参与历史进程。系统可设置“重走长征路”“改革开放亲历者”“脱贫攻坚见证者”等主题模块,运用VR/AR技术还原历史场景,通过互动任务引导学习者深入思考历史选择和历史规律。同时,学习系统可建立学习积分、成就徽章等激励机制,形成“学习—实践—反馈”的良性循环,使“四史”教育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探索,从知识记忆升华为情感认同和价值塑造,真正实现“入脑入心”的教育效果。

(三)实施“家庭红色记忆工程”,强化代际历史传承

一是家庭红色档案构建,传承革命精神,延续红色文化基因,用好、用活、用足蕴含党的初心使命的红色档案,讲好红色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是时代使命和长远需要。红色档案资源不仅集中保存于公共文化机构,当前仍有大量红色历史文献以家族传承形式存藏于革命先驱后裔家庭中,内容包括英烈生平、思想、重要历史事件等。

英烈后代积极参与家庭红色档案的征集和研究并进行深入挖掘,结合现有档案与新增档案的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家庭红色记忆库,使英烈形象更加丰满鲜活,更能真实、全面地还原历史,增强历史的可信度和感染力,更能助力讲好红色故事。通过推动档案数字化建设,利用现代技术对档案进行分类、整理和保存,便于研究与传播。同时,开展红色记忆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大学生参与档案整理、英烈故事宣讲等活动,增强其历史认同感和使命感。加强学术研究与公众传播的结合,通过出版书籍、举办展览、制作纪录片等形式,将家庭红色记忆融入公共文化空间,进一步扩大红色文化的影响力。

二是家校协同机制,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形成协同育人机制,发挥协同育人合力,而家庭教育作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途径,通过树立优良家风、弘扬传统文化、营造民主和谐氛围,可有效助力学生成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

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在高校理想信念教育体系中,应当强化家庭教育的协同育人功能。对家庭来说,家长需着重关注子女的心理发展与全面发展,通过言传身教,为青年学生的价值观培育奠定坚实的家庭教育基础;对学校来说,要注重多元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将价值引领有机融入各学科教学体系。基于学生认知发展规律,需深入探究不同学段青少年的身心特征与成长需求,通过构建家校协同机制形成育人合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系统化构建与完善。在此过程中,培养大学生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正确的生活态度,为其在社会中确立独立的价值体系奠定基础。

四、总结

媒介融合视阈下的历史虚无主义,依托算法推荐、短视频传播等技术逻辑精准解构历史叙事,呈现出渗透生活化、价值重构隐蔽化、渗透能力强的新特征,其本质是西方意识形态以技术争夺话语权。应对挑战需以算法正义强化平台治理,运用数字技术构建“四史”教育元宇宙,通过红色记忆数字化激活代际共鸣,未来研究需深化算法伦理与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推动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技术向善与价值引领融合,为培养兼具历史自觉与家国情怀的时代新人提供支撑,彰显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时代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切实肩负起新时代新征程党赋予的使命任务 充分激发广大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N].人民日报,2023-6-27.
- [2]陈江江.高校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路径选择[J].传媒,2020(22).
- [3]马新宇.虚无之为主义——“虚无主义”概念使用模式分析[J].社会科学辑刊,2015(5).
-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20.
- [5]沈江平.“历史虚无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评判[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3):59-69,158.
- [6]郑建锋.揭破历史虚无主义的“套路”[N].中国教育报,2020-4-2.
- [7]杨万贺,任新玉.新媒体环境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应对[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8).
- [8]邹永红,等.数字资本场域下的数字消费主义:出场、表征与祛魅[J].学习与探索,2024(7).
- [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53.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Erosion Mechanisms of Historical Nihilism on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Beliefs in the Context of Media Convergence and Algorithmic Justice Governance

YAO Chen, CHEN Hui-wen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Shandong 271018,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media convergence, historical nihilism leverages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and fragmented dissemination to erode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beliefs through three mechanisms: d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integrity, dissolving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alienating value orientations. From perspectives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critical theory, its operational logic manifests in three pathways: infiltrating daily discourse through lifeworld narratives, subverting mainstream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via negationist dialectics, and reconstructing local cognitive frameworks using Western theoretical paradigms. The erosion effects include fragmented historical cognition, emotional detachment from collective memory, and cynicism in value practices. Root causes involve the interplay of Western ideological infiltration, contradictions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stagnation in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novation, and deficiencies in cyber governance.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require constructing an algorithmic justice model to optimize ideological content filtering mechanisms, developing immersive digital twin systems for "Four Histories" education to enhance narrative interactivity, and implementing Family Red Memory Archive Projects to activate intergenerational emotional bonds. This approach achieves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governance and humanistic value cultivation, providing systematic solutions to ideological education challenges in the mediatized era while expanding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s for algorithm-empowered mainstream ideology construction.

Key words: media convergence; historical nihilism; college students; ideal and faith education; algorithmic justice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行伟大斗争之复杂形式

韩亚雯

(郑州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郑州 450000)

[摘要]纵观我党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可以称得上是一部伟大的斗争史。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伟大斗争”,并将其与“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并列,在二十大报告中,“斗争”一词更是作为关键词累计出现了20余次,这足以说明在新时代背景下伟大斗争的战略作用和重要地位。新时代的伟大斗争包含复杂多样的形式,用一套比较合理的分析框架来了解伟大斗争的表现形式极有必要。从哲学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认识、改造世界的逻辑起点是自然—人—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把握新时代下中国共产党进行伟大斗争之复杂表现形式也可以按照这一逻辑出发,把握新时代下中国共产党进行伟大斗争之复杂表现形式、合理边界、不同状态下斗争的相互转化,以便矛盾在原初状态下可以得到合理解决,也有助于使伟大斗争的进行成为一个良性的过程。

[关键词]新时代;伟大斗争;表现形式

[作者简介]韩亚雯(1995—),女,河南荥阳人,郑州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法学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3007>

[中图分类号] D26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说到“伟大斗争”这一术语,翻阅资料后发现它最早在马克思的《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笔记五)中被提及,此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同时期内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新时代以来的伟大斗争包含更加复杂多样的形式,用一套比较合理的分析框架来把握伟大斗争的多种表现形式、合理边界是进行伟大斗争的重要认识前提,这将有助于“使得伟大斗争的进行成为一个降低风险隐患、确保党和国家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良性过程。”中国共产党尽管在不同时期对斗争的理解、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斗争的这一价值取向从未动摇,因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伟大斗争取得的成效如何,最终也要回归并且依靠人民。从哲学层面上讲,马克思主义认识、改造世界的逻辑起点是自然—人—社会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极其强调人民的主体性地位。本文拟就这一逻辑从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精神、人与社会这三个层面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行伟大斗争之复杂形式展开探讨。

一、伟大斗争之复杂形式——基于人与自然关系层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告诉过我们,人与自然之

间同样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过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息息相关,而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要义就是如何平衡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及最终能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境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行伟大斗争之形式更加复杂,它是以人为中心的一种社会实践形式,当自然界发生的矛盾问题成为风险挑战并且影响人类社会、涉及人与自然关系时便要进行伟大斗争。

(一)与自然灾害的斗争

众所周知自然灾害带来的危害,与其之间的斗争仍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必须进行的伟大斗争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提到:“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知没有止境,防灾减灾、抗灾救灾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课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经了不少自然灾害,在防灾减灾方面我们凭借着制度优势曾经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自然灾害带来的危害是无法精确衡量的、自然灾害的治理是非常复杂的。首先,自然灾害的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地球是由多个圈层组成的,每个圈层都会发生不同类型的自然灾害,这些自然灾害还有可能会组合出现,不同类型的自然灾害在我国就时常发生,比如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发生的分布地域广泛,这就

更加加剧了其斗争的艰巨性。其次,自然灾害发生的强度大,因此这也加剧了其斗争的严峻性。最后,自然灾害过后一般都会直接造成大量的人口伤亡与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与其斗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性与经济性。进入新时代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正在提高,而保障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最基本的前提就是保障好人民群众在安全方面的需求,因此,一般的自然灾害应对方式是远远达不到要求的,必须要将其上升到伟大斗争的高度予以重视。此外,“非常态状态下的危机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不可忽视的内容。以自然灾害事件为代表的非常态危机治理能力也是衡量国家治理能力大小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与人为破坏环境行为的斗争

除了与自然灾害作斗争之外,人为的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也是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斗争的重要对象。现代经济的发展速度人人目睹,这也注定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定会出现为了个人私利不惜恶意与自然环境对抗的种种自损行为。中国共产党在与此类行为斗争的过程中更直接接触到的是人为行为,斗争难度更大,需要总结的斗争方法更多,面临的挑战更复杂。如何做好工作,将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生态自然观宣传并落实并对人们恶意破坏环境的行为做出严惩,这将是中国共产党需要迎接的一个新的挑战。

二、伟大斗争之复杂形式——基于人与社会层面

讲到矛盾,毛泽东同志可谓是研究专家,毛泽东同志在文章中曾经讲过:“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各对矛盾之间,又互相成为矛盾。”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面临的矛盾是复杂且互相交织的。就世情而言,我国要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与部分国家的遏制并存;就国情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飞跃的发展,但是也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就党情而言,党的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是腐败滋生,仍需全面从严治党。新时代我们要进行的伟大斗争呈现出多样的形式。从斗争维度来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从斗争范围来看,涉及国内国外、党内党外等;从斗争领域来看,涉及货币较量、思想交锋、资源归属等。这些复杂交织的矛盾有对抗性的矛盾,也包括非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就新时代伟大斗争的形式来看,它是对抗性而非对抗性的统一。根据黑格尔的《逻辑学》关于矛盾本

质性与反思规定的理论,可以将矛盾学说的逻辑结构理解为:同一—差异—对立—矛盾。在这四个环节也可说是四个形态中,对立是最涉及矛盾本质的。在新时代,我们所讲的伟大斗争一定是涉及矛盾双方本质的,因此新时代背景下伟大斗争的表现形式主要体现为对抗性质,因根本利益发生冲突而引起的激烈对抗可以称之为对抗性的斗争,这种斗争常会采取较为激烈的方式。当然,矛盾斗争在最初阶段也可能仅表现为非对抗性的,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语境中,主次矛盾、矛盾的主次方面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因此,矛盾斗争也是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的统一,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

(一)党的建设领域

党的建设关乎党和国家的安危。我国全面从严治党虽然成效显著,但是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最关乎党的建设的根本便是腐败。近些年来,诸如系统性腐败、家族式腐败、塌方式腐败等多种腐败现象屡发。这些腐败与共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格格不入,严重损害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倘若解决不好会对党的建设、国家的建设产生巨大危害。因此,反腐斗争仍是新时代伟大斗争的重中之重,必须坚持“老虎”“苍蝇”一把抓,无论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职位的大小高低,只要触及党纪国法,便要严惩不贷。

(二)经济领域

马克思、恩格斯曾“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该社会的经济结构、经济制度,不包括生产力,生产力只有通过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才能对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起最终决定作用。因此,新时代伟大斗争最根本的场域在经济领域,表现为贸易市场斗争、经济资源斗争等。(1)对外贸易市场斗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市场上的斗争激烈万分。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在为了自身利益愈加强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诸如技术性贸易壁垒、绿色壁垒等方面的要求愈加严苛,中美之间爆发的贸易战便与美国推行的“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要坚决地与西方各种狭隘的保护主义作斗争,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普惠共赢公正的方向发展,最终构建一个和谐共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2)经济资源争夺战。当今世界,人类的需求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是一个难以缓和的问题,各个国家为了争夺资源而展开各种激烈的竞争,如对石油、天然气及新能源的争夺战。资源的缺乏确实会

严重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以及竞争力,但是可以采取协商和平的方式解决,尽可能避免战争,维护人们的生存安全。

(三)政治领域

若论当下中国共产党进行伟大斗争中最尖锐的阵地,那必然是政治领域的斗争。政治领域斗争的核心关系到国家政权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1)国际政治斗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然则,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谋求自身最大利益不断地凭借其政治、经济甚至是军事上的优势大肆宣传“中国威胁论”。在这种情势下,作为当下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当中发展前景最好的中国也理应正当与之进行国际舆论上的斗争,表现在实际行动上就是强烈打击类似霸权主义、新旧殖民主义等行为,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尊严。(2)国家领土争端。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当下,领土争夺战仍在不同区域时有发生,归根究底还是部分主权国家为了自身能有更多的发展空间。而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倡者和践行者,在面对此类争端之时也必须从政治、外交甚至是军事方面采取合理方式来维护我国安全。(3)与恐怖、分裂、霸权主义作斗争。暴力恐怖活动漠视基本的人权,挑战人类的文明底线,是全人类的公敌,因此反恐怖斗争事关国家安全,事关人类切身利益,应当坚决进行与恐怖势力的斗争。要深刻认识到如“藏独”“港独”“台独”等民族分裂势力的长期存在,这些是危害到我国核心利益、涉及原则问题的事件,我们必须对其展开斗争。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在争夺世界霸权过程中必然会发生一些恃强凌弱的冲突或战争。中东地区长期混乱不安、我国南海问题的出现便与西方霸权主义的搅局脱不了干系。我国一向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惹事也不怕事,面对一些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行径,我国必须做好与其作全方位斗争的准备。

(四)文化领域

文化领域的斗争是十分隐蔽且须花费许多时间的。文化的核心是意识形态,因此,文化领域的斗争最为核心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新时代下,我国面临着新的世情、国情、党情,意识形态安全也面临着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的挑战,这些敌对势力试图攻击我国的意识形态以此来西化、分化我国。诸如历史虚无主义者“否定革命的历史进步性;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否定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救亡斗争;颠倒对历史人物功过是非评价;否定共产

党领导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成就。”我国自近代以来饱受列强欺辱,无数仁人志士流血牺牲只为探出一条救国之路。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轰轰烈烈的革命史,这是不容任何否定的。我国选择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无数先进的知识分子遍求救国之路不得,反复比较抉择之后的结果,这是不容置疑的。而种种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却试图否定我党的艰辛革命史,必须给予严厉的抨击。又如主张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者,他们主张“去马归儒”“以儒反马”,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已经过时的东西。然则,熟知矛盾论的都应知,世间万物都是对立统一的,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对立的,因而要坚决与试图扭曲中华传统文化并攻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错误思潮作斗争。再如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反复论证过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断向前的,必然会有更高的社会形态取代资本主义形态,绝不存在所谓的适合所有民族和国家的普世价值,因此,对诸如此类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必须要坚决与之斗争。此外,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主流媒体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网络逐渐成为错误思想、负面舆情传播的重要阵地,这便更增加了意识形态引导和内容管理的难度,再加上在网络领域总体上仍呈现“西强我弱”的态势,更是在无形之中威胁着我国的意识形态、主权安全,因此要把握好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与威胁网络意识形态的行为作斗争。

(五)社会安全领域

要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要重视社会治安安全,这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行伟大斗争之重要内容。社会领域的斗争最根本的是要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而社会的安全稳定是要靠法治给予保障的,因此,要与破坏社会法治的行为作斗争是伟大斗争的重要内容。(1)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便是当前政法工作的重中之重。2018年1月,党中央更是发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要严厉打击“村霸”、宗族恶势力等不法犯罪行为。这些黑恶势力的非法行为会扰乱正常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因此要坚决与其作斗争。(2)再如禁毒斗争。习近平同志曾号召要深入开展禁毒斗争,治理毒品问题,“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增强做好禁毒工作的政治责任感,保持对毒品的‘零容忍’,锲而不舍,常抓不懈,坚定不移打赢禁毒人民战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3)又如网络犯罪。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以互联网等作为载体的犯罪行为时有发生。由于网络犯罪的方式更加具有隐蔽性、灵活性,对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生命财产以及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因此网络犯罪也是要进行坚决斗争的重要方面。

(六)民生领域

新时代也是一个风险时代,我们在各个发展领域中仍存在一系列矛盾风险挑战,要化解这一系列风险挑战的难度也比较大。若深入了解各种社会风险就会知道其底线乃是“民生问题”。在新时代环境下,部分人们在就业、看病、社会保障等方面还是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此时,站在不同立场的双方或多方的利益关系便会彼此对立甚至相互冲突,有利益冲突便有可能采取斗争的方式,因此便会导致许多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出现。群体性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非常态性、也是趋于对抗状态的表现形式。所谓群体性事件是指部分社会弱势群体成员通过群体性上访、集会、静坐、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甚至打砸抢烧公私财物和冲击党政机关等方式表达和争取利益的行为。群体性事件目前也呈现出数量不断上升与对抗性程度不断加强的演变态势,会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构成一定的威胁。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因为在群体性事件发生过程中,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与基层党委和政府之间的矛盾虽然会表现得很尖锐,但是这些矛盾还是可以在现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内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但是,还是会存在不能得到完满解决的情况,一旦解决不好这类事件,便会使其趋于对抗的状态,因此,如何在最大程度上处理好群体性事件,避免使其朝着不好的态势发展也是我们进行伟大斗争不可忽视的状况。

(七)军事领域

“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新时代要进行伟大斗争,军事斗争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正处在由大转强发展的关键阶段,我国面临的安全形势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严峻,一些利益关系处理不好的话可能会上升到采取军事斗争的层面,因此,越是步入到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就越是要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我国的军队要时刻强化战斗思想,坚持战斗力标准,深化战争与作战筹划,最终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只有时刻做好这些准备,在某一个时刻面对战争时才不至于处于战略不利地位。

上述所提到的这些对抗性的伟大斗争形式倘若可以得到有力的解决,便有可能促使其向非对抗

性的状态转化,使伟大斗争能够减少采取激烈方式进行的几率,能够最大限度地耗费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当然除了对抗状态的斗争之外,社会的各个领域也还存在着非对抗性的斗争。由于局部利益冲突引起的较为缓和的冲突叫作非对抗性斗争,对待非对抗性斗争一般情况下会运用较为缓和的方式予以解决。诸如党内存在着的经验主义、自由主义等错误倾向,这些作风问题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相互排斥和否定的,其本质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甚至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在与之斗争时,常采用批判与自我批判的方式。然而在一定条件下,尤其是在实践的高度参与中,这些问题是会逐渐朝着“激烈”的方向演化的,一旦不及时纠正就会发展为贪污腐败,动摇我国的经济基础与政治基础,此时可能就要采取激烈的方式去解决。因此,对于非对抗状态的斗争,要及时采取措施处理,尽量让矛盾在原初阶段得到处理,减轻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消耗与冲击。

三、伟大斗争之复杂形式——基于人与自我精神层面

“在马克思主义语境里,‘斗争’侧重指向现存世界的革命化,既包括行为上的克服、批判、打击等,也包括精神上的奋斗意志,也可指向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不同思想学说之间的碰撞与激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召开的数次会议中就多次强调要重视精神状态。自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伟大斗争,并将其与“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并列。自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伟大斗争不仅是指行为上的克服,也是指一种精神状态。当下,我们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更应该拿出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与决心来应对种种复杂问题。在实现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若没有坚定的斗争信念,将很难取得胜利。

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倘若没有矛盾斗争,那这个世界就没有了运动变化,也就不会有发展与进步,就不会有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每向前进一步,都是在矛盾斗争中实现的。矛盾斗争不可怕,可怕的是一味地畏惧、逃避矛盾斗争。在我党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非常严重的“左倾”或右倾斗争,不仅几度威胁到党和国家的安危存亡,也让一些人民群众深受其苦,如今提起斗争,有过相关经历的人仍会有谈“斗”色变、排斥“斗争”的心理。但是新时代下的斗争不是要重拾极左年代的“斗争思维”,也不是要重现“以阶级斗争为纲”,斗争不是对

抗,斗争也不限于阶级斗争,对抗、阶级斗争只是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且也常常不是主要的形式。在唯物辩证法的语境中,矛盾的同—性与斗争性是辩证统一的,新时代下的斗争没有离开同—性,因为离开和谐讲斗争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而且真正的和谐也不是通过妥协得来的,我们是在用斗争求和谐。在新时代下,伟大斗争在精神层面指的是为了建设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一种正义的、积极的、革命性、建设性的力量。正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因此,斗争是有不同的语义的,那种对斗争内涵一概而论的观念是错误的。作为一种精神品质,伟大斗争的宝贵作用在于,使人们能够始终对矛盾、问题和隐患保持较高的警惕、警醒和警觉,是治疗承平日久之后容易滋生的“麻木症”的一剂猛药。

结语

矛盾在,斗争就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定是在矛盾中前进的,回顾往昔,中国共产党就是依靠斗争从革命、建设、改革走到今天的,也一定会靠着斗争走向未来。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途中,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斗争不仅是长期的更是激烈的。因此,必须要对面临的各种矛盾、风险进行科学预判,了解伟大斗争的表现形式、

发展趋势,该斗争的斗争。斗争不是消极的、非正义的斗争,斗争也不仅仅只表现为对抗,全面、客观地了解斗争、斗争的表现形式、边界,并且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关系到我们在每个领域的斗争能否取得胜利,也关系到在新时代下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否最终顺利推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 郝永平,等.伟大斗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 [4] 习近平向汶川地震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暨第四届大陆地震国际研讨会致信[N].人民日报,2018-5-13.
- [5]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7] 韩树英.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8] 梁柱.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特点及其主要表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10):120-128.
- [9] 习近平在会见全国禁毒工作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个人时强调,增强做好禁毒工作政治责任感,坚定不移打赢禁毒人民战争[N].人民日报,2015-6-26.
- [10] 黄相怀.“伟大斗争”的政治阐释与现实逻辑[J].党的文献,2020(3):22-29.

The Complex Form of the Great Strugg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HAN Ya-wen

(School of Marxism, Zhengzhou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Zhengzhou Henan 450000, China)

Abstract: Looking at the history of our Party's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can be regarded as a great history of struggl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great struggle” and has ranked it with “great project”, “great cause” and “great dream”. In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the word “struggle” has appeared as a keyword more than 20 times, which is enough to illustrate the strategic role and important position of the great struggle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The great struggle in the new era contains complex and diverse forms, and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use a relatively reasonable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great struggle. From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Marxist understand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is nature-man-society and their mutual relationship. Therefore, grasping the complex manifestations of the great strugg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can also be based on this logic, grasping the complex manifestations of the great strugg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reasonable boundaries, and mut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ruggle under different states, so that the contradictions can be reasonably resolved in the original state, and it will also help make the progress of the great struggle a benign process.

Key words: new era; great struggle; form of expression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路径的特征及意义探究

庄清蓉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福建莆田 351119)

[摘要]当今世界正经历新的动荡变革期,各种矛盾冲突日益突出且复杂多变,但是,各国之间虽然存在利益之间的博弈,但合作共赢才是时代潮流。针对“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课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向世人展示了“和合共生”下的一个现代的文明秩序,其建设路径特征向世人展示了多样文明的生存发展之道,在多样文明中可以实现多元文明共存共荣的一体格局,有力驳斥了影响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的西方文明中心论,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了中国智慧。

[关键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明观;特征;意义;路径

[作者简介]庄清蓉,女,福建仙游人,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生,研究方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3008>

[中图分类号] D61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作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概念的提出和使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多元文明世界中对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建设的深刻认识与精准把握。这一理念不仅彰显了中国在探索人类文明发展方向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上的独特方案与实践路径,更蕴含了显著的路径特征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明观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

针对文明的内涵,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文明的果实是已经获得的生产力”,文明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进步的集中体现,表现在科技的突破、劳动的分工与协作,以及世界市场的拓展等诸多方面。而生产力的提升必然推动与之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发生变革,不同生产力形成不同的生产关系,从而产生多种文明形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不断细化和扩大,文明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从地域性市场到世界市场,在生产力层级跃迁的条件下,文明形态逐步实现迭代。

恩格斯在此基础上,以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对人类历史时期的划分为依据,把人类历史进一步划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这三个依次演进的时代。文明时代标志着人类由原始的、简单的利用自然资源阶段,迈向了对自然资源进行深加工和利用的阶段,同时还推动了工业和艺术的蓬勃发展。在这个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特别

是分工、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商品生产的发展,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彻底改变了先前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因此,文明与生产技能的发展和获取生活资料的进步密切相关,体现了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方面的积极成就,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而人类文明发展到当时,已经历三大时期即古代社会文明、中世纪社会文明和现代社会文明,但从发展历程来看,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是文明时代三大时期独特的奴役形式。这种特有的奴役形式,无论是早期的公开剥削,还是后期较为隐蔽的剥削方式,都一直伴随着文明时代的进程。也正因为此,恩格斯指出“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反映了他对阶级社会的深刻批判。在私有制和阶级社会里,文明的进步往往是建立在阶级剥削之上的,这种剥削关系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加剧,使得社会的发展成果并不能公平地惠及所有人,而是加剧了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

基于对三大时期文明伴有的奴役剥削特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对未来社会的文明进行了科学构想。马克思主义指出,当生产资料私有制对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形成阻碍时,就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取而代之,以开创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文明类型。而这种新的文明类型是以共产主义经济基础为特征的文明样态,“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

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又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从中可以看到,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之间斗争的“真正的解决”是要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打破具有剥削性质的经济基础,才能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于平等和合作,并在认识和驾驭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个体与集体利益的统一,实现自由与必然的统一。从而使个人像奴隶一样服从分工的情形不复存在,实现“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教育的普及”,实现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由此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同时,由于剥削基础的消灭,民族内部之间的阶级对立消失,民族与民族的敌对关系也会随之消失,实现各民族大融合。

因此,共产主义社会文明之所以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方向,关键在于解决了三大时期始终伴有的奴役特点,进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推进人类历史进入新的文明发展时期。从这个角度看,共产主义社会文明可以说是文明时代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的先进性在于对三大时期的阶级剥削基础的彻底解决,由此创造出新的文明的实践形式。

二、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路径困境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科技的进步,原来不同文明间的空间距离缩成了地球村,文明之间的不平衡和差异性存在进一步证实了文明发展的多样性。马克思主义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也正因如此,在现实世界里,不同国家、地区,文明变迁不仅有跨时期现象,而且呈现多向度存在。人类社会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同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并肩、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共存,这其中,由于不同社会实践主体所处社会环境的差异性,出现了同一文明时期在不同国家的不同表现。甚至出现了不同文明时期在同一国家的同时存在,这一现象说明了文明多样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也是文明发展的基本特征。

然而,多样文明在相互接触中并未走向和平相处,反而由于文明建立的社会基础不一样,阶级利益、价值理念、经济科技发展的不平衡等因素导致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对抗性的矛盾。现阶段全球格局正处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提出的从资本主义逐步迈向社会主义的关键过渡阶段,资本主义尽管在世界经济、政治及文化领域仍保持显著的主导地位。由于阶级社会无法改变其剥削本质,群体之间

以意识形态中价值观念的歧异为借口而发生的战争屡见不鲜,直至今日,在世界一体的格局中容纳和处理文明多样性的问题仍没有一致的看法,“人类文明向何处去”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重大时代课题,“文明中心论”“文明冲突论”“文明同化论”以及“文明优越论”等观点和看法相继出现,但这些理论主要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强调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和主导地位,而忽视了其他文明的价值和贡献,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学者费孝通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观点,则是强调不同价值标准的并存不悖,反对本位中心主义,强调不同文明在求同存异原则上实现和谐共处,而不是冲突。这一观点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在多元利益冲突的世界里,如何构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资本主义无法掩盖其固有的剥削性经济基础。其内在的逐利驱动必然加剧资源争夺与财富分化,引发不同文明、国家间的结构性冲突,破坏全球和平稳定,最终损害人类共同利益。这种制度性矛盾不仅制造社会不平等,更通过资本扩张逻辑撕裂国际合作纽带,使文明对话异化为零和博弈,世界充满着动荡与不安。

三、中国对多样文明发展的思路探索

虽然,阶级社会里阶级对立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利益竞争也是必然存在的客观现实,然而,这种反映社会结构中基本矛盾的对立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分裂,对立中的统一同样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没有统一也就没有对立,矛盾的双方互为存在的前提,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推动事物向新的状态发展。正是基于此,为应对全球性的挑战,解决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矛盾与冲突,习近平系统性提出以“全球文明倡议”为核心的中国智慧与方案。

习近平认为,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虽然存在利益之间的博弈,但合作共赢才是时代潮流。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诸多方面联系紧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立于世界之外,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全球性问题,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不同文明之间的包容、交流与合作。也正因为此,在全球治理制度架构上,习近平强调人类共同利益优先,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在谋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在全球治理的价值构建上,习近平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核心,倡导“文明生态论”,强调多样性与平衡性对文明存续的关键作用。认为:

不同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虽然文明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才形成的,但其生产上的技能和获取生活资料的文明成就都是人类的智慧之作,人类社会由野蛮走向文明的每一步,都彰显着创造之美,这是文明的共通性。文明多样性正是生产力同生产资料、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发展的体现。因此,不同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每一种文明都值得去关注、研究,从中汲取营养。文明交流互鉴要在尊重包容的基础上开展,这是人类文明得以发展的关键,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构成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别和不一致,正是这种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具体体现。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文明的多样性“就如同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一样,一同构成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本源”。这种多样性既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更是推动文明不断迈向新高度的关键动力源泉。只有通过交流互鉴,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才能消除隔阂、化解冲突,为各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奠定基础,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实现共同发展。可以说,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多样文明和平共处是人类文明生存之道。习近平提出“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恐怖主义等。这些挑战超越了国界和民族的界限,影响着全球的稳定与发展。只有不同文明携手合作,在交流互鉴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才能共同应对这些挑战,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各自独特的历史、国情、民族和风俗中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文明。这些文明以“共生”的形式共存,通过交流与合作,可以实现“和合”的效果,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多样文明和衷共济是应对全球化挑战、推动人类共同进步的重要路径。

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实践特征与意义

2022年在考察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时,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大命题。2023年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任务和要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提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践行,更是通过“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实践智慧,为破解文明冲突、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东方方案。

(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平发展道路的显著特征

一是展示了文明之间价值平等的理念。

中华民族与世界众多民族一样,百年来探索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只是世界多样文明的一员,体现的只是现代文明中的中国特色,这种特色源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 and 特殊的国情,与其他文明一样,各具特色。正如习近平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文中所提出的,不同文明之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别,只有特色、地域之分。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思想束缚,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选择,这个全新选择,就是多样化选择,即立足于本国实际情况,独立自主探索适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发展路径。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词,从根本上摒弃了“西方文明优越论”“西方中心论”“文明同化论”等错误的文明观,真正践行了各民族文明一律平等的理念。

二是展示了多元文明共存共荣的一体格局。

中华民族是由众多各具起源、发展、文化、宗教信仰等特点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汇聚而成的民族实体,中华文明也是在多元文明的融合与传承基础上,通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而实现的,具有“多元一体”的鲜明特征。

从文明横向构成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基础的对立统一性。中国在“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框架下,展现出独特的制度多样性。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致力于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此同时,香港、澳门作为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貌。在这一框架下,中国大陆与香港、澳门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实现了优势互补,在制度多样性中寻求共同发展,各方实现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深度协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共同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与实践。

从文明纵向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传承性。中华文明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变革中探索,不断促进社会主义文明发展,奠定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作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传承性不仅体现在历史的延续性上,还体现在其与传统农耕文明的深厚联系上,并通过这种联系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种转化和发展,既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也是对其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改造和升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恰是根植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深厚底蕴与独特基因,拥有了自身

的特色。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这种多元一体的格局,既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也为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与制度保障。通过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凝聚共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迈向新的高度。

三是展示了多样文明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基石。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性建设发展离不开多样文明的世界。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多元文明的世界里始终保持开放的姿态,积极学习借鉴任何外来先进文明,来求得自身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应对国际环境的风云变幻,中国共产党从刚开始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到不久后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以苏为师”,到“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说明了在多元文明世界中,中国从意识形态的阶级冲突中走向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求同存异,寻找自身文明发展的主体性。改革开放之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发展之路,即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合作,发展自身文明的主体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时代更是把对外开放作为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基本国策,坚定扩大对外开放,用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在互利共赢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正是基于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从“一化三改”“两个文明”“三个文明”“四个文明”“五个文明”到整合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多元文明交流互鉴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两个结合”,其文明特性在于对西方现代化模板的系统性超越,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文明呈现,即摒弃了西方现代化中资本积累与人民贫困、物质丰裕与精神贫瘠、资本与生态对立等问题,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文明形态,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

(二)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实意义

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是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差异中寻求共处、

在融合中创新发展,推动中国主流文明从传统迈向现代,彰显了其强大的发展动力与活力,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不仅内涵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而且,更能体现出文明发展的中国特色,突出体现在路径上的包容,展现了在多元文明共处中的文明多样性和共同发展的切实可行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进程充分彰显了当文明发展以“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导向和利益格局时,能够与生产力发展形成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局面,进而更有力地推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以及文明的创新发展。

其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路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深刻内涵。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体现,而非意识形态的对立产物。文明之间不存在固有的冲突,所谓的文明冲突,在阶级社会里实质上是不同利益主体在资源、市场、话语权等利益分配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阻碍所导致的冲突。当今世界正经历新的动荡变革期,各种矛盾冲突日益突出且复杂多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向世人展示了“和合共生”下的一个现代的文明秩序。和平共处、和而不同、和衷共济、共同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路径,为当今世界应对矛盾和挑战、促进和平发展提供新出路。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构建,是在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凝聚力量,以开放包容的推进融合发展,坚守自身文明独特价值,促进不同文明在平等、尊重、合作的基础上共同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高放.马克思恩格斯要论精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1.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4] 陈映霞.在交流互鉴中拥抱世界多彩文明[J].光明日报,2019-8-28.
- [5] 费孝通.论文化自觉[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 [6] 习近平.从星球生命本源悟文明多样性[EB/OL].<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6/0123/c1003-28078215.html>,2016-1-22.
- [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8]汪晓东,李翔,王洲.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团结进步重要论述综述[N].人民日报,2021-8-23.

[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10]金帅,杨长福.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下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逻辑[J].社会主义研究,2024(4):45-54.

[11]邹绍清.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要义、价值意蕴及实践遵循[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6):65-75.

Explo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Development Path for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Zhuang Qing-rong

(Meizhouwan Vocational Technology College, Putian Fujian 351119, China)

Abstract: The world today is undergoing a new period of turbulence and transformation, where various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ar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complex. However, despite the existence of interest-based rivalries among nations, win-win cooperation remains the trend of our times. Confronted with the critical question of “Where is human civilization head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presents to the world a modern civilizational order rooted in “coexistence in harmony”. Its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exemplifies a path for diverse civilizations to thrive, demonstrating that a pluralistic yet integrated pattern of mutual prosperity is achievable. This powerfully debunks the Eurocentrism/Western-centrism that impedes cross-civilizational exchanges in the new era, contributing “The Wisdom of China” to global civilizational dialogue.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civilization per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significance; pathways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新疆地区红色文化旅游开发的实践路径研究

汤贇璐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新疆是红色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拥有丰富多样的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好新疆的红色旅游对于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红色文化旅游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结合新疆红色旅游文化资源类型论述了红色旅游对于“铸牢”工作中增强“四个认同”、树立“四个与共”、把握“四对关系”的具体价值;给出了利用新疆红色旅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新疆;红色旅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简介]汤贇璐(1999—),女,湖北恩施人,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民族学硕士,研究方向:民族学、旅游民族学。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3009>

[中图分类号]D633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一、红色文化旅游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

红色文化旅游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在革命斗争、国家建设与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伟大精神遗产为核心载体,通过系统性整合革命旧址、纪念馆、历史文献、口述史料及现代化展陈技术,构建的主题性文旅活动体系。其本质是政治教育、历史传承与文旅体验的三维融合。

(一)红色文化景点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的天然教育基地

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上各类人群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浸润中,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近代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由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走向自觉的民族实体,并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人们共同体。它是马克思所说的“真实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历史客观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心理意识,即对中华民族的最高认同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华民族的使命感、归属感、荣誉感。

红色文化是这数百年来党和人民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艰苦奋斗历史的见证。通过对红色景点的游览,以红色旧址、红色文物以及相关文献为物质载体,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AR战场还原或者通过AI技术直接与先烈对话,亲身了解到先辈们抛头

颅、洒热血为祖国建设发展、为新疆建设发展的故事,增强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并且自觉参与到红色文化传播。新疆红色文化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新疆人民的关切,是各民族支援新疆的团结一心,是新疆人民自己谋求发展的殷切渴望。发展红色文化旅游,搭建红色文化平台,把红色文化景点建设成天然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从而更牢固地树立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二)红色文化是营造文化润疆氛围的重要抓手

文化润疆是由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重要内容之一。文化润疆为新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统领、强大的精神支撑和广泛的凝聚共识。文化润疆重点是在一个“润”字。“润”字在辞典中本意指雨水下流,滋润万物,《春夜喜雨》中写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文化是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中不可忽视的领域,它看似抽象,实则对于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起着指导作用,是党和政府不能忽略的战略阵地。在西方国家不断输出意识形态的当下,我们对于新疆的文化工作不仅要去做,而且更要做好做扎实,应该像春雨一样,慢慢浸润渗透在泥土里面,摒弃枯

燥生硬的说教,采用生动有趣的宣传方式。而红色文化显然就是营造文化润疆氛围的重要抓手之一。红色文化旅游本身就是一本生动感人的实践教材,与课堂和会议上无聊的授课讲学不同,它让参观者身临其境感受红色文化氛围,起到环境育人的作用。红色文化旅游是红色文化+旅游模式,落脚点依然是旅游,只是以红色文化资源为载体,让游客在参观中就主动了解新疆近代反帝反封建历史、各族人民屯垦戍边建设新疆的故事和中国共产党为新疆发展和民族团结所做出的流血牺牲,潜移默化培育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四个认同”,为新疆的稳定繁荣提供文化精神力量。

二、新疆红色文化类型及其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

目前为止,新疆地区共有10处景点入选全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34处景点是自治区重点红色旅游景区,86处地区级重点红色旅游资源,其中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4处红色景点被评为全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除开孤立的景点之外,新疆红色旅游还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路线,“西路军进疆红色旅游线路”和“屯垦戍边旅游线路”是只有在新疆才能体验到的特色红色旅游路线。

结合新疆红色种类,将新疆红色文化类型大致分为近代民主革命文化、屯垦戍边文化、民族团结文化三类。

(一)近代民主革命文化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对新疆各民族人民的命运非常关注,在党的几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讨论到了新疆问题。除了研讨新疆问题,还有一批批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来到新疆,活跃在天山南北。以毛泽民、林基路、俞秀松、陈云为代表的中共党员为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新疆的和平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今天新疆依然保存着当年他们工作、学习的旧址和纪念馆,是新疆红色旅游的重要内容。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乌鲁木齐)、红军西路军进疆纪念馆(哈密)、乌鲁木齐市烈士陵园。除了革命旧址、革命纪念馆、革命烈士陵园、革命史迹等不可移动的红色遗迹和红色设施资源,新疆地区作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新疆人民为抗日战争的物资运输贡献了巨大力量,因此还有很多流传至今的抗日人物传记、抗日史料少数民族抗日歌谣、舞蹈作品等非物质类的红色文化,也成为游客前往新疆探寻红色记忆的重要吸引力,这部分红色文化资源也待进一步收集整理,形成一个系统,为

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好地发挥作用。

(二)屯垦戍边文化

屯垦戍边在中国自古有之,是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边疆地区的重要策略。中国共产党结合当时新疆现状,借鉴历朝历代屯垦戍边的经验,在1954年组建了第一批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1968年至1971年期间,党中央根据国内需要和当时的国际形势,依托五十年代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经验,又新建了12个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总共组建了包括新疆建设生产兵团在内的13个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开展生产建设。之后在1972年至1975年所有兵团被撤销,直到1981年,中央又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继续履行屯垦戍边的伟大使命。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后大批热血青年积极报名,放弃家乡、大城市的舒适生活,从内地来到新疆广袤的戈壁沙漠,奉献自己的青春。在兵团各级干部职工的努力下,一座座国营农村、牧场、工厂在新疆拔地而起,新疆的教育、卫生、经济、文化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一批批工、交、建、商企业相继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新疆发展的贡献是前所未有的,也形成了新疆独有的“屯垦戍边”红色文化。目前以屯垦戍边文化为主的红色文化旅游景点有石河子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博物馆、农一师阿拉尔市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克拉玛依一号井,其中具有中国军垦第一城的新疆石河子市整个城市的建设发展都体现出了兵团屯垦戍边的伟大精神。

(三)民族团结文化

新疆地处祖国的西北边疆,是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自古以来,就有各个不同的民族在此共同繁衍生息、互通有无。民族团结对于新疆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从汉武帝在新疆设置西域都护府开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有无数的先辈为了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抛头颅、洒热血,这其中有新疆人民,也有祖国其他地区的人民。新中国成立之后,西方国家一直试图利用恐怖组织势力扰乱新疆民族团结、分裂我国领土,还发动了一系列暴恐活动,给新疆人民的财产和生命都带来了巨大伤害。在这种时刻,新疆各族人民发挥了团结一致的精神,无论是普通群众还是人民警察,都为民族团结、新疆稳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正是民族团结对于新疆的独特意义,使得新疆发展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红色民族团结文化,这种红色民族团结文化也对新疆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典型展现民族团结的红色旅游景点有新疆新辉红色记

忆博物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物馆、博尔塔拉纪念园等。

(四)新疆红色文化资源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

以上三种文化类型都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在不同历史阶段下创造出来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区域特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这些红色文化资源对于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五个认同”和“四个共同”意识、正确把握“四对关系”具有重要的内在价值。

近代民主革命文化、屯垦戍边文化和民族团结文化有助于引导各族人民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近代民主革命文化展现了在亡国灭种之际,各族人民一同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坚决斗争的历史经过和光辉事迹,展现出新疆人民在保卫祖国、抵抗侵略中的不屈精神,从近代历史上就说明了新疆人民一直与祖国、与其他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

近代民主革命文化、屯垦戍边文化和民族团结文化有助于引导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这些红色文化历史说明了新疆人民保卫祖国边疆和领土完整的历史事实,增强了当代新疆人民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说明了新疆文化自古就是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增强了新疆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走特色社会主义是正确的选择,增强了新疆各族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说明了党中央对于建设新疆的决心、信心,呈现了新疆在党的指导下走向富强的新风貌,增强了新疆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近代民主革命文化、屯垦戍边文化和民族团结文化有助于各族人民形成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即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在民主革命、屯垦戍边、民族团结事业中,不仅有汉族的努力,还有千千万万维吾尔族同胞、哈萨克族同胞、柯尔克孜族同胞……的贡献。通过宣传教育各族同胞的红色光辉事迹,能让一些西方谬论不攻自破,让群众、青少年们能更深刻理解“四个共同”是在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客观事实,

不随主观意愿的改变而改变。

对近代民主革命文化、屯垦戍边文化和民族团结文化的认识和学习,有助于新疆各级干部在开展工作时更好地把握“四对关系”,即“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

总之,红色文化旅游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机体的核心构成,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物化表达与价值传导功能,在国民意识培育与公民精神塑造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石作用。其本质在于通过革命历史场域的情景化叙事——从井冈山的星火燎原到延安窑洞的艰苦奋斗,从大庆油田的创业史诗到酒泉卫星的科技腾飞——将抽象的政治认同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内化的具身体验,使游客在触摸弹痕斑驳的战场遗址、操作模拟垦荒的劳动工具、聆听亲历者口述历史的过程中,完成从“历史旁观者”向“精神传承者”的身份跃迁。这种沉浸式教育机制不仅唤醒个体对民族复兴历程的集体记忆,更催化形成以“四个自信”为内核的价值自觉:当青年学子在红军长征纪念馆体验VR血战湘江的悲壮,其生成的已非简单的历史知识,而是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深刻体认;当多民族家庭在新疆军垦博物馆协作纺制棉线,劳动实践中自然生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皈依。由此,红色基因中淬炼的井冈山精神、抗联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屯垦戍边精神等宝贵财富,便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养料,通过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个认同”,构筑起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长城。

三、新疆红色旅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一)深入挖掘新疆红色文化历史内涵,开发共有中华文化符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代传下去。”红色文化资源是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天然养料。要把各地州的红色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可以从两方面入手:

深入挖掘新疆红色文化历史内涵。新疆红色故事丰富。但是缺乏独立系统的整理并且对一些红色故事的理论解读也远远不够。红色文化是新疆思政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对于红色文化的解读要结合时代要求,跟上新的理论。目前很多

红色故事还只停留在单纯地讲故事上,多以情感层面上的解读为主,缺乏理论高度,没有历史内涵。要讲红色故事,就不能只讲红色故事。要对红色故事背后的各民族几千年来血脉交融的历史内涵进行挖掘,立足于“五个认同”,多与高校和研究所合作,精细分工挖掘各类红色故事的历史内涵。

开发红色文化中各民族共有的中华文化符号。具象化的文化符号能更好地塑造自我身份认同,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概念转化成更具体化、可视化的共有的精神文化符号有助于人民群众更好地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在红色文化中,有许多文化符号和文化形象是超越族群界限的,各个民族都能感受到其中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并为之动容。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红色文化符号和形象,加以提取整合,打造成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再将这部分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宣传出去,反哺当地红色文化旅游的发展。

(二)利用数字人文发展,宣传新疆红色旅游景点

在当今这个智能时代,网络媒体已经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在发展红色旅游时应该充分利用数字人文技术的蓬勃发展,寻找新的途径和新的增长点。首先,新疆地区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各种红色遗址、纪念馆、博物馆遍布新疆地区。但是由于新疆地广人稀,且经济水平在客观上与东部沿海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疆外游客对于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的许多精细化、可视化、个性化的体验要求还不能满足。数字人文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可以对新疆红色旅游资源进行更好的整合,通过大数据来搜集、处理新疆红色资源,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数据库,更加精准化地推送到游客面前;也可以对游客的多样化需求进行量化,来进一步改善新疆红色文化旅游模式。

数字人文技术也有助于宣传红色旅游景点。不能有“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想法,等着游客主动找上门,要积极主动在各个社交渠道上结合最新的热点大力宣传新疆红色旅游。新疆旅游业一直发展良好,但是更吸引疆外游客的一直是新疆的自然风光和民族特色风情,来疆进行红色文化旅游专线的还是少数。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对于新疆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的宣传力度不够,很多疆外游客不了解新疆的红色故事。利用数字人文技术,结合媒

介传播,产出优秀的宣传作品,利用短视频、电影、电视剧等的影响力,增强对新疆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的宣传。

(三)培养景区服务意识,打造新疆红色旅游品牌

旅游本质上是服务行业,想要发展好旅游业,就必须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从政府层面上,要建立健全红色旅游相关机制体制。旅游相关部门需要强化自身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一方面改变落后的思想观念,与时俱进,加强整体意识、重点意识;一方面建立健全对旅游部门、旅游企业的奖励机制。各个部门要重视收集和及时处理景区游客反馈的问题,对于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上发挥重要作用的红色旅游景点,地方部门要积极给予奖励,促进其工作的积极性,也给其他红色景区做出良好示范。

从景区层面来讲,要提升员工的专业性和综合素质,要不断提升红色文化认知,坚定自己的政治站位。在对待各地区游客时,要以真挚的感情向游客宣讲红色故事。此外,景区还可以和学校、机关单位合作,培养具有专业红色知识、旅游知识的从业人员。

参考文献:

- [1]朱贞,张建军.文化援疆:新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逻辑选择及其实现路径[J].兰州工业学院学报,2024,31(2):132-137.
- [2]黄丽明,焦黎,布丽布丽·阿赛提.新疆红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格局探析[J].喀什大学学报,2022,43(6):29-35.
- [3]罗利华,付鹏飞.中国共产党领导屯垦戍边的光辉历程及经验启示[J].兵团党校学报,2022(4):147-153.
- [4]阿克拜尔·吾斯曼.发挥民族文化资源优势 推进新疆文化统战工作[J].实事求是,2010(3):103-105.
- [5]李利芳,谷润润,周杭,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新疆民族团结故事的整理与构建[J].中国民族博览,2021(23):98-100.
- [6]邓磊,罗欣.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路探析[J].社会主义研究,2018(6):24-30.
- [7]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J].求知,2021(6):4-10.
- [8]马岩龙,胡可杨,朱佳焯,等.数字人文视域下新疆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J].兰台世界,2024(4):125-129.

Research on Practical Approaches to Developing Red Tourism Resources in Xinjia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ANG Yun-lu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46, China)

Abstract: Xinjiang serves as a vital cradle of red culture, boasting diverse and abundant red cultural resources. Effectively developing and utilizing Xinjiang's red tourism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herent correlation between red tourism and forging this sense of community. Specifically, it examines how Xinjiang's red tourism resources enhance the "Four Identification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motherland, the Chinese nation, Chinese cultur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inforce the "Four Shared Concepts" (a shared community of life, values, responsibility, and future), and navigate the "Four Key Relationships" (ethnic unity and development,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stability and progress, local and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e context of community-building efforts. Finally, it proposes practical pathways to leverage Xinjiang's red tourism for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Xinjiang; red tourism resources;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互联网时代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与实践路径研究

夏欢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法律系,广东广州 510520)

[摘要]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先进文化,具有重要育人功能,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独特价值。互联网时代下,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性与挑战性并存。本文聚焦于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为提升红色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质效提出改进措施,包括推动课堂教学数字化转型、建设红色文化专属传播平台,并完善相关保障体系。最终,通过实现线上线下的协同联动,助力提升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的育人能效。

[关键词]红色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互联网时代

[作者简介]夏欢(1991—),女,湖南新宁人,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法律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第五届院级课题“互联网时代红色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与实践路径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3QN09)。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3010>

[中图分类号]G641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一、价值定位: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与育人功能

(一)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

红色文化是一种以颜色标识其本质内涵的文化种类,其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是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的伟大创造。放在我国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红色被赋予了深刻人文含义,其象征着热血与烈火,被赋予了希望、奋斗、牺牲、创造等象征意味,恰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品性情操、精神气质、共同理想相契合,寄托了中国共产党人无限的希望和崇高的理想。关于红色文化的含义,学界众说纷纭,但主流观点来看,其指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的先进文化与伟大精神。它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一种民族的、时代的、大众的文化综合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典型代表。

提炼各个历史时期红色文化的共性,可归纳出其重要特征包括革命性、人民性、阶级性、民族性等。也有学者进一步探究其中各特征之间的关系,总结出红色文化的基本特质在于政治性与人民性的统一、阶级性与革命性的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以及民族性与开放性的统一。

在形式表现上,红色文化可以分为器物、制度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三者相互联系,相互融合。

器物层面包括文献、遗址、纪念馆等客观物质载体,其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物质资源;制度层面包括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创造的理论、方针、路线等,是一切红色文化生产关系的总和;精神文化层面则是红色文化的精髓,集中体现为相关器物及制度所蕴含的革命精神。

(二)红色文化的基本育人功能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积淀形成的精神财富,承载着社会主义的道德理想与精神文明,凝结了革命先辈的崇高理想与家国情怀。作为引导青年坚定信念、涵养品格、提升素养的重要教育资源,它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将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其育人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红色文化有利于培育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弘扬民族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来说热爱祖国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红色文化的底色是爱国主义,其真实记录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谋求复兴的奋斗历程,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大学生通过学习革命先辈为国奉献的感人事迹,重温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历史,能够深刻理解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紧密联系,从而增强爱国情感与民族认同,主动践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其次,红色文化有助于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一方面,红色文化承载着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融合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可助力大学生群体把握规律改造世界,驱动其遵循规律发挥能动性。另一方面,红色文化蕴含的革命精神可塑造人,培育正确价值观与理想信念,引导大学生的行为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红色文化中的张思德精神、焦裕禄精神等榜样精神,能够感召青年。学习这些榜样,可以使大学生见贤思齐,深入理解个人与集体、奉献与索取、理想与现实的辩证关系,推动个人成长对接社会发展,达成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最后,红色文化可以激发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培育创新能力。改革创新是红色文化的重要内容。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部在困境中不断探索创新的奋斗史。从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到自力更生攻克科技难关的“两弹一星”精神,都体现了改革创新的精神特质。学习这一传统,有助于启迪大学生突破思维定势,激发追求真理的勇气,提升在复杂情境中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助力其成长为创新型人才。

(三) 互联网时代下的价值彰显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与文化价值多元交融的时代背景下,红色文化作为凝心聚力的精神支柱,持续发挥着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维护历史共识与民族认同的重要作用,其价值不可替代。同时,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也为红色文化育人价值的拓展注入新活力。互联网时代下,红色文化的育人价值突出体现在以下维度:

第一,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蔓延。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历史虚无主义以娱乐化、碎片化的方式扩散,如解构英雄事迹的“恶搞视频”等,严重侵蚀了大学生群体的历史认知。红色文化通过真实再现革命史实,能够有效制衡此类现象,为重大历史事件提供实证支撑。

第二,培育文化自信。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家园,更是中国人民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当前世界文化格局中西方文化仍占优势,而且借助互联网的广泛传播,外来文化对我国本土文化的冲击更为显著。尤其在认知仍未完全成熟的大学生群体中,仍存在较多文化自卑、崇洋媚外等心态。因此,有必要传承弘扬红色文化,以符合当代审美的方式提升红色文化感召力,激发大学生群体的文化自信。

第三,强化政治认同。互联网的开放性让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为复杂,对主流政治认同构成挑战。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承载着中

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历史逻辑,是强化政治认同的重要教育资源。通过网络广泛传播红色文化育人,能更有效地向青年群体传递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与奋斗历程,通过对红色文化政治理念的自觉认同,增强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秩序的认可。

二、现实困境:融入过程的矛盾解析

(一) 信息碎片化现象突出

一方面,红色文化在高校常规思政课教学内容中占比不足。当前高校思政课程大纲中,红色文化相关的内容有限。虽然部分高校在党课中会重点讲授,但党课主要面向入党积极分子,课时较短,讲授内容受限,导致教学的覆盖面与深度均显不足。这种教学安排的局限,直接影响了其在网络教育中的呈现,使得线上的红色文化相关内容也常呈零散状态。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碎片化传播方式亦不利于红色文化的完整传递。网络平台上的相关内容常割裂历史背景与脉络,使学生难以形成系统性的历史理解。此外,算法推荐机制可能加剧认知偏差:兴趣较低的学生接触到的内容往往较为浅显片面,而主动搜索的学生也易被局限在相似内容范围内。这导致原本内涵丰富的革命精神谱系在青年认知中被简化,从深刻的精神资源降格为单一的符号象征。

(二) 代际话语隔阂

当前红色文化教育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教育内容与大学生实际需求存在脱节。教育者习惯于采用宏大叙事进行教学,而年轻人则更关注个体的价值与体验,两者之间缺乏有效连接,导致红色文化教学内容吸引力不足。例如红色精神有时被简单概括为“艰苦奋斗”等概念,未能关联大学生群体关心的学业压力、职业规划等现实问题,难以激发其兴趣;同时,红色文化教学中使用的视觉元素也多为传统样式,不符合大学生群体偏好的现代设计风格,导致亲和力不足。

此外,目前网络红色文化教育模式以单向传播为主,多数线上教育停留于内容推送,学生主要通过点赞、评论等方式参与,缺乏深度互动。这种单向灌输的模式难以发挥学生主体性。而且,设置红色文化教育内容的相关平台也鲜少根据学员反馈优化内容,进一步降低了大学生群体的学习意愿,教育效果也因此大打折扣。

(三) 缺乏专属网络传播媒介

相较于综合性的传播媒介,专门针对红色文化传播构建的网络传播媒介能整合红色文化教育资源,对教学内容清晰地进行分类和编排,从而保障教育内容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但当前红色文化教育专属网络传播媒介的建

设严重滞后,仅有少数高校建立了专门平台并配备管理机制,绝大多数院校仍主要通过零散的社交媒体进行红色文化教育内容推送。而且,即使存在专属网络平台,其建设也常流于表面,在内容设置上过分突出政治教育功能,内容千篇一律,题材也十分匮乏,难以吸引大学生的关注。此外,对平台的持续运营和维护也存在缺位,导致平台内容更新缓慢、功能优化受限。

三、实践路径:多维融入的体系构建

(一)促进课堂主渠道的数字化转型

将红色文化深度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关键在于巩固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相较互联网信息的碎片化,课堂教学通过完整的教材体系、教学大纲,以及课时规范,可以构建起逻辑严密的知识框架,清晰呈现红色文化的历史脉络,克服当前可能存在的认知碎片化问题,帮助学生更好地把握红色文化的核心要义。而且,教师通过课堂互动,以及创设相关情境,可引导学生从历史及现实等多维度深化对于红色文化的理解,减少网络学习中常见的理解表面化问题。因此,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为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应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课堂教学数字化转型,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共生的红色文化教学新模式。

在线下课堂实践中,核心是将红色文化资源通过互联网技术手段,有机融入思政课堂教学内容。具体来说,应当在保持知识体系完整的前提下,让技术手段真正服务于教学内容的深化。举例来说,可以依托信息技术的数据分析功能,探索个性化教学,根据学生的学习反馈因材施教,提升教学针对性。基于大数据反映的学生认知差异,实施分层教学,并结合不同专业背景提供不同的教学内容,找到其所学专业内容与红色文化的契合点,例如对理工科学生,侧重红色文化中的科技探索相关内容;对文科学生,则强化对于红色文学经典的解读。

在线上教学拓展中,则需着力建设红色文化主题网络课程,打造功能完备的思政云课堂平台。目前,高校普遍借助慕课、智慧树、超星学习通等平台开展网络教学,致力于将红色文化资源整合为形式多样、生动的数字化教学内容。为充分释放思政云课堂潜力,还需要进一步优化课程设计,增强教学互动。课程设计上,应优化教学大纲编制与授课方式。大纲设置中应当进一步增加红色文化教学内容,构建完整系统的学习框架,并要求在平台开展相关教学的固定频率。授课方式则要根据大学生群体的信息接收偏好,以及互联网传播的特点进行创新,融入图文、音视频等学生喜爱的多媒体元素,并灵活运用启发式教学、情景教学等方法,增强趣味性和吸引力。此外,还可以从课前和课后环

节发力,提升教学互动性。课前环节,教师可以围绕课程主题,精选红色文化资源作为预习材料,要求学生提前熟悉并在线提问。这有助于引导学生自主探究、激发其学习兴趣,同时使教师能够根据学生的线上预习反馈,优化线下教学内容。课后环节,教师可以设置针对课堂所学内容的线上测试和讨论。通过这一环节,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巩固并深入思考所学知识,在反思中查漏补缺;另一方面,教师也可据此准确评估教学成果,追踪学生的学习情况,持续提升教学质效。

(二)构建多元化的专属传播媒介

除课堂教学主渠道外,也应发挥网络宣传教育的作用,构建红色文化专属传播媒介体系。当前,大学生思政教育中对红色文化的网络宣传,主要依托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学习强国等综合性平台进行。然而,这类平台的红色文化相关内容往往形式单一,相关知识的呈现不够系统深入,传播深度和吸引力有限,导致红色文化线上教学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

欲破解此困境的关键,在于创建聚焦于红色文化本身的专属传播媒介。相比于综合性的信息传播媒介,这类专属媒介能更系统地组织红色文化教学内容,形成完整知识框架,帮助学生避免碎片化学习的问题。同时,专属媒介也更为契合大学生群体的信息接收偏好,它们可以灵活采用短视频、互动话题或趣味问答等形式,让相关教学内容更亲切有趣,也让学生更愿意主动参与。而且,高校通过开设红色文化教学相关的专属传播媒介,还能够集中力量打造特色品牌,让红色文化传播更有辨识度。

具体来说,高校可重点打造以下专属传播媒介,构建多元化的传播媒介体系。首先,可以在微信、微博等学生常用的网络社交平台开设红色文化专属账号,设置理论知识、精神解读、历史纪实等专题栏目,定期更新相关专题内容的推送。其次,可以搭建红色文化专题网站,同样设置相关专栏,并提供红色文化学习资源下载服务,由此形成红色文化学习的完整体系。最后,还可以开发红色文化专属移动应用软件,收集学生在应用中的学习数据并进行分析,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推荐,增强线上教学针对性。

(三)完善保障体系

要确保红色文化教育实践路径取得成效并持续畅通,离不开完善的保障体系支撑,否则再好的设计也难以持久运行。因此,必须着力构建包括物资投入、人才队伍、体制机制、观念认知在内的多维保障体系。

资源投入是保障体系的物质基础。经费应优

先保障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工作,开展珍贵史料、文物和口述历史的采集与修复,据此建立智能数据库,为红色文化的线上线下教学提供丰富、准确的基础素材。同时,教学设备和学习数据分析所需的软硬件也需及时更新。此外,专属传播平台的长期维护、内容更新与技术稳定同样也需要稳定的资金支持。

提高教学队伍的创新力是完善红色文化教育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撑。当前红色文化教学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也反映出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学在红色文化传播上的创新力不足,究其原因是思政课教师对红色文化的理解深度和在数字化教学手段的应用上尚有不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推动不同学科背景之间的教师协作开发红色文化育人优质课程就显得十分有必要,同时,可以针对这一部分群体开展专门的培训,提升他们对红色文化的理解深度和创新应用方面的能力。

对红色文化教学成果进行科学评价是构建互联网时代红色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保障体系的主要抓手,要建立全面科学的评价体系,并根据评价结果不断优化教学模式。具体的评价内容应该包括学生对红色文化的理解深度、学生线上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及其对红色文化的认同程度变化,以便后续调整教学设计。在评价方法上,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平台学习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另一方面可以开展师生线上互评,依据评价结果优化教学方法。

此外,提升大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是完善互联网时代红色文化教育保障体系的基础工程。网络媒介素养是指网民对网络媒介及其信息的分辨、认知以及传播运用的能力。作为教育的接受者,大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直接影响利用互联网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因此,要着重增强大学生对于网

络信息的分辨能力,帮助他们在复杂网络环境中明辨是非。同时,要加强对大学生深度阅读与思考习惯的培养,避免其碎片化阅读习惯对红色文化教育效果产生的负面影响。此外,还可以鼓励大学生积极运用短视频、动漫等形式创作富有感染力的红色主题网络文化作品,提升其在红色文化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增强其学习意愿。

参考文献:

- [1] 刘润为.红色文化论[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4):7-9.
- [2] 沈成飞,连文妹.论红色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其当代价值[J].教学与研究,2018(1):97-104.
- [3] 李水弟,傅小清,杨艳春.历史与现实:红色文化的传承价值探析[J].江西社会科学,2008(6):159-162.
- [4] 周宿峰.红色文化基本问题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4:7-14.
- [5] 刘琨.红色文化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5:18-27.
- [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7] 史杰.新时代红色文化的价值实现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22:54.
- [8] 罗永宽,李燕.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与当代价值[J].文化软实力研究,2017(2):11-12.
- [9] 李子雯.全媒体视域下红色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研究[D].南京:南京邮电大学,2022:45-47.
- [10] 陈俊.网络时代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探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4(19):91-92.
- [11] 郭瑜聪.红色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提升的作用及优化路径研究[D].兰州:兰州理工大学,2024:53.
- [12] 丁翠玲,刘斌.大学生媒介素养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13] 陈虹颖.“互联网+红色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探索[D].重庆:重庆工商大学,2018:53-54.

The Value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of Integrating Red Culture into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Internet Era

XIA Huan

(Guangdong Justice Police Vocational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20, China)

Abstract: Red culture is an advanced culture form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periods. It carries significant educational value and plays a unique role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Internet era, integrating red culture into higher education'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esents both feasibility and challenges. This study, 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Internet era, proposes measure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red culture in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se include promo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establishing dedicated communication platforms for red culture, and improving relevant supporting mechanisms. Ultimately, by achieving synergy between online and offline efforts, this approach aims to enhance the educational efficacy of red culture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red cultu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nternet era

习近平经济思想融入“原理”课的时代价值与实施路径

曾红艳, 荣霞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南京 210038)

[摘要]习近平经济思想融入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有助于新时代青年在追本溯源中深刻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提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习近平经济思想融入的教学结合点有三个维度,即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创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创性贡献以及所彰显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与目标指向。习近平经济思想有效融入的实践路径在于:一是坚持学理深耕,学思践悟习近平经济思想;二是坚持技术赋能,着力推进课堂教学数字化创新;三是坚持在地实践,着力推进认知成果转化。

[关键词]习近平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路径

[作者简介]曾红艳(1990—),女,江西吉安人,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荣霞(1979—),女,江苏盐城人,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当前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研判与应对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20SJZDA147);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习近平经济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2SJSZ0159)的研究成果。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3011>

[中图分类号] G641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习近平经济思想构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学说,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2025年3月出版发行的《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是学习贯彻这一思想的权威教材。将习近平经济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培养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的新时代青年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以下简称“原理”课)是高校思政课的基础性理论型课程,在思政课程中居于重要地位,是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同和理论自信的“排头兵”。将习近平经济思想有机融入新时代“原理”课的教学内容和活动场景中,能够在追本溯源的过程中助力青年学生深刻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守正创新,增强四个自信。

一、习近平经济思想融入“原理”课的时代价值

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青年无疑肩负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习近平经济思想有机融入新时代“原理”课是题中之义,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助力新时代青年在追本溯源中深刻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

通过“原理”课教学,结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方法,于追本溯源中深入分析和阐释,能够助力青年学生深刻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蕴含的鲜明的时代特征、丰富的思想内涵、强大的实践伟力、深刻的历史意义与世界影响。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领悟“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价值,强化政治认同。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习近平经济思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的继承和发展。例如,在脱贫攻坚战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要思想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指针,通过精准扶贫,中国实现近一亿人口脱贫,并衔接乡村振兴战略,以“数字乡村”“生态农业”等创新模式推动农村发展。在教学中引入这一案例,学生能够感受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情怀和历史担当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时代彰显。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溯源,解析“守正创新”的思想内涵,深化理论自信。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等一系列原创性理论。通过“原理”课教学,学生可结合马克思主义观点感悟其真理魅力,增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自信。例如,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世

界级难题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这一理论创新在实践中体现为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通过“负面清单”激发市场活力,以“产业政策引导”弥补市场失灵等,这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运用的鲜活例子。

第三,以马克思主义方法指引,见证“知行合一”的实践伟力,增强战略定力。习近平经济思想始终贯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并体现了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展开运用在实践中所形成的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波澜壮阔的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真理力量。通过“原理”课教学,学生可结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理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智慧,增强应对风险挑战的战略定力。

第四,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视野和世界眼光观照,把握“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意义,领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影响,深化文明自觉。习近平经济思想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新方案。例如,在全球化治理中,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通过“亚投行”“新开发银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通过“中老铁路”“雅万高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债务可持续性框架”回应发展中国家关切,给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答案,超越零和博弈、强权政治、冷战对抗的各种陈旧思维,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继承和发展。通过“原理”课教学,学生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发展与世界进步的互动关系。

(二)助力新时代青年提升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原理”课的核心目标在于提高青年学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能力。将习近平经济思想融入“原理”课教学,有助于推动青年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的循环中,提升这一实践能力。

首先,习近平经济思想本身就是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光辉典范。将这一思想融入“原理”课教学,能够让学生从中汲取智慧,直观感受马克思主义原理在现实中所蕴含的强大的生命力。例如,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中国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双轮驱动,以智能工厂改造提升钢铁、石化等传统产业效率,以机器人产业集群、新能源汽车基地培

育新增长极,充分体现了在改革攻坚中把握破与立的辩证统一智慧。教学中引入这一案例,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转化原理,分析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如何通过“破立并举”化解产业空心化困境,避免陷入“去工业化”或“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思维误区,从而感悟思想伟力增强能力本领。

其二,习近平经济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实践的沃土,在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壮阔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将这一思想融入“原理”课教学,以青年学生身在其中的鲜活案例为切入点,定能为其把握时代脉搏、增强“胸怀天下”的能力提供绝佳契机。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原创性思想为例,中国积极以“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推动经济全球化包容发展,在非洲工业化进程中,中国通过“中非合作论坛”“鲁班工坊”等平台,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务实合作,助力其建设基础设施、培育本土产业,通过技术转移、本土化人才培养等举措提升其自主发展能力,一系列务实行动正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坚持共建共享”“坚持合作共赢”的生动实践。结合案例,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去分析思考,能够以更加敏锐的视角、更加深刻的思考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在百年变局中增强全球视野和责任担当。

(三)助力新时代青年积极投身发展新质生产力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化,科技创新已成为百年变局中破局立新的关键变量。制约高质量发展因素还大量存在,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重大任务,“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并对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作出深刻阐释。青年是最具创新热情与创造潜力的群体,是未来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力军。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又一重要成果,又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要继承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理论有机融入“原理”课教学对于青年学生激发创新精神具有重要价值。

在教学中,结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原理,科学社会主义等原理,学生对新质生产力理论展开深入分析与阐释,能够深刻认识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历史意义,助力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所提供的发展机遇和条件,守正创新,积极投身时代浪潮。例如,结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学生能够认识新质生产力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要发展,深刻把握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渊源和科学内涵。又如,结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进行分析,学生能够深刻理解为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生发需以新型生产关系为支撑。

二、习近平经济思想融入“原理”课的教学结合点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创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创新,蕴含着强烈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以下从三个维度探讨教学结合点。

(一)讲清楚习近平经济思想所蕴含的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创新

在“原理”课的教学中,教师需要讲清楚习近平经济思想深邃的战略思维、科学思想方法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创新。

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方法论上以“六个必须坚持”为根本遵循,在对“六个必须坚持”的运用中形成了方法论体系。以“必须坚持守正创新”为例,这是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的充分体现。教学中可引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践案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构建产权明晰、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陕西袁家村走出的一条颠覆经典经济学的乡村财富创新道路就是一个“坚持守正创新”的典型例子。袁家村在发展中,面临着如何突破资源匮乏迈出发展的第一步,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防止两极分化,如何在保障公平的前提下持续维持效率、集体富裕、公共事业与家庭协调发展三个迫切问题。村委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方面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打造关中民俗体验地,发展乡村旅游,助力农民成为市场主体;另一方面,采取“村集体平台+经营性主体”联合方式,将弱小农户组织起来,规定景区每种小吃只允许一家经营,通过比较留下最佳口味,避免同类产品无序竞争,维护合理利润水平。毋庸置疑,袁家村走向共同富裕的实践是基层村委在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中坚持运用守正创新的方法、因地制宜推进制度创新的典型,是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生动展现,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真理的有力证明。

(二)讲清楚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创性贡献

在“原理”课教学中,教师需要讲清楚习近平经

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以权威教材《习近平经济文选》为依托,遵循“读原著—悟原理—重实践”的路径,引领学生用心感悟这一思想中蕴含着的一系列具有原创性与标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如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新质生产力等重要论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文选》的开篇,生动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根本立场、扎实推动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卓越贡献。在《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文章中,关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深刻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大创新。在《准确把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等重要文章中,对政府和市场关系作出的新定位,以及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所形成的坚实理论支撑,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理论的创新。在《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数字经济,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等文章中,则深化了科学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原则,揭示了新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特征和规律。而在《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把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高地》《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等文章中强调的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思想,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理论的创新。

总而言之,在“原理”课教学中,教师应深入剖析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创性贡献的内涵和意义,引导学生深学细悟,进而更好地理解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道理哲学原理,增强理论自信。

(三)讲清楚习近平经济思想彰显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

习近平经济思想融入“原理”课,要求教师不仅要在理论上讲清楚“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指向,更要在实践中展示这一价值指向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进程中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具体政策和行动,涌现出许多鲜活且富有成效的实践案例,成为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生动写照。教学中理应深度结合、充分运用。

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观、历史观一脉相承。在习近平总书记许多重要的论述中,如“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处处彰显着深厚的人民立场;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及作出的一系列新决策新部署中,人民立场亦贯彻始终。例如,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在实践中的制度设计,就全方位展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价值立场。又如,“双碳”目标的提出不仅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制度化表达,更蕴含着对人民生命健康权的终极关怀。当部分西方国家将气候治理仅仅视为“成本负担”时,中国却实施“风光电平价上网”“新能源汽车下乡”等多项政策,将生态价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再如,广东省佛山市积极运用习近平经济思想立场观点方法,去精准分析和有效解决问题,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推动产业链现代化,解决“卡脖子”问题方面取得了成效。

三、习近平经济思想融入“原理”课的实施路径

习近平经济思想融入“原理”课教学,需要考虑有效实施的路径。教师学好悟透习近平经济思想是有效融入的基石,坚持技术赋能,着力推进课堂教学数字化创新提高融入质量是关键,坚持在地实践,着力推进认知成果转化助推融入效果是有效载体。

(一)坚持学理深耕,学好悟透习近平经济思想

作为课程的直接引导者和传播者,思政课教师学好悟透习近平经济思想是融入效果的基石。一是要原原本本研读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相关著作和重要论述,认真全面学习《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重要原著,逐字逐句领会其中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通过反复研读,构建起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系统性认知框架,把握其内在的逻辑体系。二是加强学术研究与交流。积极参与各类学术研讨会、专题讲座等活动,与专家学者及同行教师深入交流学习心得和研究体会。关注经济学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尤其是关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最新解读和应用研究,将其与自己的教学实际相结合,不断拓宽学术视野,深化对这一思想的理解。同时,鼓励教师开展相关课题研究,深入探究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渊源、实践价值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等,通过研究促使教师更为深入透彻地把握这一思想,从而达到用辩证的学理分析、彻底的理论阐释说服学生,

实现立德树人。

(二)坚持技术赋能,着力推进课堂教学数字化创新

在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背景下,将习近平经济思想融入“原理”课教学中,应充分运用现代数智技术,为课堂教学带来全新的变革与创新。首先,搭建融入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核心命题—经典理论—政策文本—实践案例”四维数据库。可借助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整合相关的理论文章、实践案例、示范“金课”等资源形成服务于教学的系统资源库。第二,运用数智技术打造以学生为中心的数字化教学场景。采用教育数字化的手段,帮助呈现思想伟力,近距离、立体直观、置身其中地感悟习近平经济思想。例如,有关新质生产力领域的创新创业故事可制作成竖屏格式视频,通过学习通等智慧教学软件推送给学生,方便学生实时观看;开发相关智能体为学生提供个性化讲解和实时答疑,还可以模拟真实经济环境和经济问题,引导学生运用习近平经济思想进行分析和决策;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运用AR、VR等前沿技术,生动地呈现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历史场景和实践案例。

(三)坚持在地实践,着力推进认知成果转化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真理力量不仅体现为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上,更彰显于其对中国经济实践的強大解释力与指导性。因此,需因地制宜地开展实践教学,进行“原理”课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有机结合。教师可深入挖掘本地经济发展中的鲜活案例,驱动学生开展田野调查、政策听证、数据建模等实践活动,置身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及其鲜活故事所构成的社会大课堂中去感受,去体悟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习近平经济思想之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例如,组织学生参观本地高新技术企业,近距离走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成果,从而深化对“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理解。又如,安排学生调研乡村振兴示范村,亲眼见证农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生动局面,切身体会“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从而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多重观照中提升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融入效果。

参考文献:

- [1] 逢锦聚:构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学说[N].人民日报,2025-4-2(9).
- [2] 习近平.正确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14-5-28(1).
- [3] 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

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求是,2024(11):4.

[4]洪名勇.以新型生产关系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一个马克思理论的分析框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3):13-16.

[5]顾海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方法论创新[N].经济日报,2023-11-10(7).

[6]张孝德.乡村振兴——探索创新典型案例[M].北京:东方出版社,2022:46-56.

[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17(1).

[8]习近平.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23.

[9]郑庆东.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调研文集[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21:5-7.

The Significance and Path of Integrating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into the "Principles" Course

ZENG Hong-yan, RONG Xia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of Special Education, Nanjing Jiangsu 210038,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into the teaching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course in higher education carries significant significance. It enables the youth to profoundly understand the thought by tracing its theoretical origins and enhances their ability to apply Marxist principles in analyzing and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hought encompasses three dimensions: its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methodology, its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its embodiment of Marxist value orientations.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include deepening comprehension of the thought; promoting digital innovation in classroom teaching and promoting localized practices.

Key words: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course; teaching pathways

四川民族地区红色体育活动的开展与时代价值

李红运¹,陈振宝¹,何勇²

(1.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人文与国际教育学院,四川成都 610213;

2.四川炉霍县长征办公室,四川甘孜 610000)

[摘要]以四川民族地区红色体育文化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红军长征途中在四川民族地区开展的体育实践活动及其时代价值。通过对四川民族地区红军长征概况的梳理,分析了红军长征途中在四川民族地区开展的体育活动,包括甘孜州的红色体育活动、阿坝州的红色体育活动以及凉山州的红色体育活动。文章指出,四川民族地区红色体育文化具有革命性、简易性和民族性等特征,对当代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红色体育文化在促进历史文化遗产、指引现代体育事业发展、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增进民族团结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四川民族地区;红色体育;活动开展;时代价值

[作者简介]李红运(1985—),女,四川乐山人,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人文与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硕士,研究方向:红色体育。陈振宝(1979—),男,山东潍坊人,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人文与国际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民俗体育。何勇(1974—),男,四川炉霍人,四川省甘孜州炉霍县长征办公室,学士,研究方向:民俗体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红色文旅研究中心”课题“红色体育文化资源助力四川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模式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HSWL25C38)。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3012>

[中图分类号] G80-05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习近平总书记(2020)始终坚持“文化自信”,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充分挖掘和利用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资源加强文化建设”。红色体育文化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涵盖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各阶段,在革命精神传承和影响下,组织开展的体育文化活动带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阮涛,2023)。四川民族地区(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以下简称“三州”)作为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和红色体育实践的历史积淀,拥有规模可观、类型丰富、特色鲜明的红色体育文化资源,长征体育精神代代赓续,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凝聚人心、锻炼体魄、鼓舞士气的重要作用,而且在新时代依然承载着传承革命精神、弘扬民族文化的使命。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如何弘扬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四川民族地区红军长征概况

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次伟大战略转移,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寻求民族复兴,实现革命力量由弱变强、由失败

走向胜利的必然选择。四川民族地区地处中国西部,地势复杂,民族众多,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35年红军三大主力先后进入四川民族地区,开始了漫漫征程(表1)。

表1 四川民族地区红军长征概况

日期	红军长征途经地	行程概况
1935年5月至1936年7月	途经甘孜州磨西、泸定、道孚、炉霍等15个县市	红军三大主力先后进入甘孜州,历时15个月,行程约5700公里,在懋功建立了藏族苏维埃,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博巴自治政府,在瓦达、宜木、棒达、瓦角、觉如、达觉、棒古等地成立了各县、区、村(乡)博巴政权总计157个。
1935年4月至1936年8月	途经阿坝州卓克基、芦花、黑水、毛尔盖、亚弄等13个县市	红军三大主力先后进入阿坝州,历时16个月,翻越了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八座大雪山,三次征服沼泽水草地,是长征时期驻留时间最长的地区。

续表1

日期	红军长征 途经地	行程概况
1935年5月3日至29日	途经凉山州会理、冕宁、德昌、会东、普格等10个县市	红一方面军进入四川凉山州,历时26天,行程800余公里,占长征总行程6.8%,是红军长征总行程中全国市州行程最长的地区,成立了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发生了“巧渡金沙江”“会理会议”“彝海结盟”等重大历史事件。

红军长征在四川民族地区书写了光辉篇章。在重要会议方面,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四川民族地区召开的重要会议最多;在行程与时间方面,红军三大主力在四川民族地区行程远、时间久;在重要战役方面,红军长征在四川发生的重要战役最多;在行军条件方面,阿坝州是红军长征中行军最艰难的一段征程。长征途中环境恶劣是常人不能承受的,在敌军疯狂围追堵截的背景下,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党中央领导人很早就意识到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离不开体育运动以及强健的军民体魄,因此无论条件如何艰苦,战士们仍然利用行军休整、会师之机和传统节庆,因地制宜地举办各式各样的体育活动,以此提高战士们的身体素质、丰富文化生活,这些体育活动还在宣传党的救国方针、增进革命凝聚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重要作用。

二、红军长征在四川民族地区开展的体育活动

(一)甘孜州红色体育活动的开展

1936年3月,朱总司令率领近四万红军将士进驻炉霍。刚到炉霍时虽是春天,内地风和日暖,但是海拔3200余米的炉霍县却是冰雪封山、寒风刺骨,红军战士们没有被打倒,他们坚持每天跑操、爬山、训练、学习和帮助群众搞生产。红四方面军一连、二连、三连先后组建篮球队,后期还组建了营代表队,朱总司令也参与到篮球运动中,运动场上不分官职大小、人人参与。1936年4月16日炉霍红场委员会成立,并在寿灵寺内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了委员,组建了体育组、文化娱乐组,其中徐一新为体育组长,会议决定“五一”召开全军运动会,运动会口号为:“优胜的旗帜和光荣的奖品等着光荣的优胜者!”(辛娟娟,2021)。在前期准备中,红大负责布置马沟、墙、跳高、跳远、攀杠架等设备;党校准备赛马用的白土、红旗;保卫局准备篮球场器材;总部负责做乒乓球器具;四局负责做比赛旗帜。此次运动会不只是体育、文娱各项的比赛,

也是一次草原生存训练。朱总司令考虑到红军即将进入草地,茫茫草地无粮可补,柴草缺乏,只能以牛马粪作燃料,用来烧水做饭取暖,所以战士们需要熟悉使用牛粪作燃料的技术。于是运动会最后一天举行了烧牛粪比赛,烧牛粪最大的难度不在于把牛粪点燃,而是在燃烧过程中学会正确使用藏族特有的工具——皮火筒,这是让火燃烧得更旺的关键技术。1936年5月30日、31日,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又组织了体育比赛,演习打骑兵、班的队形变换,学习刺枪、各种射击姿势、掷手榴弹、打拳、劈刀、跳高、跳远、赛跑以及战斗攻防等(李安葆,2002)。31日下午政治部洪学智主任对全军开展的体育活动进行了详细总结。

(二)阿坝州红色体育活动的开展

为了缓解战士们的紧张情绪、活跃部队文娱生活、迎接新的战斗、与群众联络感情,红军长征在阿坝州地区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体育活动,这些体育活动一般是在纪念日(“五一”“五卅”“八一”)、庆祝红军会师或部队休整期间举行的,比赛项目比较单一,有时甚至只是一场比赛,比赛器材也是手工制作的,比如把从藏民那里找来的羊皮卷起来,用绳子扎好当作“足球”,将猪的膀胱清洗、晾干,将羊毛塞进去,再用兽皮缝制成“篮球”,用树枝、竹竿制作简易跳高架等。

1935年8月红军在阿坝州毛儿盖召开会议,会议结束后举行了足球、跳高、跳远比赛,同月红一方面军在若尔盖草原举行了“草地接力赛”,包括红军小战士共计50多人参赛,毛主席亲自观看了比赛。1936年6月红军抢渡金沙江后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两军领导人决定利用整编和训练之机举行体育比赛和联欢会。23日上午,红四方面军与“太阳”篮球队举行了篮球友谊赛,由于双方长期行军作战,球艺略显生疏,但战士们个个生龙活虎,处处彰显着红军战士百战百胜的英雄气概。1935年7月1日,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与政治部在川西进行篮球赛。1935年7月14日,红五军团与红九军团午餐后举行篮球比赛。红军战士们还经常利用空余时间参与当地民俗体育活动,如射箭、赛马、马术、摔跤、推杆、角力、锅庄舞等,加深了红军与当地群众的革命友谊。

(三)凉山州红色体育活动的开展

红军长征在凉山时间较短,26天行程800余公里,日均行程达30公里,期间还发生了通安州战役、围攻会理城、华弹阻击战、富林镇战役,战士们面黄肌瘦、身心疲惫,加上物质匮乏,因此体育活动开展得比较少。据史料记载,红军在越西停留期间,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同志组建了游击大队,规定战士们

每天早晨五至六时、下午六至七时进行军事或体育操练,开展以加强战术训练为主的军事体育活动,如各种演习、刺杀、投弹等,其目的是提高军事训练水平、增强战士身体素质,为行军战斗服务。通过采访红二代王志国了解到,红军在会理休整期间,虽然当时条件艰苦,但是他们仍然开展一些简单的体育活动,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制作跳高架、木质单杠、土堆跳马等简易器材,进行跳高、跳远、跑步、跳越、跳马、拉悬垂、翻杠子等运动。红军的文艺工作者还主动学习少数民族的舞蹈,战士们与彝民一起进行打陀螺、射弩、摔跤、蹲斗等体育活动,促进了红军战士与彝民同胞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刘伯承司令与彝族首领果基小叶丹在冕宁举行了“彝海结盟”,争取到了彝民的大力支持,顺利借道凉山,为红军强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时间。

三、四川民族地区红色体育文化特征

(一)红色体育的革命性

红军长征的总行程超过六万五千里,日行军达74华里,几乎每天有一场遭遇战,平均走365华里才能休整一次,如此高强度的作战行动,没有一副“铁脚板”“硬身子骨”是无法完成的。长征途经四川段举办的唯一一次综合运动会——炉霍运动会,其召开绝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是我国红色体育文化的一个缩影,是长征体育的典型代表。长征期间开展的一切体育活动与军事训练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体育的强身功能、竞技拼搏精神与长征吃苦耐劳精神紧密结合,这是红色体育最显著的特征。面对敌人的疯狂围剿,在缺衣少粮的现实面前,党中央领导人依然高度重视战士们的体能训练,利用战斗间隙因地制宜开展训练比赛活动,并以身作则加入其中。在军队中采取军事化管理模式,坚持“普遍军事化,党团员军事化”理念,强调集体主义精神、纪律性、组织性,开展各种以加强战术训练为主的军事体育活动,如各种演习、出操,练习刺杀、投弹、绘图、测距、架桥、搭帐篷等,通过这些军事体育活动提高战士们的实际作战技能、体能,培养勇敢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意志,以满足战争需要。纵观历史,我军战斗力建设强盛时期往往也是军事体育开展比较活跃普及的时期。

(二)红色体育的简易性

由于物资匮乏,红军长征中举办的各种体育比赛和体育活动都比较简单,没有严格的规则,没有规定动作,没有专业的器材和场地,一切从实际出发,勤俭办体育、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小型多样、坚持经常,这是红色体育又一个标志性特征。战士们经常自创体育项目,比如背人赛跑、树枝制作高跷、土堆障碍越野赛等;战士们也自制各种体育器材,

比如用动物膀胱制作篮球球心,用羊毛制作足球,用石头代替铅球,用布条制作跳绳等。虽然比赛项目不多,比赛器材比较简陋,但是这些简单易行的体育活动在长征这一特殊背景下,不仅提升了战士们的体能和战斗意志,也为战斗中的士兵们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和激励。

(三)红色体育的民族性

四川民族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地,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红军长征途经四川民族地区,战士们也参与了一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如红军途经阿坝州时与当地群众一起赛马、摔跤、投壶、跳锅庄,途经凉山州时战士们与彝民一起打陀螺、射弩、蹲斗等,参加者有时和群众一起穿着民族服饰,比赛时使用民族的体育器材和比赛规则,这些传统体育活动承载着民族的历史、故事和信仰,传递着民族的文化精髓。这些体育活动增强了战士们的体质,加深了红军与当地群众的革命友谊,增进了民族团结,为长征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四、四川民族地区红色体育文化当代价值

(一)促进历史文化传承

红军长征途经四川民族地区时开展了大量的体育实践活动,这些活动不仅锻炼了战士们的身体,增强了队伍的团结,也为当地民众带来了体育文化的熏陶。然而,由于战争频发、地震破坏等各种历史原因,革命时期的部分体育设施、器材以及相关历史遗迹不复存在。这无疑给今天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笔者2023年、2024年先后对“三州”地区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目的是搜集和保护那些珍贵的红色体育文化遗产。通过这次调查,笔者收集到了一系列物质形态的资源,包括炉霍运动会队旗、画册、墙报、校刊、唐卡等,这些实物不仅反映了当时体育活动的盛况,也体现了红色体育文化的丰富内涵。同时,笔者还搜集到了大量的非物质资源,如运动会口号、军歌、体育游戏等。这些非物质资源以其独特的方式,传递着红色体育文化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如团结协作、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等,这些精神价值至今仍对四川民族地区的民众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们是民族地区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为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

(二)指引现代体育事业发展

革命战争年代,物质条件极为有限,生活环境非常艰苦,党中央领导人组织战士们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体育活动,倡导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实事求是办体育。这种办体育的理念,体现了对资源的高度珍惜和合理利用,以及对实际情况的

深刻把握。它要求战士们在不脱离实际、不超越条件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开展适合当时环境的体育活动。这种精神,实质上是对节俭、务实、创新等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节俭办体育赛事理念,与革命战争年代的办体育理念一脉相承,两者都强调在体育赛事的组织和筹备过程中,要遵循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原则,强调根据实际情况来办事,不盲目追求形式和规模,注重实际效果。这种理念是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坚守,也是对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响应。

(三)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红色体育+”产业模式大有可为。四川民族地区的红色体育文化资源类型丰富、独具特色,如红军长征路线、长征体育文化公园、革命烈士陵园、红色教育基地等,这些资源为“红色体育+”产业模式提供了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整合这些资源,可以打造红色体育+民俗、红色体育+露营、红色体育+赛事等模式,提高红色体育旅游吸引力;探索红色体育+研学、红色体育+亲子体验营等模式,提高红色教育与体育活动的融合度,吸引不同群体参与体验,从而带动旅游、交通、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引导社会资源流向民族地区,助力当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四)增进民族团结

红军长征途经四川民族地区时,革命军队在紧张的战略转移之余,亦积极参与到当地的民俗体育活动中,以此作为团结民众、巩固革命力量的一种

手段。士兵们不仅投身于军队内部的体育训练与竞赛,如军事体育操练、队列行进等,同时也深入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中,与当地民众共同参与赛马、摔跤、投壶、蹲斗等传统民俗体育项目。通过体育活动的共同参与,红军不仅传播了革命理念,也促进了民族团结和民族自信心的培养。与此同时,这些活动也展现了少数民族人民对外来文化的适应与尊重,这种文化适应不仅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也有利于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五、结论

四川民族地区红色体育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承载着革命先辈们的奋斗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深入挖掘和传承红色体育文化的内涵,将其与现代体育事业发展相结合,发挥其在促进民族团结、文化传承、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通过创新“红色体育+”产业模式,推动四川民族地区体育事业的繁荣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 李安葆. 长征路上的体育活动[J]. 福建党史月刊, 2002(2): 19-23.
- [2] 阮涛. 红色体育文化的历史特点与时代价值[J]. 现代商贸工业, 2023(6): 75-78.
- [3] 习近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乘势而上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N]. 人民日报, 2020-5-13(1).
- [4] 辛娟娟. 中南红色苏区群众体育资源开发与配置研究——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例[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11(3): 132-136.

The Development of Red Sports Activities in Ethnic Regions of Sichuan and Their Contemporary Values

LI Hong-yun¹, CHEN Zhen-bao¹, HE Yong²

- (1.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ichu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Chengdu Sichuan 610213;
2. Luhuo County Long March Office, Ganzi Sichuan 610000,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red sports culture in Sichuan ethnic area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orts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their contemporary value carried out by the Red Army during the Long March in Sichuan ethnic areas. By summarizing the overview of the Long March of the Red Army in ethnic areas of Sichua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orts activities carried out during the Long March in these areas, including the red sports activities in Ganzi Prefecture, Aba Prefecture, and Liangshan Prefecture.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red sports culture in ethnic areas of Sichuan has revolutionary, simple, and ethnic characteristics, which have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ports. At the same time, red sports culture has significant contemporary value in promoting the inheritanc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ports,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thnic regions and enhancing ethnic unity.

Key words: ethnic minority areas in Sichuan; red sports; activity implementation; contemporary value

基层政府工作作风优化路径研究

蒋满华¹, 姚佳²

(1.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广东肇庆 526000;
2.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广东东莞 523000)

[摘要]本研究借鉴国内外理论和实践,系统探讨了优化基层政府人员工作作风的途径,提出了多维度的对策建议,通过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案例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从理论理解和实践创新两个维度进行探索。针对基层行政机关存在的形式主义、服务效率低下和“微腐败”等现象,本研究认为,建立“政策支持、制度约束、文化培育”三维协同机制,可以有效解决各种痼疾。与此同时,依托对江浙地区“数字政府”改革中的成果的重点分析,构建了基于公众满意度的作风评价指标体系,为推进基层工作作风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基层政府;工作作风;优化路径

[作者简介]蒋满华(1982—),男,广西桂林人,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副研究员,公共管理博士,研究方向:公共管理和教育。姚佳(1983—),女,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讲师,本科。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肇庆市2024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层政府工作作风优化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4GJ-228)。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3013>

[中图分类号] D261.3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一、概述

基层行政机关肩负着政策执行、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重要职责,其工作作风直接关系到国家基层治理成效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关乎国家总体形象。从行政生态学的角度看,基层机关的工作作风既是制度结构的具体体现,也是组织文化的深刻反映,同时还受到技术创新和公众需求的多重影响。

当前,广大基层行政单位通过建设数字化政务平台、简化办事程序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服务效率,提升了人民群众满意度。但在实际工作中,形式主义、不作为、失职渎职等问题依然存在。部分公职人员服务意识差,责任心不强,与人民群众的目标存在明显差距,这凸显了改进基层工作作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基层政府工作作风的概念与评价

(一)概念

基层政府工作作风是基层公职人员履行职责的意识、行为和态度的总和,具体体现在政策执行、公共服务、民生服务、干群互动等方面。其内涵既包括制度规范的程序要求,也包括组织文化的服务意识,本质上是治理理念的基层实践形态。

《关于加强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了“为民务实清廉”的优良作风,要求干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以规范化、专业化的行政行为提升治理效能。在学术层面,这一理念具有三重属性:作为制度执行终端,它受到层级规则和治

理需求的双向影响;作为服务主体,它直接影响政府的感知公信力;作为治理中枢,它需要动态适应数字化和协同治理的新范式。

(二)评价

首先,基层政府的作风评价需要构建多维度的观测体系,涵盖政策执行力、服务效能、群众满意度、廉洁勤政4个核心指标。世界银行的“政府效能指数”为我国提供了国际参考,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改革通过12项KPI指标搭建了地方经验模式。

其次,评价方法需要统筹主客观路径,前者依靠纪委监委等机构评估,后者通过政务“好评差评”等数字化工具获取反馈。中央党校的一项调查显示,31.6%的县区存在测评同质化、数据碎片化、新作风问题捕捉不足等问题。

再次,基层作风评价正在实现三个转变,评价主体转向政府、第三方、公众多元共评;数据采集升级为政务大数据监测;广东“作风指数”与干部选拔联动机制实现结果运用创新,印证了“公民立场”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价值。

三、当前基层政府工作作风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挑战分析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政策落实形式化。调研显示,一些基层单位将台账作为工作的“宝典”,甚至有些行政村为应付检查而故意准备台账,留痕过于明显。如江苏某县级市2023年统计数据显示,乡镇干部年均填表132

份,很明显,这种重程序轻实效的问题在很多基层都存在,甚至比较突出。

2.服务成效区域差距大。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覆盖率达到98%,但西部一些省份因财政匮乏,无力支撑政务服务网络全覆盖,覆盖率仅为61.3%;同时,因老年群体普遍数字化知识储备少,对数字终端的服务体验感满意度比中青年群体明显低很多。

3.“微腐败”屡禁不止。调查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基层“吃拿卡要”案件占比上升至42%,涉案金额5万元以下的占68%;同时,权力末端监督漏洞依然存在。如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省的“作风指数”监测显示,村级工程招投标廉政投诉量同比上升17%。

4.基层队伍实践能力不足。某省组织部门统计显示,35岁以下公务员占41%,但有基层群众工作经验的不到30%,导致基层工作效能不高,满意度低下,对年轻干部的投诉率居高不下。

(二)面临的主要挑战

1.监督体系与治理需求脱节。调查显示,2023年中西部地区56%的村级监督组织仍采用纸质台账登记方式,而工程项目招标电子化覆盖率早已达到82%,监督工作已明显不适应发展现状。另外,某县2022年查处的21起围标串标案件中,83%是通过篡改电子评标参数实施的,而传统监管手段难以精准识别。

2.群众参与机制双向梗阻。调查显示,2022年基层作风实名投诉仅占37%,而某省开展的“阳光评议”试点显示,群众对作风整顿的知晓率达76%,但主动参与监督的比例不足19%,这种“高关注、低参与”的现象在基层中普遍存在。

3.数字赋权能力断层。财政部“智慧监督”平台数据显示,县级以上单位预警信息处置及时率仅为市直部门的63%,某市纪委监委专项巡察发现,全市政务数字化覆盖率已达91%,35岁以下干部能熟练运用大数据审计工具的仅占28%,而某区惠民资金监管系统已建成使用三年,预警信息误判率仍高达21%。

四、基层政府工作作风优化的现状与实践

当前,国内外在优化基层政府工作作风方面做出了很多探索,也取得了许多先进经验和做法。

(一)国内经验和做法

1.推行“放管服”改革

浙江省“放管服”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通过精简审批流程,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推行“一网通办”,让群众和企业统一平台上完成政务服务;通过建立市民服务中心,集中提供多项服务,确保“最多跑一次”改革落到实处;经数据共享和流程优化,

大量审批事项实现网上办理,群众体验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

2.推行信息公开

江苏省创建“阳光政务”网上查询系统,将三公经费、征地拆迁等28类民生事项纳入主动公开范畴;广东省佛山市试点“数据开放实验室”,向社会开放17个领域的政务数据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表明,实行全流程信息公开的地区,行政复议案件发生率同比下降34%,行政投诉办结时限平均缩短5.2个工作日。

(二)国外经验和做法

1.新加坡的“一站式”服务中心。新加坡在全国设立了多个“一站式”服务中心,将不同政府部门的服务集中在一个地点,方便群众办理各种事务;同时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提供网上预约、网上办理等服务,极大地提高了服务效率。

2.美国政府开放计划。美国政府积极倡导政务对外开放,利用透明的政府数据平台对公众释放公共数据资源,提高信息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鼓励公民主动参与政府决策和政策制定,增强政府的开放性和民主化。

很显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特别重视优化基层行政管理职能,改进工作作风。在国内,重点是精简行政机构,优化服务流程;在国外,关键在于政府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和公众参与。

五、基层政府工作作风优化的理论依据

(一)公共服务理论

公共服务理论主张政府应以公共利益为导向,提供优质服务,满足社会需求。基层政府要以人为本,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确保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

(二)新公共管理理论

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采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和市场竞争机制来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和效益。它强调结果导向、绩效评估和成本控制。在优化基层政府工作作风方面,该理论鼓励引入竞争机制,通过绩效考核激励公务员提高工作积极性,提倡精简流程、减少冗员,以提高政府工作的整体效率。

(三)组织行为学视角下的作风优化

组织行为学研究组织中个人和群体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从这个角度看,优化基层政府工作作风,需要激发公务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包括建立激励机制、提供职业发展机会、营造积极向上的组织文化等,以提高公务员的岗位绩效和服务质量。

六、基层政府工作作风优化的路径探索

(一)政策法规层面

政策法规在优化基层政府作风方面起着关键的指导和约束作用。

1.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一是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现有法律法规体系,确保政策法规与时俱进,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二是重点围绕基层行政行为修订《行政诉讼法实施条例》,将“一站式服务”“首问负责制”等改革成果纳入法律框架;三是针对民生服务、行政执法、政务公开等重点领域制定专门的行政法规,形成覆盖基层治理全过程的法治网络。

2.简化行政流程。一是进一步简化审批流程,减少不必要的程序和环节,提高行政效率;二是推广“一张网”“一站式”改革经验,建立跨部门协同办理机制,实行电子证照共享应用制度;三是在工程建设、工商登记等领域实行“一网通办”,明确每个环节的办理时限和材料要求。

3.强化监督问责。一是建立健全监督问责机制,确保及时发现和处理违纪违规问题;二是构建“日常巡查+专项检查+电子监察”三位一体的监督体系,在政务服务大厅部署实施;三是完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机制,建立工作人员诚信档案数据库;四是落实“履职负面清单”制度,对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等12类作风问题实行分级问责,典型案例定期在政府门户网站公示。

4.鼓励创新服务。一是制定鼓励创新的政策法规,推动基层服务创新;二是建立改革创新容错机制,对符合改革方向的探索性失误给予免责;三是设立“微创新”奖励基金,每年评选基层治理创新案例;四是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深度融合,在智慧社区、移动服务等领域出台专项扶持政策,要求到2025年县级政务服务平台全面接入省级大数据枢纽,实现服务事项智能推送、精准办理。

(二)制度建设层面

制度建设层面的优化路径对于促进基层政府作风的改善至关重要。

1.完善绩效考核制度。一是实行多维度考核,不仅考核工作数量,还要考核工作质量、创新能力和群众满意度;二是公开考核标准和结果,增强考核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三是根据考核结果进行奖惩,奖优罚劣,惩治不作为、乱作为。

2.强化监督问责机制。一是成立专门的监督部门,负责日常监督检查;二是畅通监督渠道,引入第三方机构和公众参与,监督政府行为;三是明确责任追究制度,严肃处理违规违纪行为。

3.简化行政审批,优化服务流程。一是梳理优化现有审批和服务流程,减少不必要的环节;二是推行“一站式”服务,将多项服务集中在一个窗口,方便群众办事;三是推行电子政务,实现更多事项网上办理,减少群众跑腿次数。

4.加强制度建设与培训教育。一是进一步完善制度,定期评估制度的实效性,不断优化制度体系;二是开展分层培训,为管理干部、窗口服务人员量身定制特色课程;三是将培训结果与绩效、晋升挂钩,提升培训实效。

5.推进改革创新。一是设立社会贡献奖,对在创新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重奖,彰显社会荣誉;二是在松山湖和滨海湾新区开展改革试点,取得实效后总结经验全市推行;三是给予资源与财政支持,引导基层单位导入新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

(三)文化建设层面

文化建设不仅能强化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还能提升团队精神和效能。

1.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首先,切实树立“执政为民、勤政务实、清正廉洁”等以民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并在日常工作中落到实处;其次,建立明确的职业行为标准和道德规范,通过专题培训和宣传引导,强化全体公职人员的认识和行为遵守。

2.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政治站位。首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重点,通过专题讲座、座谈研讨、案例分析等方式,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原则;其次,依托红色教育资源、革命古迹、廉政教育基地等,开展现场沉浸式学习教育,增强干部履职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再次,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安排老党员与年轻干部结对,充分发挥老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推动年轻干部快速成长。

3.营造人文关怀环境。首先,搭建心理援助平台,设立心理减压室,定期开展对基层人员的心理疏导,缓解其心理负担;其次,通过开展业务技能竞赛、文体活动等,增强团队凝聚力,培育积极进取的人文环境;再次,创建“同事互助基金”,对家庭遭遇突发困境的基层职工给予紧急帮扶,增强个人对组织的归属感。

4.拓展文化宣传教育渠道。首先,依托融媒体技术,搭建数字化学习资源平台,如在专题学习专栏,将制作好的微课程、作风教育漫画等上传,供基层工作人员灵活学习;其次,开展“莞邑服务标兵”“政务服务能手”评选活动,建立即时展示直播平台,多维度传播新时代的楷模和服务标兵。

七、总结

优化基层政府工作作风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步骤之一。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当前基层政府工作作风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并从政策法规、机制建设和文

化培育三个维度提出了优化基层政府工作作风的途径。研究表明,加强理想信念和党性教育,建立科学的评价和激励机制,健全监督和问责机制,是扫除形式主义、不作为等不良作风的根本保障;而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可以有效缓解基层工作人员的心理压力,增强组织的向心力。

国内推进“放管服”、政务公开等实践表明,优化基层政府工作作风必须以人民群众需求为导向,以提高服务效率为重点,以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为节点;国外公共管理新理论的运用表明,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绩效考核与晋升直接挂钩,可有效增强基层活力。面对未来,基层政府需持续探索以建立长效机制,将数字治理嵌入政策法规、制度建设、文化建设、作风监督全过程,创建更具整体性、连续性的基层治理新范式,为提升基层政府服务效能和公信力夯实基础。

参考文献:

- [1] 韩丽丽.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内在要求、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探索,2023(6):67-79.
- [2] 薛成莉.基层干部的不良作风问题之探析[J].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21(1):15-18.
- [3] 古丽娜·艾尼瓦.构建基层干部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思考[J].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2020(2):55-57.
- [4] 杨继亮.乡村振兴战略下基层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23.
- [5] 王凯伟.新时代党对基层政府信任建设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23.
- [6] 张海玲.基层公务员作风建设的路径探析[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23.
- [7] 陈思雨.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22.
- [8] 钟明.新时代党的基层干部工作作风建设创新研究[D].成都:四川农业大学,2022.

Study on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 Work Style

JIANG Man-hua¹, YAO Jia²

(1. Party and Government Office, Guangzhou Institut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aoqing Guangdong 526000;
2. Logistics Management Center, Guangdong Institute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Dongguan Guangdong 523000, China)

Abstract: Drawing o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ways to optimize the work style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 personnel and puts forward multi-dimensional countermeasure suggestions. This study comprehensively utilize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case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study to explore the two dimensions of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With regard to the phenomena of formalism, service inefficiency and micro-corruption in grass-roots administrative organ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hree-dimensional synergistic mechanism of “policy support,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cultural cultivation”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various chronic problems. This study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results of the “digital government” reform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and constructs a styl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ased on public satisfaction, which provides practical solutions for promoting grassroots work style.

Key words: grassroots government; work style; optimization path

《德意志意识形态》视域中的“真正的共同体”与个人自由实现

王二刚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 410082)

[摘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个人自由的实现必然依存于“真正的共同体”。当自然分工与私有制催生“虚假共同体”时,生产力异化为压迫个人的物质力量,劳动被固化,自由沦为阶级特权。真正的共同体通过双重解放打破桎梏:在本体论层面通过消灭私有制与分工,建立“无产者的占有制”,使劳动复归自主活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认识论层面,通过联合的个人在普遍交往中驾驭生产力规律,消除其自发性,使之服务于“个人生命的自由活动”。二者辩证统一,最终指向“各个人在联合中获得自由”。尽管《形态》对革命后路径的论述尚未充分,但其核心洞见已确立,真正的共同体是个人突破异化、驾驭必然性的根本解放条件。正因这一理论奠基性,就《形态》文本展开深度分析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个人自由;真正的共同体

[作者简介]王二刚(1998—),男,甘肃天水人,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和劳动教育。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3014>

[中图分类号] B038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从“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到“共在先于存在,或者说,共在是存在的条件”,从“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到“社会是公众性的,是世界。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虽然秉持的是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共同体并赋予共同体以不同内涵,但他们都意识到了共同体对于人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同样也认识到了共同体的意义,马克思关于共同体的思考,始终以人的生存与发展为根本关切。在他看来,共同体的本质植根于成员间的共同利益和解放诉求,由此形成特定的关系形态。共同体的形成并非某种预先设定或者有待构建的封闭的社会结构,而是伴随经济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向前演进的人类生存的方式。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及其相关概念,最早出现于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发端于莱茵报时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通过对黑格尔哲学以及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获得了发展,初步完成于《共产党宣言》,并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等后期作品当中得到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可以

说,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是伴随着马克思哲学的整体思想进程而得到充实和发展的,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伴随着马克思自身哲学的全面发展而得到了系统性的构建的。

如前文所述,马克思关于共同体的思想早已萌发,那么《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时期的科学巨著之一,其中的共同体思想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它又与个人自由的实现有什么关联呢?实际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的时期,马克思更多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于共同体认识的影响,曾为黑格尔关于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正反面在现实中呈现的矛盾而困惑,也深受费尔巴哈的影响,从人本主义角度出发,提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共同体”。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期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完成了两个转变,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确定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则,并据此原则开启了对“虚幻的共同体”的全面论述和彻底批判。因此,可以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扬弃了前期的共同体思想,完成了向科学的转变。那么共同体对马克思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在马克思看来,共同体是人类的一种具体生存

方式,来源于现实中人的生存诉求,共同体概念可以概括为以人的生产实践关系为基础的人的集合体,并且马克思在众多著作中都对共同体进行了探讨,并把“共同体”作为论证人类社会解放道路时所运用的理论范畴和分析手段。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的共同体思想才正式开始了从科学的立场说明个人自由如何实现这一问题。

一、何为个人自由

(一)个人的自由与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前提是从有血有肉的从事感性活动的人出发,因此它包含个人的发展这一主体性因素,而个人的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人的自由,人的自由自然成为其关注的核心志趣。探讨人的自由这一命题,必然离不开人的解放这一根本目标。自由与解放构成了所有关注人类自身学说的核心关键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视野中,人的自由与人的解放本质上是辩证统一的整体。具体而言,人的自由的真正获得必须通过解放这一现实途径来实现。自由,就其本质而言,是从结果层面描述的一种理想状态,标志着个体或群体摆脱束缚、实现自主发展的境界;而解放则指向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它是指人类通过持续的实践活动,不断变革和“消灭”那些阻碍发展的现存不合理状况(如旧式分工、阶级压迫等),从而逐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实运动。

(二)人的自由内涵的双重维度

其次,马克思深刻揭示了人的自由内涵所具有的双重维度。一个维度存在于本体论层面,其核心指向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宏伟目标的达成,在马克思看来,关键在于通过彻底消灭私有制来扬弃劳动异化,使人从被奴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真正占有自己的本质。另一个维度则立足于认识论层面,即自由是对必然性的深刻认识与把握。当人类尚未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必然性)之前,其行动往往是盲目的、不自觉的,受到未知力量的支配;因此,只有在实践中认识并驾驭了必然性,人类才能获得行动的自由,进行自觉的、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需要着重强调的是,马克思认为这两个层面的自由内涵——作为终极目标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作为实践智慧的认识必然性——并非割裂,而是必须在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统一起来,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完整图景,只有这样“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

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才能真正实现。

二、为什么需要“真正的共同体”

(一)分工与私有制产生“虚假的共同体”

真正的共同体的提出是从批判虚假的共同体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重新理清了物质生产劳动、分工、所有制形式和阶级对立之间的关系,对现存的政治共同体作出了彻底的剖析。虚假的共同体正是以分工为前提存在的,在原始社会,最初是因为天赋差异而有了分工,人与人彼此之间相互需要,从而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往,形成了社会(生产)关系,最初的共同体从这种自然分工的协作配合中诞生,这时的共同体是一个整体的共同体,大家共同劳动,共同享有劳动成果。随着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私有制产生了。又因为私有制的产生,共同体成为分裂的共同体(产生了相应的生产关系如奴隶制、农奴制、帮工制度和学徒制度等),所以分裂的共同体需要镇压反对力量(在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时需要镇压奴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时需要镇压小农奴),这种需要是虚假共同体产生的直接原因。

(二)消灭束缚

由于分工,特别是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的分工使生产力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但是因为“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这就造成了承担不同分工的阶级和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异化,这种对立表现为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生产与消费、享受与劳动之间的分裂,进而造成了个人在社会中活动的固化,个人被限制在一个特定的工作领域,成为失去劳动自由支配权的片面发展的人。劳动本身也不再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并且,由于以劳动为中心的各种活动是自然发生的,因此,这种人类本身的各种行为成为支配人自身的、异己的、对抗的力量和破坏力,这一异化状况还表现为政治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在分工和虚假共同体的支配下,绝大部分人的个人自由是无从保证的,“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相对应地,消灭由分工和私有制产生的虚假共同体和对人们的束缚者,才是“真正的共同体”的意义所在。

三、真正的共同体消灭了分工和私有制,有利于本体论层面解放的实现

要实现个人自由,首要的是要消灭分工,马克思指出,在分工条件下,个体间的社会力量(关系)不可避免地异化为一种独立于个人并支配个人的物化力量。要消除这种异化现象,不能寄希望于人们在观念中抛弃对这种关系的抽象理解,其根本途径在于:个体必须重新联合起来,共同掌控这些物化的社会力量,而这最终依赖于对旧式分工本身的彻底扬弃。但单说消灭分工是难以做到的,因为与分工密切相关的私有制也是桎梏个人自由的重要因素。“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于是也就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同样也是因为私有制以及私有制所带来的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产生了这种情况:“正因为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而在这种不一致的状况下活动进而造成了只要特殊利益(个体或特定群体的利益)与社会的共同利益(普遍利益)之间仍然存在根本性的分裂与对立,换言之,只要社会分工还不是劳动者基于自身发展需要而进行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而仍然是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私有制基础的、自发形成并带有强制性的社会安排,那么,人类自身的劳动及其活动成果就必然外化并异化为一种独立的、统治人、压迫人的异己力量。

所以,消灭分工和私有制的具体实现途径是,生产力在自然分工下不断发展,其产品之一就是产生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无产阶级)被迫承担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全部物质重负与社会成本,却系统性地被剥夺了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社会福利)的权利。它被置于社会结构的底层和边缘,处于实质性的社会排斥状态。这种根本性的对立处境,必然导致它与其他所有现存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发生最尖锐、最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作为社会成员中的绝大多数,其自身所处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客观物质条件,必然孕育出必须彻底颠覆现存制度、实行根本性社会革命的阶级意识。即通过失去“私有财产”的无产阶级的联合进行共产主义革命来消灭分工和私有制。失去“私有财产”实际上构成了他们的独立共同性的因素。随着他们与私有财产的分离,反而从私有制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

即实现了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统一,所以他们获得了仅仅以个人的身份加入相互的联合的可能性,并且可以在此后革命中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在推翻旧的统治,建立新社会后,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在无产者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必定归属于每一个个人,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并且随着分工和私有制这一基础的消灭,为共产主义调节生产并克服产品异己关系创造了条件。其结果必然是供求关系强制性地消解。最终,人们将实现对交换、生产及其互动方式的自觉支配。同时,由分工而产生的对“排他性活动领域”的束缚将被废除,劳动成为自主活动,个人之间的交往得以确立,从而突破在“某种条件”下的个人交往,而实现真正的各个人的交往,即各个人不再受到私有制、阶级、国家等物质力量的压迫,而是自由地发生社会交往。

四、真正的共同体消除了生产力的自发性,有利于认识论层面解放的实现

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个人的现实共同性,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通过他们之间的相互交往而实现。但在马克思看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其本质上是人的实践能力的总和——却对象化、物化并异化为一种似乎完全独立于个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客观存在,表现为一个与活生生的个人相对峙的、具有自身运行规律的“特殊世界”。这种异化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生产力真正主体的个人——他们的体力和智力就是生产力的源泉——在现存的生产关系(特别是私有制)下处于分散的、彼此竞争甚至对立的状态。然而,矛盾恰恰在于,这些分散的个体力量,只有通过社会性的交往和相互联系(即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有效的社会生产力。也就是说,自然形成的分工条件下,人与人之间通过交往而构成的共同活动尽管可以产生一种社会力量,但这种社会力量并非他们自身的联合,它独立于个人,作为“物质力量”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存在,反而成为压迫个人的力量。而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当个人本身能够自主地驾驭外部世界对其才能发展所施加的实际推动力量时,才不再仅仅是停留于观念层面的理想或抽象的责任,而是具备了实现的现实可能性。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未来图景,其核心正在于促成这种个人主体性的充分彰显,使全面发展由理想转化为活生生的现实。即只有当人认识到如何掌握全部生产力之后,才能使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为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

所用,使生产力与个人的发展相匹配。

如何认识到如何掌握全部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给出了初步的答案,他们认为私有制的消灭以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其历史性前提。这是因为,现代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普遍化的交往关系本身具有全面性。唯有具备了全面素质与能力的个人,才可能真正驾驭这种全面性,将生产力和交往关系转化为自身生命活动的自由展现。因此,个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私有制消亡的必要条件。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发展成为自由全面的个人,二是全面发展的个人如何掌握生产力。关于第一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说这种发展取决于在经济前提下的个人间的联系,即只有在普遍联系的共同体中,个人才能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关于第二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的表现形式既然是各个人力量的总和,所以只要各个人联合起来,并在个人的能力全面发展的情况下,就不存在不受他们的支配的条件,也不存在作为一种独立的东西同他们相对立,这里的“条件”和“独立的东西”也就是对生产力规律的认识,即马克思、恩格斯萌发了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述的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的观点。也就是说,尽管是初步的构想,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意识到,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人才能与社会发生普遍的联系,进而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在把握住生产力规律后消除生产力的自发性,即实现认识论层面的解放。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主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的解放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互为前提,相互促进的关系,二者都是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五、《德意志形态》中关于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相关论述的不足之处

总的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科学的方法,即通过理清物质生产劳动、分工、所有制形式和阶级对立之间的关系的方式初步说明了如何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同时,他们基于个人与共同体的辩证关系,深刻揭示了共同体作为个人自由根本保障和社会发展必要条件的核心地位。这些开创性论述为马克思科学社会形态理论及人的发展理论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但这时,“新的世界观”才刚刚形成,不可避免地,当时的诸多认识与其后期著作中更加科学深入和成体系的认识相比就显得含糊不清了。

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两个层面的解放还存在诸多含糊之处,更多时候是将两个层面的内容合在一起进行论述,没能彻底清晰地进行分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是从消灭分工来说明如何消除生产力的自发性的,这与其后期著作中通过消灭私有制和分工,以摆脱私有制的禁锢和资本的奴役,通过认识把握规律进而消除生产力的自发性的思路并不一致,而是将二者混为一谈。

第二,在主体论层面中缺乏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后该采取哪些具体措施真正地实现“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的相关论述,仅仅抽象地谈道:“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

第三,在认识论层面中仅仅谈到的是对于生产力的把握,并没有深入地进行阐述,如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明确阐述的那样,通过把握总体性的规律实现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参考文献:

- [1] 荀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1:127.
- [2] 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8.
- [3]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7.
- [4]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2.
- [5] 晏扩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23:19.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94.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7-108.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The “True Communit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Personal Freedom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erman Ideology”

WANG Er-gang

(School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China)

Abstract: In “The German Ideology”, Marx reveals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individual freedom necessarily depends on the “true community”. When natur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private property give rise to the “false commun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alienated into material forces that oppress individuals, labor is solidified, and freedom becomes a class privilege. The true community breaks the shackles through dual liberation: on the ontological level, it eliminates private property and division of labor, establishes “the possession of the proletariat”, restores labor to autonomous activity, and achieves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on the epistemological level, it enables united individuals to master the laws of productive forces in universal communication, eliminate their spontaneity, and make them serve “the free activity of individual life”. The two are dialectically unified, ultimately pointing to “each individual gains freedom in association”. Although “The German Ideology” does not fully elaborate on the path after the revolution, its core insight has been established: the true community is the fundamental condition for individuals to break through alienation and master necessity. Due to thi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conducting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The German Ideology” text has irreplaceable value.

Key words: “The German Ideology”; individual freedom; true community

常州市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困境和优化策略

金立畅¹, 陈丽²

(1.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纪委办公室,江苏常州 213164;

2.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电子工程学院,江苏常州 213164)

[摘要]对于属地高校的学生而言,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是可见、可感、可用的客观存在物,可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和鲜活性。常州市积累了一批内容生动、形式多样的红色文化资源。这些资源包含红色文化展馆、红色文化名人、城市发展成就、红色文艺精品。常州市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处于认知窄化、认识浅化、认知表化状态,面临融入素材不足、融入环境欠佳、融入方式单一等主要困境。有关部门和学校需要从内容、空间、组织等维度着手,打造有温度、有深度的思政课堂为立足点,创设内涵、有特色的育人环境为结合点,构建有质量、有保障的实践体系,提升常州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针对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常州;红色文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地方文化

[作者简介]金立畅(1975—),女,浙江温州人,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纪委办公室讲师,教育学硕士,研究方向: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陈丽(1988—),女,江苏镇江人,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电子工程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计算机应用技术。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思政专项)“‘课程思政’教学理念、教学设计、实施评价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20SJB0587);常州大学高等职业教育研究院立项课题“新时代高职教育助推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CDGZ2023035)。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3015>

[中图分类号] G641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红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相辅相成。红色文化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各个地方形成了特色鲜明、内容生动、形式多样的红色文化资源。对于属地高校的学生而言,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是可见、可感、可用的客观存在物,可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和鲜活性。因此,本文以江苏省常州市为例,探索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困境和破解策略。

一、常州市红色文化资源的分布样态

红色文化资源包含物质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资源。物质文化资源主要指遗物、遗址、遗迹等革命历史遗存与纪念场所。非物质文化资源主要指英烈事迹、革命斗争故事等红色革命精神。就常州而言,物质文化资源主要包含常州地方党组织的创建与发展的历史遗址、遗迹,重要革命人物在常

州生活、战斗、学习留下的遗址、踪迹;具有特定时代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及设施;非物质文化资源主要包含反映历史事件、人物、战斗等的重要文艺作品。

(一)红色文化展馆

纪念馆、博物馆是红色教育的重要载体,也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常州高度重视历史名人遗迹修缮保护,尤其在红色文化展馆建设方面舍得花重金进行投入,成功建立“常州三杰”纪念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红馆、王铮将军纪念馆、华罗庚纪念馆等一大批高规格的红色文化展馆,为常州建设红色文化示范区营造了良好氛围。瞿秋白纪念馆是弘扬瞿秋白精神的专业馆。建馆以来,先后接待了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张太雷纪念馆成为江苏首批100个红色地名之一;常州三杰纪念馆于2021年4月以全新的展览形式、丰富的活动内容、创新的宣教手段对外重新开放后,年接待游客逾100万,作为国家

3A级景区的常州三杰纪念馆现已成为常州红色旅游的新热点;江南铁军教育学院开发了系列红色文化培训课程,接待培训人数逐年增长,现已成为长三角红色教育新地标。

(二)红色文化名人

与国内许多红色文化名城相比,常州没有大型的战役纪念馆,也相对缺乏影响广泛的红色故事,但从常州这个地方走出了一大批红色名人,这是常州红色文化资源的特色和优势。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视察时提到四个江苏红色名人,其中三人是常州人,他们是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在十八届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点到了四位党的早期领导人,他们是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两次重要场合都提到常州红色名人,由此可见常州红色名人影响力之重。除“常州三杰”外,常州还有原国家电子工业部部长王诤(毛泽东主席称其为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救国会“七君子”的史良、李公朴,“纺织巨子”刘国钧,“人民数学”家华罗庚,这些都是常州拿得出、叫得响的红色文化名人。除了这些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红色人物,还有众多可歌可泣的红色人物,据《常州革命英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5月第一版)统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计有4087位常州人民的优秀儿女和在常州大地上的外地籍中共党员、革命志士和新四军指战员无私地奉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这些先烈不仅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铺设了通向胜利的道路,而且也为我们传承和弘扬红色基因留下了极为宝贵和丰富的精神财富。

(三)城市发展成就

作为工业明星城市,常州也是我国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之一,一百多年来,常州在国家工业文明进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明清时期,常州曾长期是江南农商业中心,成为领天下风气之先的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发源地之一。建国以来,常州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创造出“小桌子上唱大戏”“双手舞出八条龙”的发展奇迹。《人民日报》以《农字当头滚雪球》《“桌子”上唱起了大戏》对常州进行报道,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出现了全国“中小城市学常州”的热潮。2023年,常州地区生产总值达10116.36亿元,昂首阔步高质量迈入“GDP万亿之城”,成为全国人口最少、地域面积较小、人均水平较高的万亿之城。伴随着常州近现代工业的发展,留置了一批工业遗产。国家工业遗产认定从2017年开始,

江苏共认定9个项目。常州恒源畅厂旧址和常州大明1921创意园被认定为国家工业遗产项目。这些工业遗产见证和记录了常州近代工业化的历程和发展轨迹,成为让常州城市留下记忆的重要内容,是常州辉煌发展成就的见证,也是红色文化教育的平台和载体。

(四)红色文艺精品

电影《秋之白华》主要描写我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与妻子杨之华在革命时期建立的勇敢、热烈的爱情故事,电影将革命题材诗意化、历史故事化,开创了红色电影新的经典范式,获得全国“五个一”文化工程奖。继《秋之白华》后,大批反映常州三杰精神的文艺作品如《永远的青年》《江南第一燕》《一封家书》等陆续搬上舞台,4集电视纪录片《常州三杰》在央视四套播出,引起巨大社会反响。常州市锡剧院创排的展现张太雷同志一门忠贞、二代英烈的大型锡剧《烛光在前》收获了“江苏省文华大奖”和“紫金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奖”。描绘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三位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革命领导人践行革命理想道路的成长历程的影片《觅渡》,被国家电影局推荐为2023年度重点档期优秀国产影片,获“第36届金鸡奖最佳音乐奖”“2023年度国防军事题材优秀影片奖”、第20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最受传媒关注音乐”等荣誉。通过创作一系列红色文化精品,在全国让“三杰故里·红色名城”这一红色文化名片逐渐得到认同。

二、常州市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困境

尽管以常州三杰为主的常州当地红色文化资源在社会上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在融入常州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上仍存在一些问题。课题组以日常观察、访谈、发放问卷等形式对当地高校的200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常州市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通过调查,发现常州市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认知窄化、认识浅化、认知表化等主要问题。

(一)认知窄化:大学生尚未充分了解常州市红色文化资源的内容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不同时期的优秀文化结晶,文化跨度较长,内容丰富多样。在常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识范围比较狭窄,在“人、事、物、魂”四种红色文化分类中,学生的了解范围主要集中在常见人物、重大事件中。在了解途径中,占比最大(86%)的是学校教育,具体来说就是中小学政治历史课。中小学的课堂教学内容有限,高职阶段的历史课课时较少,因此学生

的红色知识不足,红色文化认识狭窄,粗略笼统。比如“常州三杰”中,“在广州起义中身中弹牺牲,年仅29岁”的人物选择中,42%的人选择错误。此外,学生对红色文化的主动性兴趣不足。在对红色文化的认同和兴趣一题中,绝大部分的同学持认同态度,但部分同学表示“认同但不感兴趣”。在了解红色文化的途径中,“主动学习了解”的占比最小(53%)。单一的课堂教学形式带来学生认知的局限。

(二)认识浅化:大学生尚未充分了解常州市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

红色文化包括有形的物质文化和无形的精神文化,相对于物质文化,有深刻的、丰厚的价值内涵的精神文化更容易被大学生忽略。在对红色文化具体兴趣方向这一题中,80%以上选择历史事件、革命遗迹等“粗线”文化,对革命精神、艺术作品等抽象文化的选择较少。大学生对常州本地红色文化更多停留在事件的粗浅认知中,停留在故事情节层面,较少探究深层的精神文化内涵,出现了“重物质、轻精神”的现象。生活在和平富足年代的“05后”学生对红色历史有一定的距离感。数字化时代的他们被娱乐化、碎片化、流量化的信息所包围,红色文化的严肃性、深刻性、沉重性与之有一定的对立性。在市场经济多元文化冲击下,泛娱乐化、利己主义等思潮腐蚀着理想信念不坚定的青年人。甚至部分学生认为红色文化已经“过时”,对奉献、牺牲等观念不能完全认同。课堂上,部分学生在观看红色视频时,对红色人物时代化的语言、神情会表现出嬉笑等缺乏敬畏的轻率态度,对红色言行和精神缺乏认同感。

(三)认知表化:大学生尚未充分了解常州市红色文化资源的效应

利用红色文化蕴含的丰富物质资源和精神内涵,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具有重大意义。尽管学校比较重视红色理想信念教育,但仍存在一定的表面化现象。首先是课堂教学资源陈旧。在“学校目前的红色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中,学生选择比例最高的是“形式不丰富”(55%),接着是“资源不新颖”(42%)。其次是教学形式单调。调查显示,目前红色文化的主要教育方式仍以说教为主,缺少互动性、体验性。在对“您在校期间主要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和学习红色文化”这一问题的回答中,占比最高(96%)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对“授课教师是通过何种方法融入红色文化内容的”一题的回答中占比最高(88%)的是“直接讲授法”。可见,红色文化教育主要以课堂理论灌输为主。再次

是课外红色实践活动形式大于内容。红色社会实践活动容易出现变相的游玩现象,实际教育效果收效微小。最后是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学习动力主要来自应对考试这一功利性目标,考试内容以书本客观知识为主,较难激发内在学习动力,育人效果有待提升。

三、常州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策略

为有效解决常州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化”“融化”“活化”的现实问题,有关部门和学校需要从内容、空间、组织等维度着手,以打造有温度、有深度的思政课堂为立足点,创设内涵、有特色的育人环境为结合点,构建有质量、有保障的实践体系,提升常州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一)内容维度:打造有温度、有深度的思政课堂

其一,结合常州红色文化资源特点,有针对性地对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要解决常州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不足问题,需要系统性地构建常州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政课堂的策略,找准常州红色文化资源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的切入点、契合点和着力点。常州高校教师特别是一线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尤其要重视常州红色文化资源内涵与外延的挖掘和研究,有机结合课堂教学内容精准讲授,把抽象的理论讲得生动具体、有血有肉,把有意义的变成有意思的。同时,还须在讲授中注重发挥常州红色文化资源的政治引领、价值判断与选择作用,回归常州红色文化资源融入的目的与本质,并对社会上的错误思想进行驳斥。此外,要不断增强常州红色文化资源的理论支撑。具体而言,常州红色文化资源根植于中国优秀文化大环境,从有血有肉的常州红色文化资源、从常州改革开放的辉煌历程、从中国式现代化常州实践中体悟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讲深讲透常州红色文化资源背后的历史脉络和时代背景,引导大学生具备感恩之心、感激之情和坚定跟党走的决心。

其二,提高常州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常州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政课堂能否为立德树人带来预期的效果,支撑“大思政课”高质量发展,关键还要看思政教师的科研程度。在常高校要加强常州红色文化资源研究力度,一方面,要设立关于红色文化资源本体的专业性研究机构,集聚常州党史、文物、教育、文化等各领域的专

家人才,加强红色文化资源研究与阐释的功能,通过持续系列研究,系统整理归纳红色史料、关键事件、代表人物等,分类归档,分层分类地建立常州红色文化研究资源库,丰富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素材,解决“用什么育人”这个问题。另一方面,要设立开展育人实践的指导机构,承担着育人路径的创新、育人结果的评价、育人要素的整合等功能,侧重于拓宽育人的路径如打造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特色平台、拓展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实践基地,助力创新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形式,解决“怎么育人”的问题。这两类专业指导机构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时,高校教师要加强与常州本土红色文化研究专家的合作与交流,建立常州红色文化研究共同体,共同投身于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研究与传播工作。通过跨部门、跨领域、跨行业的协同合作,丰富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层次与深度。然后在此基础上,利用常州红色文化研究资源库,结合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具体设计常州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路径,提升常州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政课堂的实效性。

(二)空间维度:创设内涵、有特色的育人环境

其一,加强校园育人环境的内涵建设。从整体上将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与国际国内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相联系,推进育人风气从良从优;从榜样示范、学校建筑、宿舍文化、图书馆建设等微观环境入手,熏陶与形塑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行。在营造红色文化育人环境过程中,要准确凝练常州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核,将其深度融于不同的育人场域。比如在生活场域中,可以体现诚信友善、勤俭节约等优秀红色文化元素,学习场域中体现拼搏向上、勇争一流的奋斗精神等红色文化元素,活动场域中体现实事求是、团结友爱的生活态度等红色文化元素。在选取图片、横幅、雕塑中,要有场景、人物互动,这样才能够拉近与大学生的距离。除了上述静态的地方红色文化育人环境创设,高校还可以经常策划红色文化活动、举办红色文化主题文艺汇演,让学生在艺术体验中领悟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邀请常州的先进人物、职业榜样、杰出校友、道德模范、劳动模范等进校园作报告,营造动态的红色文化育人环境,让红色文化深度浸润学生日常生活,成为可触可感的精神滋养。

其二,促进网络育人专项建设。要善于抓住现代大学生无网不欢,无日不网的群体特点,创新红色文化宣讲和传播形式,宣传和传播常州红色文化时紧抓“活”“动”“潮”三个关键字,坚持技术赋能、

移动优先,打造H5、漫画、动漫、可视化数据等传播新形式,在视频制作中采用AI虚拟人技术,以震撼的视觉、听觉语言营造沉浸式视听体验,满足当代大学生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喜好。要加强红色文化的网络话语转型,要善于运用通俗易懂、幽默有趣的“青言青语”,通过时态、语态的转化来消除红色文化带给大学生的严肃感。不断提升红色文化的吸引力和创新性,以思想含量赢得传播流量,让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触、接受、吸收、内化常州红色文化资源内涵的精神和价值。

(三)组织维度:构建有质量、有保障的实践体系

其一,着重提升校内实践活动质量。为了解决校内实践活动同质化的现实问题,高校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活动。深度挖掘学院特色与地方红色文化的结合点,各学院之间精简重复无效的相关活动,统筹协调建构一院一品的地方红色文化系列活动,注重打造“常州红色文化资源+”品牌活动,避免泛而滥的低质量活动现象。同时,高校还应从制度维度保障活动的高质量建设。一方面,从教师角度出发,完善地方红色文化活动的考核办法,从活动内容、活动组织、活动效果等几方面来评价考核,避免相关组织者以应付任务式的思想对待工作。另一方面,从学生角度出发,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比如,将参与常州地方红色文化活动纳入“第二课堂”学分认定,打通“思政小课堂”与“第二课堂”学分认定通道,避免大学生低效重复参与校园红色文化活动,提高大学生参与常州红色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不断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

其二,重点构建校外实践活动机制。为了避免校外实践活动形式化,让大学生真正体悟地方红色文化的精神意蕴,树牢崇高理想信念,高校要建立与地方红色文化的遗址遗迹、陈列馆、纪念馆、新农村示范村、示范社区、国防法治教育基地等实践基地的长期合作机制,让大学生深入合作基地参观学习、调查研究,深刻感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的真理性、科学性、实践性。除了合作机制外,还要建立社会实践的保障机制。比如,建立大学生党员讲解团,发挥大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配备思政教师对大学生社会实践进行针对性的指导,帮助大学生升华理论与实践认识。此外,还须建立思政教师社会实践的评价机制。可从“教师自评—学生评价—基地评价”三维来设计思政教师社会实践的评价指标,着重关注社会实践的实践主题、实践内容、调查研究方法,以及思政教师答疑、指导方法等细化领域的考核评价,从而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实效。

四、结束语

常州市的红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内容生动、形式多样,既有数量众多的高规格红色文化展馆,也有一批具有广泛知名度的红色文化名人,既有闻名全国的城市发展成就,也有一批叫好又叫座的红色文艺精品。然而,常州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并没有达到理想效果,主要表现为:在常大学生对常州本地红色文化的认识窄化、认识浅化和认识表面化。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是转化、融化、活化的“三化”问题做得不够好。基于此,我们需要从内容维度、空间维度、组织维度三方面协同推进常州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另外,常州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各组织部门与社会力量的整体性、系统性构建,是一项系统而又复杂的工程,需要有关主体不断在挑战中创新,把握历史机遇,系统总结建设

经验,继续探索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理念、新路径、新方法。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党建,2022(11):4-28.
- [2] 胥继礼.红色文化探析[N].江苏经济报,2024-7-5(T2).
- [3] 刘小霞.红色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J].成才之路,2024(20):29-32.
- [4] 李亚雄,华岩,陈娜.常州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和开发[J].江苏地方志,2016(5):21-27.
- [5]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2-5-11(2).
- [6] 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代传下去[J].求是,2021(10):4-18.

The Primary Challenges and Strategic Approaches for Integrating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of Changzhou City

JIN Li-chang¹, CHEN Li²

- (1. Office of the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Changzhou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hangzhou Jiangsu 213164;
2. School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Changzhou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hangzhou Jiangsu 213164, China)

Abstract: For students enrolled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d cultural resources represent accessible, visible, tangible, and utilizable objective realities that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relevance, effectiveness, and vit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hangzhou City possesses a rich collection of vivid and diverse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cluding red culture exhibition halls, notable figures associated with red culture, achievements in urban development, and outstanding works of red literature and art. However, the integration of these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mains constrained by narrow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shallow interpretation, and superficial engagement. Key challenges include insufficient teaching materials, an underdeveloped integration environment, and limited diversity in integration method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relevant authorities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should focus on content, spatial, and organizational dimensions. They should aim to develop emotionally engaging and intellectually profou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establish an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enriched with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truct a high-quality, well-supported practical system. These efforts will ultimately strengthen the appeal, releva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incorporating Changzhou's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higher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a.

Key words: Changzhou; red cultu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reform; local culture

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职院校师德师风建设路径研究

郑天竹, 尤苏青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基础课部, 河北邢台 054000)

[摘要] 高等职业院校作为我国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主阵地, 其教师队伍的师德师风质量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 关系着人才培养的成效和国家民族的未来。如何在新时代实现党建引领高职院校师德师风建设高质量发展, 是确保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命题。因此, 应当充分认识党建引领在高职院校师德师风建设中的核心作用, 分析研究其价值意蕴与现实困境, 打造“思想铸魂、党建固本、组织强基、创新赋能”四位一体的优化路径, 构建“党建强、师风正、育人优”的高素质专业化高职院校教师队伍。

[关键词] 高职院校; 党建引领; 师德师风; 路径研究

[作者简介] 郑天竹(1983—), 女, 河北邢台人,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讲师, 主要从事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思政、师德师风建设等研究。尤苏青(1994—), 女, 河北邢台人,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讲师, 主要从事高等职业教育党建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5年度河北省高校党建研究课题“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职师德师风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GXDJ2025B395)。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3016>

[中图分类号] G715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教师是教育事业的根基, 教师发展是人才培养的源动力, 国家的强大离不开教育的提升, 而教育的提升则离不开教师队伍的建设。高等职业院校是我国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主要基地, 因此, 教师队伍的师德师风建设状况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的质量, 这关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2019年12月, 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 其中指出, 加强师德建设要以科学的思想理论为指导, 以全面加强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 大力提升教师的职业道德素养为抓手, 要求把师德师风建设贯穿于教师管理的整个过程中, 着力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进入新时代以来, 高职高专院校以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教书育人能力为中心, 以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抓好党建工作, 成为引领高职高专师德师风建设向纵深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 回应时代关切, 筑牢育人根基的必然选择, 就是坚持以高素质党建为统领, 把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等融汇贯穿于高职院校师德师风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一、党建引领高职师德师风建设的核心价值

2024年8月,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其中强调了新时代师德师风的建

设, 指出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 坚决维护党对教师队伍建设的领导权。所以, 要确保教师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的主体作用得到全面发挥, 就必须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 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以优质党建引领师德师风建设, 这是促进高职院校持续优质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 党建引领是推动高职院校师德师风建设的思想基础

高职院校师德师风建设要始终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要站在“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高度, 把师德师风建设作为学校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作为党委重要议事日程。要始终把高职院校党建工作融入到教师人才引进、培养、使用和管理全过程, 把强化党的理论武装和教师职业素养提升相结合, 把党的作风建设和规范教师从教行为相结合, 以高尚的师德师风锻造“四有”好老师。通过组织教师系统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和教育方针政策, 牢固树立理想信念,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倡导教育家精神, 引导教师树立正确的职业观、育人观和名利观, 引导广大教师深刻理解“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 抵制功利化、浮躁化倾向, 坚守教育初心, 自觉将个人发展融入到国家职业教育事业发展大局中去。

(二)党建引领是夯实高职院校师德师风建设的组织保障

党的全部工作都要依靠党组织强有力的制度来完成和实现。要建立健全由党委统一领导、党委和行政同责、部门协调配合、院系具体落实、教师自律作为的工作机制,形成各级党组织负责人为师德师风建设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局面。要坚持以基层党组织为统领,统筹育人资源,将政治引领融入学校师德师风建设的全过程和全方位,努力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加强教师党支部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使之成为涵养优秀师德和锤炼优良师风的主阵地。通过党员示范引领和选树先进典型,鼓励党员教师在教学科研、技术服务、关爱学生中亮身份、作表率、树典型,大力挖掘和宣传身边的师德模范和岗位标兵,讲好职教师匠故事,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

(三)党建引领关乎高职院校师德师风建设的具体成效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职院校师德师风建设,有助于增强广大教师在深刻领会教育家精神科学内涵的基础上,更好地凝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自觉性和内驱力。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化价值引领,着力引导高校教师以德施教,内外兼修,提升师德修养的内在驱动力,使“育才先立身,树人先树己”成为高职教师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更好地投身服务于学校高质量发展大局。高职院校要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制定和完善覆盖教师招聘、考核、培训、晋升、奖惩全过程的师德师风制度规范,建立健全师德师风失范行为预防、受理、调查、认定、处理机制,对师德模范典型弘扬奖励,依规依纪处理师德失范行为,确保党建引领师德师风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二、当前党建引领高职师德师风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职院校取得了快速发展,党建引领下的师德师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教师队伍素质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在推动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仍然面临一些现实困境。

(一)党建与师德师风建设结合尚显薄弱

师德师风建设是一项需要高职高专各部门积极参与、通力协作,才能取得好成绩的系统性工作。然而,由于在学校党委层面缺乏科学合理的宏观规划和清晰的职能分工,导致高职院校的师德师风建设过程中难以高效率地开展工作,各部门之间的协

作配合也不够密切,党建引领发挥的效果不太理想。主要表现在一些基层党组织未能准确把握党建工作与师德建设、教学科研等中心工作的深度结合点,存在注重形式而实效不足、注重部署而忽视落实等问题。由于部门之间沟通衔接缺乏,党建活动在组织实施上难以与教师专业发展、思想实际紧密结合,导致师德师风建设与党建工作在实践环节中难以有效融合,甚至出现“两张皮”的现象。

(二)价值引领的针对性和感染力不足

当前,高职院校党建引领下的师德师风建设,主要以宣传教育和学习活动为主要形式,过多强调对教师的外部规范约束,缺乏对教师自主意识的引导,缺少实践环节和互动讨论,往往只是让教师被动接受,教育效果不佳。在教学培训内容上多是一些文件材料和制度规范,导致理论学习存在内容宽泛、方式单一的问题,未能紧密结合高职教师的职业特点、思想困惑和发展需求进行有效引导。党建载体在教育活动中的方式方法和创新性不够,未能在基层党建工作中有机融入师德建设,致使教师主体意识发挥不够、参与热情不高,没有形成良好的师德师风建设氛围,教师的主体意识发挥不到位,参与热情不高。

(三)党员教师主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基于以上情况,部分高职教师对师德师风建设仅停留在认知层面,虽然能够认识到政治素养、职业道德和立德树人的重要性,但并未将其付诸于实际的教书育人活动中,仍把工作重点放在教学科研和职称评定等方面,忽视了自身政治素养和职业道德的提升,忽视了对学生职业道德和职业兴趣的培养,在发挥立德树人的作用上存在欠缺。特别是部分党员教师身份意识淡化,表率意识不强,对自身角色在师德师风上未能有效凸显先进性,只是把教育工作看作是一种职业和谋生手段。这也暴露出基层党组织对党员教师的日常教育管理监督不够严格细致,激励约束机制有待完善。

(四)师德考评与监督体系亟需进一步完善

高职院校虽然制定了师德师风考核机制,把师德师风纳入工作考核范畴,但在实际工作中,考核指标是模糊的、笼统的,定性较多,定量较少,操作性、区分度不高,师德监督的渠道不够通畅,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多元参与的监督评价体系。如部分高职院校只是简单地把教师是否违法违纪等作为师德师风的重要考核标准,其他指标只是象征性地填写,只是注重形式,忽视具体指标,更有个别院校只是为了完成考核任务而临时填写考核表格,导致考核并没有发挥指挥棒的作用,无法有效激发教师提

升师德师风。另外,在师德师风考核监督方面,虽然设置了相应的部门,但实际发挥作用有限,亟需修改和完善相应机制。

三、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职师德师风建设的实践路径

为进一步提升教师队伍师德师风建设整体素质和水平,本文从思想铸魂、党建固本、组织强基和创新赋能四个方面提出实践路径,以求为推进高职院校整体创新发展提供实践借鉴和参考。

(一)坚持思想铸魂,强化政治引领和思想浸润

第一,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高职院校应当建立完善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机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为核心学习内容,特别要强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重要论述的学习。制定具体的学习计划,合理安排学习时间,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学习方式,使教师们能够深入理解和真正掌握政治理论的核心要义,确保取得全面而深入的学习效果。第二,要坚守正确价值导向。通过定期组织党员教师到各地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开展思想政治轮训,实地参观红色教育基地等方式开展多元化的师德师风创建活动,使广大教师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真正认清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深入了解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大局,增强投身职业教育事业的责任感和荣誉感。第三,要加强文化阵地建设。坚持以文化人,充分发挥高职院校理论宣传阵地的作用,通过开展内容丰富的师德师风宣传教育活动,用优良的校训校风感召广大教师,把坚定理想信念、坚守职业道德、全心教书育人作为毕生追求,努力建设融党建文化、职教文化、工匠精神于一体的校园文化环境,全力营造风清气正、崇德向善、爱岗敬业、仁爱学生的高水平育人环境。

(二)坚持党建固本,筑牢组织堡垒和党员队伍

第一是推进“双带头人”培育工作。选优配强教师党支部书记,使之成为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领头雁”,实现党建与业务的双融合、双提升。明确把教师的思想政治建设和师德师风建设作为教师党支部的主要职责,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教师的先锋模范作用,使之成为教师队伍共同的价值追求。第二是创新支部活动载体。围绕“课程思政”“三教改”“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等方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活动,实现师德师风建设与党建工作有机融合,把师德师风实践活动融入到培养科技创新文化、强化教育强国责任、教育为民责任、发挥文化涵养师德师风的具体业务工作中,实现师德师风建设的全方位展开,激发培育

教师参与师德师风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第三是严格党员教育管理。落实党员谈心谈话、民主评议制度,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设立党员示范岗,明确岗位职责和标准,提高党员教师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为教师营造健康成长的良好的党建环境。此外,要重视发展党员工作,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严把入党条件和入党程序关,保证教师党员队伍的质量。同时要加强对新党员开展师德师风与党建学习相结合的教育,筑牢守好党建引领师德师风建设的基础。

(三)坚持组织强基,完善考核体系和监督机制

第一是加强组织管理。高职院校应当严格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践行民主集中制,创新和优化领导方式,完善常委会与校长办公会议的决策制度。定期召开包括校领导、职能部门、教职工代表和学生代表在内的联席会议,将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到立德树人的各个环节和方面。第二是明确师德标准。结合高职高专特点,制定涵盖教师思想政治、职业道德、学术规范、遵规守纪、社会公德等方面内容的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师德师风考核指标体系,同时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教师进行分类评价和响应考核,明确具体要求在课堂教学、实训指导、校企合作、师生交流等场景下量化。此外,还要将学生评优、同行评优、社会反馈等内容纳入其中,在师德师风考核中发挥党组织领导的重要作用。第三是加强考核与评价。将师德师风考核作为教师考核的重点内容,落实师德师风首要标准,注重多主体和多元化的评价方式,以事实为基础,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从而提升评价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将考核结果与教师评先评优、职称评定、岗位聘用等挂钩,对考核优秀的教师给予物质奖励,对年度评优不合格的教师取消评先评优资格,对师德师风不规范行为的教师依法依规依规处理。四要完善监管网络。健全线上线下的师德投诉举报渠道,包括书记校长信箱、师德监督热线、网络平台等,充分发挥教代会、学代会、学术委员会、教学督导和家长委员会等的监督作用。对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及时办理,并提出反馈和处理意见,督促教师树立底线思维、抵制腐败思想,确保师德师风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四)坚持创新赋能,聚焦高职特色和教师发展需要

第一是强化“双师”师德建设。结合“双师型”教师职业特点,特别要将师德师风要求融入教师企业实践管理办法,明确其在企业期间的育人职责和行为规范。评选“双师型”优秀师德师风教师典型,

通过树立榜样力量,激发广大教师增强师德需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德行表现突出的教师,给予相应的奖金、津贴等物质奖励,并对教师的先进事迹进行表彰和宣传。第二是促进教师职业认同感。通过改善和提升教师待遇和发展环境,搭建多元发展平台,如教学创新团队、技术技能创新平台等,增强教师职业的成就感和幸福感,激发内在动力。采用丰富多样的师德师风培训内容和培训形式,引导教师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和高尚的道德追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作为终身事业和毕生追求。第三是关注青年教师成长。推行“青蓝工程”,通过老带新等机制为年轻教师配备有较强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师德高尚的导师,发挥传帮带作用,使其尽快熟悉教育规律,掌握教育方法,锤炼高尚道德情操,在立德树人的实践中建功立业,有所作为。

结语

党建引领是新时代高职院校师德师风建设的根本保障,必须正确认识其重要性,直面现实中的挑战,运用科学理论进行指导并采取改革创新措施。通过坚持思想铸魂、党建固本、组织强基和创新赋能等举措共同发力,致力于培养一支在政治素

质、业务能力、育人水平以及师德师风方面都卓越的高素质、专业化和创新型高职教师队伍,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业的时代新人提供师资保障和人才支撑,最终实现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党建强、师风正、育人优”的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参考文献:

[1]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的通知[J].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2019(12):22-26.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4-8-27(1).

[3]刘平,邓雅婷,张开富.新时代高校党建引领师德师风建设路径研究[J].高教学刊,2023(9):168-171.

[4]黄龙泉,王磊.全员育人视域下“四融四进”赋能师德师风建构路径研究[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4,37(1):50-52.

[5]李苗苗.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师德师风提升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22.

[6]郭勤英.新常态下高职院校师德师风评价机制的评析与重建[J].教育与职业,2018(1):75-77.

[7]李健芸.新时代高职院校师德师风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以罗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9(2):5-7.

A Study on Foster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Conduct Through High-quality Party Building

ZHENG Tian-zhu, YOU Su-qing

(Basic Course Department, Hebei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Xingtai Hebei 054000, China)

Abstract: As the main frontline for cultivating high-caliber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in China,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inge the success of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on the ethical and professional integrity of their teaching staff—an issue that bears directly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How, then, to ensure that Party building lead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ethics and conduct in these colleges in the new era has become a pivotal question for advancing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overall. It is therefore imperative to fully recognize the central role of Party building in this endeavor, to analyze both its intrinsic value and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it faces, and to forge an integrated optimization path of “ideological soul-casting, Party-building consolidation, organizational strengthening, and innovation empowerment”.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build a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 teaching corp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at is marked by robust Party building, upright teacher conduct, and excellent educational outcome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arty-building leadership;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conduct; path research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建设历程研究

杨琳琳^{1,2}

(1.天津传媒学院,天津 301901;2.南开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

[摘要]党的领导法规制度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力抓手和制度保障。从发展历程来看,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建设共历经了四个历史时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法规制度体系。纵观这一历史进程,党的领导制度法规建设随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而与时俱进,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艰难奠基,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曲折发展,再到改革开放后的极大提升,及至新时代,党的领导法规制度更加体系化、规范化。由此可知,这一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领导法规;制度建设;历程

[作者简介]杨琳琳,女,天津传媒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中共党史、党建。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3017>

[中图分类号] D262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奠基初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胜利。因此,这一时期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建设的主题是确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以夺取革命胜利。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所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是具有党章性质的第一部党内法规。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的第一个比较完备的章程,较为明确地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1923年,党的三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虽然该组织法规定较为笼统,但是作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对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建设进行规定的法规性文件,有着里程碑性质。组织法对党的领导工作规则等作出了严格规定,强调“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局之一切规定,以多数取决”,明确了中央领导机构的领导方式与组织原则。此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的领导法规还常常以通告、决议案等形式出现。这些通告、决议案都对党各项工作的领导与开展作出一些规定,对于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

大革命失败后,党汲取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掌握革命武装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开始围绕党的领导权问题制定相关法规制度。1927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明确中央委员会

设置,将集体决策制度化。并通过构建中央、省、市/县、区、支部五级组织体系,保障自上而下的领导。此外,首设监察委员会专章,规范党内处分程序,以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标志着党对领导权理论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1928年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对党的领导机关如何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作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如“下级党部与高级党部由党员大会、代表会议及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之”“各级党部对选举自己的党员,应作定期的报告”等。这些举措,对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第一次提出“党内法规”这一重要概念。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和《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党内法规。这三个党内法规文件,涵盖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党的组织机构和代表大会制度、党内生活制度等,对政治决策纪律、政治执行纪律、政治宣传纪律、政治保密纪律等都作出了具体详细的规定,有力地巩固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党内处理各种违纪案件提供了较为完善的基础性法规。

此后,为了适应革命环境,发展和壮大党的组织和武装力量,中共中央先后出台了有关请示报告

制度详细规定的领导法规,建立了请示报告制度,要求各地党政军一把手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并对综合报告的内容和注意事项提出了明确要求。请示报告制度在全党、全军的普遍建立和贯彻执行,极大地增强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维护了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的高度统一,保证了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决议的贯彻执行,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建设是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密切相关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规范和约束自身领导的法规制度,不仅确保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同时也为后续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曲折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加强国家政权建设的迫切任务。党如何领导政府开展工作是这一时期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建设的主要方面。

为了适应在全国范围执政的需要,1949年11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等,基本沿袭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党的一元化领导制度,在中央和地方政权机关中设立党委和党组。党委和党组的设立有力地保证了党中央对人民政府的领导,为完成土地革命遗留任务、肃清反革命、稳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提供了制度保障。1953年3月,中共中央又颁布了关于加强党对政府工作领导和进一步完善请示报告制度的决定,对于政府工作的具体方法给出了明确的要求,例如必须要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例如,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对宣传部门的人员编制和职责范围进行明确规定,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定出计划,在一两年内逐步充实宣传部的机构与人力”,培养专门担任宣传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干部,负责群众宣传、理论教育、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党的领导人开始关注到党规与国法的关系。中共中央认为,共产党员“必须是遵守国家法令的模范”,触犯法律的党员不仅要受到国家法律的惩处,“还将受到党的纪律的严重制裁”,体现了党纪与法纪的建设理念,筑牢了管党治党的又一道防线。中共中央讨论通过的《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中强调指出,要在党内加强纪律教育,“使党员、干部严格地遵守党纪,实行党的决议与政府法

令,以实现全党的统一与集中”。这些规定不仅是对党的领导法规内容的完善,也推动了党的领导法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逐步发展和完善。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领导法规建设的规范性、稳定性不断增强,为新时代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恢复前进

这一时期,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建设也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尤其是党内立法的颁布使党的领导法规稳定性、规范性都得到了较大的提升。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正式恢复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同志为首的由一百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明确中央纪委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党中央通过建立和健全党的纪律检查部门,讨论并拟定党内政治生活的一系列准则,在恢复探索中不断地丰富党的领导法规的建设内容。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和推进,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着手改革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政治工作和领导方式等入手,多次完善坚持党的领导法规制度。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对发扬党内民主等领导体制方面作出全面部署。特别是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理论层面进一步规范了党的领导法规制度,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建设的新发展。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党内法规”这一概念首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规定下来。该《条例》还对党内法规的名称、制定主体和制定程序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有力地推动了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的规范化和程序化。

为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十四大党章、十五大党章都对党的领导提出了新的要求,如“党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断改进领导方式和方法,提高领导水平”。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这一历史课题。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着力提出,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党的领导法规涉及政治、

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多部领导,既保证了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又推进了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建设进入到新阶段。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推进优化

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了贯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重要精神,党中央不断加强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建设,与时俱进地解决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问题。党采取的主要措施,一方面是对党内法规进行集中清理;另一方面,是坚持主干先行、急用先立,推动关键核心领域制定修订了一批基础主干党的领导法规。无论是党的领导法规的质量还是数量,都有着明显的提升,实现了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建设的体系化发展。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进行顶层设计,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党的领导法规体系化建设。首先,出台党内法规制定规范。2013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明确党内法规的定位和性质,对党内法规制定的主体、权限、原则、程序等具体内容进行了详细规定。这部党内“立法法”,对推动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建设,规范其制定程序,提升科学水平具有重要作用。随后,依照最新制定的党内法规制定规范,展开党内法规清理工作。2013年7月和2014年10月,中共中央分两次对已经过时的、不再适用的党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集中清理,为后续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建设的质量提供了基本保障。

在着手开展党内法规清理工作的同时,党中央与时俱进,加快制定党内法规建设规划,进一步完善了党的领导法规制度。2013年11月,党内法规工作第一个五年规划出台,要求经过五年时间基本形成体系,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提供坚实制度保障。2016年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以及2018年党内法规第二个五年规划出台,要求建成完善的“1+4”党内法规体系,以出台主干法规为主线任务,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建设也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近20部基础骨干领导法规逐步建立,覆盖党领导农村工作、宣传工作、组织工作、政法工作、社会治理等各个方面,有力地保证了党的领导法规制度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协调性。

请示报告制度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结合实际工作要求,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制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全党必须严格执行重大问题请示报告制度”,并对需要报告的各个组织和部门、报告事项、报告对象

提出相应的要求,但此时对于报告事项中某些要求仍表述得过于宏观,缺乏具体的规定。2019年1月,中共中央制定出台《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弥补了先前这一漏洞,对所规定“重大事项”作出了详细的解释。此外,该条例还对请示报告的主体、应请示报告的事项、请示报告的程序等作出了明晰的规定,有利于请示报告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

此外,党领导法治建设工作也取得较大进展。2016年2月,中共中央出台《关于加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意见》,对党领导立法的具体方式作出规定,不断优化法治人才队伍结构,提升法治人才队伍建设质量。2016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健全司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保护机制。通过权责统一、监督问责机制等强化党政主要负责人的法治建设主体责任,对将党的领导贯穿依法治国全过程,推进社会法治建设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一时期,中共中央还制定出台了《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2018年12月)、《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2019年8月)、《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2019年1月)、《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2019年6月)、《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2020年9月),修订《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2020年12月)、《军队政治工作条例》(2021年2月)等领导法规。党的领导法规制度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基本实现全覆盖,形成了涵盖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重要领域的制度体系。

综上所述,历览党的百年领导法规制度建设,是一个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始终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法规制度的建设历程。党的领导制度法规建设永远在路上。这是与时俱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与活力,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 [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五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 [3]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汇编(1949年10月—2016年12月)(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
- [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出版社,2014.

[7]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

[6]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出版社,2019.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Regulations and Systems over the Past Centur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YANG Lin-lin^{1,2}

(1. Tianjin Universi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Tianjin 301901;

2. Nankai University Intra-Party Regulations Research Center,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e Party's leadership regulations and systems are powerful means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for enhancing the Party's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level, as well as strengthening its advanced nature and pu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regulations and systems has gone through four historical periods over the past century, forming a system of leadership regulations and system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roughout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system and regulations has kept pace with the times in response to the historical tasks of different periods. From the arduous initial establishment, to the tortuous development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n to th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stability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regulation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finally to the systematic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regulations after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is syste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th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continuously carry out self-revolution and solve the unique problems of the major Party.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ading regulations; system construction; journey

“三全育人”视域下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 协同育人现状及对策研究

张伟

(西南林业大学机械与交通学院,云南昆明 650224)

[摘要]“三全育人”理念引领下,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作为关键主体,其协同效能直接影响育人目标的实现。然而,当前二者协同面临传统科层制管理与新时代育人需求间的结构性矛盾。本研究深入剖析上述困境的制度逻辑与行动困境,提出构建“价值认同—制度保障—技术赋能—激励驱动”的协同生态系统性创新路径,激活两支队伍协同育人的深层动力与持久效能,有效促进两支队伍优势互补、同向同行,实现从物理协同到化学融合的质变,为破解高校思政教育“孤岛效应”、培养时代新人提供可操作的实践范式,为深化“三全育人”改革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三全育人;辅导员;思政课教师;协同育人

[作者简介]张伟(1987—),男,云南丽江人,西南林业大学机械与交通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涯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5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思政课研究专项“立德树人理念下高校生涯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5J0658);西南林业大学2023年度校级文科科研项目“高校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协同育人机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WKYB2316)。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3018>

[中图分类号] G641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引言

“三全育人”理念要求破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间的壁垒,推动育人主体、育人环节、育人场域“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深度协同与效能提升,从而构建一个有机统一的育人体系。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作为思政教育的骨干力量,其能否发挥有效协同,直接关乎“三全育人”目标的实现。然而,现实中,尽管两支队伍的育人目标一致,但因角色定位、管理体系、工作逻辑的显著差异,协同育人中仍面临深层矛盾与挑战,呈现出“应然协同”与“实然割裂”的悖论。本研究聚焦“三全育人”,深度剖析了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协同育人的现实困境,探索系统构建可操作、可持续的协同机制,整合育人资源,凝聚育人合力,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精准滴灌”与“入脑入心”效果的显著增强。

一、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协同育人的价值意蕴

(一)实现“全员育人”主体耦合与功能互补的核心支撑

辅导员作为日常思政教育“主阵地”与思政课教师作为理论教育“主渠道”是“全员育人”的关键主体。二者协同能有效弥合“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理论认知”与“行为实践”、“课堂教育”与“生

活浸润”之间的鸿沟,实现育人功能的优势互补与同频共振。协同是克服单一主体局限性,即思政课教师重理论轻实践、辅导员重管理轻理论,形成育人合力的必然要求,符合“三全育人”对育人主体协同联动的本质要求。

(二)贯通“全过程育人”链条与消除育人断点的关键环节

“三全育人”强调育人贯穿学生成长全过程。将思政课教学的集中性、阶段性特点与辅导员日常引导的持续性、渗透性特点有效衔接,是确保思政教育“不断线”、价值引导“无真空”的核心。协同能通过辅导员提供的学情动态支撑解决理论教学与学生思想动态、现实困惑脱节的问题,也能通过思政课教师提供的理论支撑解决日常教育缺乏理论深度和系统性的问题,从而实现理论学习与实践体验的闭环,促进“知信行”统一。

(三)拓展“全方位育人”场域与资源整合的有效途径

“三全育人”要求覆盖学生学习生活全方位场域。协同能打破“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物理与心理壁垒,将思政教育的触角延伸至社会实践、网络空间、宿舍社区、社团活动等更广阔场域。促

进思政课教师掌握的理论教学资源、案例资源与辅导员掌握的学生数据、实践资源、问题资源等育人资源的深度融合与高效利用,实现育人资源的“供给侧改革”与精准投放。

(四)驱动两支队伍专业化发展与育人能力跃升的内生动力

协同为思政课教师提供了深入了解学生思想行为、提升教学针对性和亲和力的实践场域;为辅导员提供了系统理论学习、提升思想引领深度和专业研究能力的宝贵机会。打破“条块分割”导致的路径依赖,促进双方在知识结构、能力素养、工作方法上的相互学习借鉴,共同向“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标准迈进。

二、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协同育人的现实困境

(一)目标耦合困境:角色认知偏差与协同内生动力不足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学科化发展客观上促成了两支队伍在职能定位、发展路径与评价体系上的结构性分化。思政课教师主要承担课堂理论讲授与学术研究,通常被视为“理论传授者”;而辅导员则侧重学生日常管理和行为引导,被视为“实践管理者”。这种职责架构的二元化,不仅固化了两者的工作场域和思维模式,更容易衍生出对彼此工作价值的理解偏差。由此产生的认知与实践脱节,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角色定位的自我固化与互认偏差。思政课教师更侧重于理论体系的讲授,其向实践场域的延伸常显不足;辅导员则偏向事务的应对与处理,其工作蕴含的理论指引价值常被遮蔽或低估。双方对自身及对方在整个育人体系中应然角色的理解均存在显著偏差。二是协同意愿的普遍低迷与行动乏力。两支队伍对协同必要性的认同程度普遍不高,部分思政课教师将协同视为额外负担,辅导员则存在因对自身职能边界的固理解而衍生的被动甚至抵触。三是共育目标的价值共识尚显薄弱。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价值排序上,双方尚未达成高度一致且内化于心的共同愿景与责任担当意识,未能形成休戚与共的使命共同体。究其根源,这种协同困境反映了学术导向的理论产出目标与服务导向的管理服务目标之间的差异,两种逻辑主导下的目标设定迥异,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相容与行动协同,最终导致协同内驱力目标耦合失效,这构成了“全员育人”理念在价值认同层面必须直面并化解的结构性难题。

(二)结构性障碍困境:管理体制二元割裂与协同机制缺位

现行高校思政工作体系的科层制架构,深刻影响了育人主体的组织归属与行动逻辑。思政课教

师隶属马克思主义学院,其工作逻辑侧重于知识生产与理论传播;辅导员则归属学生工作处主导的管理行政系统,侧重学生事务处理与校园秩序维护。这种基于学术与行政二元管理制度,客观上预设了协同的鸿沟,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制度层面的协同缺位。校级统筹机构与常态化运行机制普遍缺失,跨部门决策通道不畅,导致“全方位”协同缺乏必要的制度支撑。其二,育人要素流动的制度化阻滞。学生思想动态数据、典型育人案例库、课程实践资源等关键育人要素分属不同系统,形成“信息孤岛”,阻碍了育人要素的有效流动与动态共享,极大抬高了协同育人的“流动成本”。其三,评价指挥棒的激励偏差。思政课教师的“指挥棒”强力牵引其专注教学任务和科研成果,而辅导员的“考核表”则显著倾斜于危机事件响应速度、日常事务完成度等量化指标。双方的评价体系均严重忽视甚至排斥对跨主体协同育人实际贡献的有效度量。这种系统性激励缺位,必然诱导两支队伍将资源与精力持续内卷于各自系统的“绩效锦标赛”之中,与协同育人的整体目标渐行渐远。由此可见,学术逻辑的“知识本位”与行政逻辑的“事功导向”在评价维度的深刻断裂,并非简单的标准错位,而是反映了高校内部治理中两种核心价值排序的潜在冲突。

(三)互动渠道困境:平台载体匮乏与信息共享不畅

即便在理念共识与制度设计层面达成统一,育人主体间的有效协同也必然依赖于平台载体才能实现工作联系、功能交叉和行动协调。审视当下实践,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之间的协作主要依赖碎片化、偶发性的非正式人际互动,常态化、高效率的线上线下互动平台载体严重匮乏。这种载体缺失侵蚀了“全过程”协同的连续性根基,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信息共享存在障碍。思政课教师的理论阐释往往悬浮于学生真实思想图景之上,辅导员时常陷入经验主义窠臼,难以系统提升干预的解释力,双方在关键育人信息上的非对称割裂,严重影响了育人响应的精准性与时效性。二是深度协同行动乏力。缺乏孕育深度协作的载体(如联合备课、专题案例研讨、系统性学情分析)来支撑深度协作。线下协调受时空成本约束,而线上交互难以承载复杂知识交换与策略共研。三是资源流通与转化不畅。辅导员深耕一线所积淀的实践资源与思政课教师淬炼的理论资源,因缺乏共享机制与转化路径,难以实现互补与整合,降低了其整体育人价值。“全过程”协同的本质在于育人要素无缝衔接与育人场景平滑切换。正是由于支撑这一要素的“基座”孱弱,使得“全过程”缺乏关键连接,最终导

致协同链条呈现难以弥合的裂隙。

(四)可持续性困境:评价激励导向偏差与协同价值失落

“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现行评价体系的“指挥棒”未能有效引导协同行为,导致“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协同丧失根本动力。原因有三:其一,评价缺位引致行为偏差。协同工作未被纳入正式考核或权重不足,形成“做与不做一个样”的认知误区。其二,标准缺失导致评价失准。缺乏可量化、可验证的协同成效评价体系,导致“做好做坏难衡量”成为普遍困境。其三,产权模糊,成果归属困难。联合开发的课程资源、研究成果等协同产出面临知识产权归属难题。长此以往,当制度评价否定协同劳动的价值再生产,“三全育人”的可持续运行机制必然退化为仪式性的敷衍应付。

三、“三全育人”视域下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协同育人的机制创新路径

(一)理念重塑:凝聚协同价值共识,构建育人共同体

理念是协同行动的先导。破解角色壁垒需以“三全育人”理念为引领,构建目标一致、互信共融的育人共同体。

深化理论武装与使命认同。通过专题培训、深度研讨会等形式,系统阐释“三全育人”理念的核心要义与时代价值,引导两支队伍把握“三全育人”强化其对协同育人的高度认同,推动两支队伍从“理论传授者”与“事务管理者”的角色固化中跳脱,深刻认识协同育人对立德树人的战略意义,破除“重理论轻实践”“重管理轻引领”的思维定式。

培育协同文化与情感联结。倡导“互为主体、责任共担、成果共享”的协同文化,通过联合教研、学情共研、跨岗实践(如思政教师兼任班主任、辅导员参与课程辅助)等常态化互动,在真实育人场景中增进理解、建立信任,为共同体建设夯实情感与认知基础。

推进目标协同落地。校院两级需围绕育人目标一体化设计,将协同指标(如联合教研频次、学生成长反馈)科学分解至双方工作计划与考核体系,驱动两支队伍在实践中同向发力、优势互补,形成“目标共担、荣辱与共”的育人命运共同体。

(二)制度重构:打破管理壁垒,构建一体化运行体系

协同,是指两种或更多资源协同一致、有序地达成某项目标的动态过程。要弥合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的协同鸿沟,实现“全员参与、全过程连贯、全方位覆盖”的目标,关键在于撬动高校治理体系的深层结构,打破传统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构建

权责清晰、运行高效、保障有力的协同育人体系。

加强顶层设计与组织保障。建立由分管思政工作和学生工作的校领导共同牵头的“思政协同治理委员会”,成员包括马克思主义学院、学工部、教务处、人事处、信息中心等核心部门负责人。负责统筹协同育人规划和政策制定,跨部门资源调配,破除部门主义壁垒。同时,打造实体化“育人协同赋能中心”,具体负责孵化创新协同模式、维护智能协同平台、整合育人数据及协同成效评估反馈等,确保协同机制有效运转。

探索新型组织运行模式。推行“项目制”运作模式。围绕理想信念教育、生涯规划、网络素养等育人主题,动态组建由思政课教师(理论策源)、辅导员(实践锚定)、相关专业教师(知识赋能)及学生骨干(朋辈洞察)构成的微型跨域作战单元。深化“双导师制”。将思政课教师纳入学生班级导师、社团导师、社会实践导师体系,将其理论优势深度“编织”进学生成长的真实情境。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的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联席会议,聚焦深度学情分析、共性育人问题研判、协同工作计划制定及实施效果评估,形成问题共商、信息共享、行动协同的工作闭环。

优化资源配置。突破传统“专项经费”思维,定向支持联合教研、协同实践项目、平台开发等核心协同项目群。推动办公空间、活动场所、数据信息等软硬件资源的跨部门共享,为协同体系运行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此番制度重构,绝非简单的管理优化,而是系统推动高校思政工作治理模式从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向协同共治、一体运行的治理转型,为两支队伍深度协同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三)平台升级:打造智慧协同枢纽,畅通互动共享渠道

构建虚实融合的智慧化平台,是破解信息孤岛、互动阻滞的关键载体。

建设数字协同平台。集成学情动态数据库、教学资源库、案例共享库的一体化云平台,嵌入在线备课、项目管理模块,形成“数据集合—业务支撑—协同交互”的一体化架构。运用人工智能分析协同频次、资源调用率等数据,生成效能报告,赋能管理模式向数据化、精细化演进,同时实施隐私保护,通过权限分级与脱敏处理保障数据安全。

拓展实体协同场景。打造多层次实体协同网络。依托“联合教研工作坊”,围绕社会热点、网络沉迷干预等议题共建案例库;构建“理论—实践—反哺”的育人闭环,通过“知行合一”实践活动,共同指导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实施“双向嵌入”机制,由辅导员旁听思政课反馈学情,思政课教师参与班

团活动、宿舍走访。

强化虚实联动。开发数据集成平台支撑实践项目档案、课堂观察数据、研究成果的自动同步,形成记录学生成长轨迹的多维数据平台,进而推动实体活动数据化与数字资源场景化融合。

(四)评价牵引:构建协同导向的激励体系,激发内生动力

协同长效化的核心是将协同行为纳入职业发展全周期,重构以效能为核心的评价激励机制。

融入职业发展全周期。在职称评审、职务晋升中明确协同贡献量化指标(如联合教研频次、共建资源质量、学生成长反馈);年度绩效考核增设“协同育人成效”模块,结果联动绩效分配与评优评先,推动协同从“弹性义务”转为“刚性责任”。

构建多维评价模型。科学评价需构建以过程性维度、结果性维度、增值性维度三维度测量模型。过程维度关注互动频率、项目进度;结果维度评估课程获奖、学生认知改善等显性成果;增值维度衡量学生思政素养个体提升。同时配套“成果双认”机制(协同产出计入双方业绩)形成物质激励、荣誉认可、发展支持的激励机制,驱动协同从“被动响应”升级为“价值自觉”。

四、结论

本研究立足“三全育人”理念,从角色认知偏差导致的目标耦合困境、管理体制割裂形成的结构性障碍、平台载体匮乏引发的互动渠道不畅以及评价激励缺乏带来的可持续性危机四个方面系统剖析了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协同育人面临的深层困境。这些困境本质是高校思政教育体系在向“全员、全

过程、全方位”协同转型中,传统体制机制与新时代育人要求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针对上述困境,本研究提出系统性改革路径:构建以理念共识凝聚育人合力为基础,以制度体系重构破除部门壁垒为核心,以互动平台升级拓展沟通渠道为支撑,以评价机制创新驱动内生动力为保障的协同育人新生态,通过强化价值认同构筑育人共同体,打破部门壁垒构建一体化制度体系,打造沟通平台畅通交互渠道,创新评价机制激发内生动力。唯有如此,方能真正实现两支队伍优势互补、同向同行,切实将“三全育人”要求转化为育人效能,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支撑,也为高校破解协同难题贡献可操作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 [1]谢桂花,张正阳.辅导员队伍与思政课教师队伍协同育人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3,39(6):164-168.
- [2]胡绪明.高校思政课教师与辅导员协同育人的功能定位及实施对策[J].学术论坛,2018,41(4):174-180.
- [3]陈燕美.辅导员参与思政课教学的路径[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3,45(S2):231-233.
- [4]唐亚林,嵇江夏.工作专班制:一种基于事务解决导向与反科层制逻辑的新型治理机制[J].理论学刊,2023(4):76-89.
- [5]李德龙,李林哲.高校思政课教师与辅导员协同育人的实践维度考究[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4(3):144-149,156.
- [6]陈武元,吴彬.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育人的路径探析[J].中国高等教育,2023(1):42-45.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Counselor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stru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ZHANG Wei

(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Transportation,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224, China)

Abstract: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Thre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all-round education involving everyone, throughout the process and across all areas), the collaborative effectiveness of counselor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as key subjects, directly affects the re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goals. However, the two currently face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bureaucracy management and the needs of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is study deeply analyzes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action dilemmas of the above difficulties, proposes to build a collaborative ecosystem innovation path of “value recognition—institutional guarantee—technology empowerment—incentive drive”, activates the deep motivation and last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two teams i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of the two teams and makes them walk in the same direction, and realizes a qualitative change from physical coordination to chemical integration, so as to provide an operational practical paradigm for solving the “Island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cultivating new people of the time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 for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re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Key words: Thre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counsel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的耦合逻辑

马嘉艺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济南 250000)

[摘要]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的融合绝非简单叠加,而是基于内在逻辑的深度“耦合”,形成了两者之间相互激发、彼此成就的动态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耦合根基,在于实践第一和知行合一的统一,辩证思维和对立统一的融合,唯物史观与民本思想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耦合愿景,是社会理想的深层共鸣,均强调天下大同、公平正义和集体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在实践层面展现出强大的融合力,耦合路径包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整体协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耦合是动态融合、创造性升华的过程,其最高理论成果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飞跃,符合“两个结合”的根本遵循。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华文明;耦合升华;“两个结合”

[作者简介]马嘉艺(2003—),女,山东临沂人,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3019>

[中图分类号] A81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马克思主义凭借其真理性,为绵延千年的中华文明注入了蓬勃生机,使其焕发出新的时代活力;与此同时,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则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使得这一源自异域的学说得以在东方沃土上深深扎根并蓬勃发展。在人类思想发展的浩瀚星空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犹如两颗璀璨的星辰。当马克思主义于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这片古老土地,它并未成为“异质”的植入,而是与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产生了深刻的共鸣与融合。这种融合绝非简单的叠加,而是基于内在逻辑的深度“耦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核之间相互激发、彼此成就的动态辩证关系。探究这一耦合逻辑,不仅是对历史必然性的深刻解读,更是理解当代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独特性的关键密钥。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耦合根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核的耦合根基,是哲学智慧的深度契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石,与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哲学思辨传统存在着令人惊叹的呼应。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强调的实践第一,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核强调的知行合一具有统一性

马克思在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文章中,旗帜鲜明地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与发展。实践第一这一马克思主义精髓与中华文明中源远流长的“知行观”高度契合。从孔子《论语·公冶长》中“听其言而观其行”的务实,到荀子《荀子·儒效》中“知之不若行之”的强调,再到王阳明心学中的“知行合一”的系统阐述,都深刻体现了对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执着追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核都反对空谈玄想,崇尚实干兴邦,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指导革命与建设实践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土壤。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正是这一耦合在革命语境下的光辉典范,邓小平同志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也详细阐明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强调的辩证思维,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核强调的对立统一具有统一性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要义包括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普遍法则。中华文明中,《易经》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孙子兵法》的“奇正相

生”等思想,无不闪耀着朴素而深刻的辩证法光辉。这种强调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民在面对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复杂矛盾时,具有天然的领悟力和接受度;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强调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各种辩证关系,更容易被中华文明滋润的中国人民所接受和吸纳,继而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运用辩证思维和矛盾分析法观察中国国情,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定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策略的哲学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强调的唯物史观,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核强调的民本思想具有统一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物质生产活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人民主体思想,与中华文明中根深蒂固的“民本”思想传统形成了深刻的共鸣。从《尚书》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孟子《孟子·尽心下》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荀子·王制》中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治国警醒,都体现出中华文明传统思想对民众力量与地位的高度重视。尽管传统民本思想有其历史局限性,存在着一些服务于君主统治的“色彩”,但其对民心向背决定国家兴衰的深刻认识,为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被广泛认同,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底蕴和心理基础。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人民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民本思想精华融合升华的结晶。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耦合愿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核的耦合愿景,是社会理想的深层共鸣。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没有剥削压迫、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与中华文明中对理想社会形态的孜孜追求,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心灵共振。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核均强调天下大同,成为跨越时空的终极向往

马克思主义思想存在对私有制弊端的深刻批判,以及对共产主义社会“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构想,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这种天下大同的价值取向,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核存在深刻的契合。《礼记·礼运》中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理想社会图景,代表了中华先贤对公平、正义、共享社会的最高向往。这种“大同”理想,蕴含着对私有制导致社会不公的批判,以及对一个财产公有、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人安居乐业社会的憧憬。康有为的

《大同书》更是试图在近代语境下系统阐述这一理想,具体描写了“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人类社会远景。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都指向了对一个超越阶级对立、实现普遍福祉的美好未来的追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古老的“大同”理想注入了科学内涵和实现路径,使其从一种朦胧的愿望升华为具有科学理论支撑和实践可能性的奋斗目标。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核均强调公平正义,成为社会伦理的共同基石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剥削的非正义性,并致力于建立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制度。中华文明同样将“公平正义”视为核心伦理价值和社会治理的基石。孔子的《论语·季氏》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墨子的《先秦·墨子》倡导“兼相爱,交相利”,法家《韩非子·有度》强调“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历代农民起义也常以“均贫富”为口号。公平正义是千百年来人类不懈追求的一种美好社会理想和愿望,这种对公平、正义、平等的普遍诉求,成为中国人民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剥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实现更广泛社会公正这一主张的重要情感和伦理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正是对公平正义这种深厚社会心理期待的回应与制度性实现。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核均强调集体主义,成为对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共同理解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强调个人自由发展的同时,深刻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个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而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具有鲜明的集体主义倾向,强调个人对家庭、社群、国家和天下的责任与担当,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序列。从孔子的《论语·雍也》中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到孟子《孟子·梁惠王上》中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思想,本质上都是一种基于群体和谐的伦理观。这种重视集体利益、强调个人融入集体、在集体发展中实现个人价值的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必须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实现的思想,在强调个体与群体辩证统一关系上达成了高度的内在一致性,这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强调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耦合路径

马克思主义是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其具

备科学性与实践性高度统一的特征,而中华文明同样具有深厚的实用理性和经世致用传统,两者在实践层面展现出强大的融合力,两者的耦合路径实现了实践理性的高度融合。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核均强调实事求是,成为思想路线的共同精髓

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思想将其精辟概括为“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与中华文明中源远流长的“经世致用”“务实求真”传统一脉相承。从王充《论衡·薄葬》中的“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的实证精神,到顾炎武“经学即理学”“引古筹今”的治学主张,再到清代“实学”思潮,均体现了反对空疏、崇尚实证、追求实效的理性态度。这种强大的务实传统在中国近代史革命中得到充分体现,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避免了教条主义的陷阱。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核均强调与时俱进,成为生生不息的创新品格

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理论体系。恩格斯在《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中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中华文明同样具有革新精神和变革智慧,从《礼记·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到《诗经·大雅·文王》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种强调因时损益、革故鼎新的文化基因,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逐步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创新精神、创新实践相结合,不断回应时代课题、引领实践发展的光辉历程。这一过程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耦合逻辑在理论创新层面的生动体现。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核均强调整体协调,成为治理智慧的方法论交融

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发展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需要系统思维和统筹协调。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擅长从整体、系统、关联的角度观察和处理问题。中医的阴阳五行、整体辩证施治,传统治理中的“调和鼎鼐”“统筹兼顾”,工程实践中的综合各类因素全面考量,无不体现着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特征。这种整体协调观与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方法论相融合,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方略。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统筹发展与安全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体现了对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各环节进行系统谋划、协同推进的整体性思维,这是中华传统治理智慧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耦合的升华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涵的耦合,不是静态的并存,而是动态融合、创造性升华的过程,其最高理论成果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飞跃。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耦合升华,符合“两个结合”的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为我们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进行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明确要求、指明了前进方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经验,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其中,“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揭示了耦合逻辑的核心地位。这一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获得了丰厚的文化滋养和民族形式,从而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同时,也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了其现代价值。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耦合升华的伟大创造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耦合升华的伟大创造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长期耦合互动中结出的最丰硕果实。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具体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等方面。

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优势相结合,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发展规律的遵循,又融入了中华文明中关于经世济民、宏观调控的智慧。

二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思想,更结合中国实际,发展出包括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协商民主等多种形式在内的民主体系,其中蕴含着中华文明“民惟邦本”“和而不同”“集思广益”的政治智慧。

三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与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精华相融合,升华为新时代的执政理念,指导着共同富裕、民生保障等重大实践。

四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终极关怀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又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和合共生”的宇宙观和天下观,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五是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耦合升华,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功,内在地包含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与创造性激活。这种自信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建立在深刻理解自身文明基因、善于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基础上的开放包容与守正创新。它使我们能够更加从容、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精神内核的耦合,是一场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相遇与深刻融合。它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主动的文明再造。这一耦合升华,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和强大的生命力,也使中华文明在时

代激荡中实现了凤凰涅槃般的现代转型。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耦合逻辑,我们才能更清晰地读懂中国的过去、现在,也才能更自信地开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未来。在“两个结合”的光辉旗帜指引下,这一耦合进程必将继续深化,为解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提供不竭的思想源泉和实践动力,最终引领中华民族在不可逆转的复兴之路上铸就新的辉煌。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23.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3] 王一阁, 周菲.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明创新[J]. 长白学刊, 2023(5): 141-148.
- [4] 陈翠云.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探赜[J]. 文化学刊, 2025(5): 182-185.
- [5] 骆小婷. 习近平法治思想人民性的理论特征、内在意义和实践要求[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5, 38(10): 132-133, 164.
- [6] 包凤玲, 李兴利.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5, 38(8): 122-124, 131.
- [7] 章文军.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人民性意蕴[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5, 38(8): 141-143.

The Coupling Logic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MA Jia-yi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00,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Marxism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by no means a simple superposition, but rather a deep “coupling” based on internal logic, forming a dynamic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of mutual stimulation and mutual achievement between the two.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upling between Marxism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lies in the unity of putting practice first and integrating knowledge with action, the fusion of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the unity of opposites, and the unit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people-oriented thought. The vision of the coupling of Marxism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a deep resonance of social ideals, both emphasizing universal harmony,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collectivism. Marxism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have demonstrated a strong integration force at the practical level. The coupling paths include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overall coordination. The coupling of Marxism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a dynamic integration and creative elevation process. Its highes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is the great leap of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which conforms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wo combinations”.

Key words: Marxism; Chinese civilization; coupled sublimation; “two combinations”

革命文化涵养民族复兴的逻辑理路

宋世伟

(西南财经大学,四川成都 611130)

[摘要]革命文化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历史必然,构成民族复兴的逻辑起点。民族复兴是国家富强的精神根基,是民族振兴的价值内核和人民幸福的实践指南。民族文化是推动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因素。革命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文化涵养民族复兴具有其内在逻辑,以革命文化续庚国家富强,锻造民族振兴,夯实人民幸福。革命文化为民族复兴构建“价值坐标”,贯通“时空脉络”,锚定“力量源泉”。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成为革命文化涵养民族复兴的逻辑实践。

[关键词]革命文化;民族复兴;逻辑理路

[作者简介]宋世伟,女,河北沧州人,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3020>

[中图分类号] D26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革命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党内政治文化,要以革命文化为源头。没有革命文化的底蕴和滋养,信仰信念就难以深沉而执着。党的十九大、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继承弘扬革命文化进行了明确部署,并且明确使用了“革命文化”的提法。这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文化理论话语体系规范化建构的坚定意志,更从实践维度折射出党对推动新时代革命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战略考量。话语体系的规范统一,既强化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引领,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历史纵深与理论支撑,将革命文化提升到前所未有之高度。当前,全球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破局关键。民族复兴之路归根到底就是探索中华民族自己的发展之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阶段,深刻理解和把握革命文化,用革命文化涵养民族复兴,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革命文化涵养民族复兴的逻辑起点

尽管革命文化与民族复兴之间存在着实践指向差异和时空错位,然而透过革命文化的历史演进和民族复兴的意涵,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极度关联性。革命文化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群众创造的一种文化,它是一种以服务于中国民主革命实践为主的先进文化。而民族

复兴则贯穿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民族发展史,是中华民族在近代历经磨难后,重新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实现全面振兴的历史进程。由是观之,革命文化构成民族复兴的逻辑起点。

(一) 革命文化的历史演进

革命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厚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识。探索革命文化的缘起和以西柏坡精神为代表的革命文化,对追寻革命文化的历史演进具有重要意义。

1. 革命文化的缘起

革命文化的产生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历史必然。革命文化的产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实现中国化的必然结果。早在巴黎公社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西学东渐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被引入我国。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国内更多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苏俄。中国共产党开始创办《共产党》《向导》等报刊,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诸如《唯物史观解说》《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同时编写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不仅如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并取得创造性理论成果。“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战争,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些创造性理论成果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文化印记,有力推动了中国工农革命运动的

发展,革命文化也应理而生。

2.以西柏坡精神为代表的空间叙事

西柏坡精神基因解码。西柏坡是中国红色革命圣地,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孕育出伟大的西柏坡精神。西柏坡时期,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并自觉制定和完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传播人民当家做主的文化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历史转折期,西柏坡精神逐渐形成,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基因。西柏坡精神汇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精神,更体现了西柏坡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成果,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西柏坡精神凸显民族精神和创新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实践中形成的,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风貌和精神气质的总和。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是西柏坡精神的重要内涵。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西柏坡时期开启由农村包围城市转向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探索,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无不凝聚着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

(二)民族复兴的意涵

民族复兴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中理论武器是关键,领导力量是核心,道路选择是基础。三者紧密相连,相互依存,共同构成民族复兴的关键支撑,将民族复兴的蓝图绘成现实。

1.民族复兴的理论武器

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用坚船利炮叩开近代中国的大门,自此西方思想陆续传入我国。无数仁人志士提出各种方案试图挽救民族危亡,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以致有人说:“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兴),其他种种所开药方,非不善也,奈中国材料不配何!”。直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民族走上复兴之路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不断焕发蓬勃生机,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发展创造性思维,最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成为民族复兴的理论武器。

2.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

中华民族近代史是一部救亡图存的民族自救史,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纷纷走上政治舞台,领导中国人民救亡图存。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抵御外民族入侵的斗争中不屈不挠,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在斗争中探索出的道路,最终都因阶级局限性而以失败告终。民族复兴的领导重任最终指向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中,领导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努力实现民主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历史已经证明并将一直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3.民族复兴的道路选择

近代以降,在各种历史思潮和领导力量的指引下,民族复兴的道路可谓历经坎坷。“你方唱罢我登台”,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选择一波三折,在历史舞台中央,上演了一部又一部可歌可泣的历史诗篇。十月革命影响下,社会主义思潮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在经历了“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问题”的论争后,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华民族在探索中前进,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才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出一条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将成为民族复兴的道路选择。

二、革命文化涵养民族复兴的必然逻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不是简单的经济总量增长或军事实力扩张,而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系统性跃升。三者之间既构成民族复兴的核心内涵,又与革命文化具有深刻逻辑关联。

(一)革命文化是国家富强的精神根基

革命文化的终极追求与现代化强国的建设目标具有历史统一性。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推翻“三座大山”的物质诉求,到改革开放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战略部署,本质上都指向国家富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革命文化是民族复兴的源头活水,是国家富强的精神根基。继承和弘扬以红船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为代表的革命文化,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积聚磅礴力量。

革命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国家富强的发展逻辑相契合。精神动力层面,革命文化蕴含着坚定的理

想信念与无畏的奋斗精神。在国家富强的征程中,这些精神激励着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复兴而不懈努力。价值引领层面,革命文化强调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等价值观,与国家富强所倡导的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等理念相呼应。这种契合的价值观增强了人民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目标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文化传承层面,革命文化是国家富强的文化根基。它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延续着民族精神血脉,通过传承与弘扬革命文化,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在走向国家富强道路上保持文化自信。同时,国家富强的发展理念为革命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与广阔的发展空间,使革命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二) 革命文化是民族振兴的价值内核

革命文化是推动民族振兴的重要力量。纵观世界历史,任何民族的振兴都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崛起。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但是到近代,中华文化被认为是“落后”的,自此失去文化上的话语权。但是,革命文化的产生成为凝聚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文化力量,为民族振兴提供契机。实现民族振兴,就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以革命文化为重要内容的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推动民族振兴。

革命文化为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文化支撑。革命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特殊历史形态,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谱系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意义。革命文化形成的时代背景决定其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革命气息。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首次提出“革命文化”这一概念,认为革命文化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革命文化这一战线在大国竞争与民族振兴的当代依然持续焕发生机,为中华民族提升国际话语权,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强大文化支撑。

(三) 革命文化是人民幸福的实践指南

革命文化是共同富裕的精神纽带,贯穿于共同富裕的全过程。《淮南子·汜论训》中有言:“治国无常,而利民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上的一个环节,而是切实将人民幸福的福祉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革命文化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智慧与丰富的价值观念,激励着中华

民族为共同富裕目标而不懈奋斗的步伐。申言之,革命文化的价值导向对共同富裕具有引领作用。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更是精神世界的丰富。革命文化倡导公平、正义、平等的价值观念,这与共同富裕追求的社会公平正义目标高度契合。经济发展过程中,革命文化警醒人们注重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避免贫富差距扩大。革命文化可以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幸福观,使共同富裕的实现更加注重新社会和谐。

革命文化是民生福祉的文化营养,彰显以人为本的文化立场。《共产党宣言》提出“每个人自由发展”的理想,这一理想在实践中转化为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设计。革命文化蕴含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精神,激励着中华民族在追求美好生活的道路上奋勇前行。此外,革命文化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和红色基因,通过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将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传递给下一代。这不仅有助于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让青年一代珍惜当下幸福生活,努力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以此为民生福祉的持续提升注入新的活力与希望,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三、革命文化涵养民族复兴的实践逻辑

革命文化涵养民族复兴的实践逻辑,本质上是将革命文化的历史资源转化为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动能。革命文化不仅为民族复兴提供了精神坐标,更在中华民族现代化征程的语境中建构起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叙事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复兴进入“强起来”的历史方位。在全球化发展遭遇瓶颈的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为全人类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了一套全新方案,并印证了“文明型崛起”的历史可能性。

(一) 革命文化涵养民族复兴的愿景

革命文化构建民族复兴的“价值坐标”。革命文化从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中孕育而生,承载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崇高理想与无畏勇气,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奋勇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历史长河中,先辈们秉持着为国家谋富强,为民族谋振兴,为人民谋幸福的理想信念,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镶嵌在革命文化的幕布上,成为构建民族复兴的“价值坐标”。革命文化中“为人民服务”宗旨、“集体主义”原则以及“艰苦奋斗”精神,镌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敬业”“诚信”的内涵之中。革命文化与民族复兴实现历史合理性与现实正当性的高度统一。革命文化以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历史叙事,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走向

复兴之路的历史必然。

革命文化贯通民族复兴的“时空脉络”。从历史的纵深处回望,革命文化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以燎原之火点燃中华民族反抗压迫、追求解放的希望。从五四运动的爱国思潮,到南昌起义的第一枪,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延安的艰苦岁月,革命文化贯通民族危亡后奋起抗争的一次次征程,始终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坚固精神纽带。革命文化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赋予其时代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革命文化的创造性融合。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到新时代的“乡村振兴”,革命文化的时代智慧始终为民族复兴提供方法论支撑。

革命文化锚定民族复兴的“力量源泉”。革命文化蕴含的价值观,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行为指引。革命文化通过“共同富裕”等目标,将个人利益统一于民族复兴之中,实现革命文化传承与民族复兴双向赋能。从延安时期“豆选法”到现代化进程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革命文化中的基层民主智慧持续激活社会治理创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主流价值取向。以雷锋为榜样,以焦裕禄为楷模的“正能量”,指引着中华民族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坚守初心。在历史新起点,革命文化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推动中华民族在世界赛道实现新的跨越。

(二) 革命文化涵养民族复兴的现实路径

革命文化是民族复兴的逻辑起点,民族复兴是革命文化兴盛的逻辑底色。“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革命文化涵养民族复兴就是要坚持以革命精神作为方法论指导,解决民族复兴路上遇到的各种挑战,为民族复兴创造必要条件。民族复兴是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非线性叠加,分别决定了民族复兴的上限、品质和根基。在百年大变局中,只有坚持三者有机统一,才能走好可持续的民族复兴之路。

第一,坚持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植根于中华大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实践中丰富和发展,是一条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革命文化特征的新时代发展道路。坚持中国道路,就是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

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要充分挖掘和利用革命文化资源,将其转化为推动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通过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建设革命文化场馆、保护革命历史遗址等多种方式,让革命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让广大人民群众深刻了解革命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增强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从而更加自觉地投身于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

第二,弘扬中国精神。中国精神具体指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国精神是凝聚中国力量,推动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革命文化作为中国精神的生动体现,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为民族复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绝不是空想者的遐想,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想,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特定内涵的群体意识和目标指向。在新的历史征程中,坚持中国精神就是要将革命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动力。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激发全民族的爱国热情,凝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以改革创新为核心,培育全民族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为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只有坚持中国精神,才能让革命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第三,凝聚中国力量。中国力量是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是推动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伟力。革命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纽带,深刻体现了中国力量的深厚内涵。恩格斯认为,“历史结果”是无数单个意志“合力”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基于此,要实现民族复兴这一历史结果,就要将各方力量汇集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来,凝聚中国力量,形成时代合力。革命战争时期,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文化的感召下,汇聚起推翻“三座大山”的磅礴力量。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华儿女在革命文化激励下艰苦奋斗,为国家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革命文化依然是凝聚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的重要精神支柱。以革命文化为纽带,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共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参考文献:

- [1] 黄远庸. 远生遗著[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24: 134.
-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708.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1516.

[4]胡长青.近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现象梳理[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12):66-69,82.

[5]朱育和.民族复兴与中国共产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76.

[6]习近平.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访问欧洲四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时的演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7.

[7]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7-2(2).

[8]秦浩.革命文化:中华民族最为独特的精神标识[J].红旗文稿,2016(17):13-14.

[9]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系统性创造性时效性[N].人民日报,2017-1-7(1).

[1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1.

[11]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课题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伟大复兴[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7.

[12]郑自立.革命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17-18.

[13]孙冲亚,高福进.革命文化认同的逻辑、挑战及其推进路径[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2):18-25,107.

The Logic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to Nurture National Rejuvenation

SONG Shi-wei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Sichuan 611130, China)

Abstract: Revolutionary culture, rooted in profou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form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national rejuvenation. As the spiritual cornerstone of national prosperity, national rejuvenation serves as both the value essence of national revitalization and a practical compass for people's well-being. National culture acts as a pivotal force in advancing this grand endeavor. Being an integral component of national culture, revolutionary culture inherently nurtures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rough its intrinsic logic. By sustaining national prosperity, forging ethnic revitalization, and consolidating people's happiness, revolutionary culture establishes "value coordinates", connects "temporal-spatial threads", and anchors "sources of strength" for national rejuvenation. Upholding the Chinese path, promoting the Chinese spirit, and rallying Chinese strength constitute the logical practice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in nurturing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 words: revolutionary culture; national rejuvenation; logical reasoning

“人情”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消极影响及应对措施研究

陈鸿宇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 410000)

[摘要]“人情”作为谈及中国社会文化时不可剥离的一词,在千百年来已经深深融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交往形式、办事规则之中。人情,是指人的情感、世情、常情以及人与人之间相处所产生的隐形规则等。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政府机关和公务体系中,“人情”的功利性一面被无限扩大,逐渐异化为一种获取资源与便利的工具,成为衍生不良风气和腐败现象的温床,对党风廉政建设起到了无法忽视的消极影响。需从四方面着手应对“人情”的消极影响,通过教育引导树立正确价值观;通过完善制度消除人情应用空间;通过强化监督提高人情应用风险;通过抓住领导干部重点发挥带头作用。

[关键词]人情;腐败;党风廉政建设

[作者简介]陈鸿宇(1999—),男,吉林辉南人,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廉政学。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3021>

[中图分类号] D262.6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受地理气候条件、历史文化因素等的影响,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人情氛围特别浓郁的社会,“人情”二字充斥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交往方式之中。“人情”一词,既有情感性的一面,也有功利性的一面。千百年来,中国文化所提倡的人情观旨在引导世人注重人的情感、情谊、情分等方面,这也与中国社会中一脉相承的人情文化所契合,是其情感性一面的正确弘扬。而在党风廉政建设领域中,“人情”一词却经常发挥着其功利性一面的作用,成为某些党员干部为了维护个人或圈子利益而使用的工具和滋生贪污腐败的温床。“人情”一词本无褒贬,它既可以是人们赖以维系情感的纽带,又可能成为通往贪污腐败和不公正的桥梁,关键在于能否以科学的价值观念对待人情、严格的规章制度限制人情、广泛的监督审查打击人情。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大家生活在社会上,都有亲戚、朋友、熟人、同事、上级、下属等,推进工作、解决问题时时都会面对原则和人情的选择。”可见,党员干部在工作中难免会遭遇人情困境,如何有效应对“人情”及其在党风廉政建设领域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课题。

一、何为“人情”

(一)“人情”的定义

所谓人情,是指人的感情表现以及人的常情、世情;情谊、情面等。细分来讲,人情有八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人的感情,《礼记·礼运》中借孔子之口解释了人情的含义:“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什么是人情?喜欢、愤

怒、哀苦、恐惧、爱好、厌恶、欲望,这七种情感用不着学习生来就有,这里的人情便是人的感情这一层面的含义。二是指人之常情,即世间约定俗成的事理标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对世事洞悉明了也是一门学问,对人情熟悉通达就能化作文章,这里的人情便是人之常情、事理标准的意思。三是指人心,即众人的情绪、愿望等。《北齐书·卢文伟传》中写道:“善於抚接,好行小惠,是以所在颇得人情。”卢文伟善于抚安,好行小惠,所以在任职之地颇得民心,这里的人情便是指人心。四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情分,宋朝的陆游在《舟中口占》中言:“业力顿消知学进,人情愈薄身身轻。”五是指民情与民间风俗。《史记·李斯列传》中载“且赵君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适朕”。这里是说赵高了解民情。六是指情面与交情。清代文学家李渔在《奈何天·计左》中言:“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待人应留情面,以便日后相处,这里的人情便是指情面、交情。七是指应酬与交际往来。清代文学家沈复在《浮生六记·坎坷记愁》中言:“处家人情,非钱不行。”当家过日子和应酬人情,没有钱是绝对不行的,这里的人情便是应酬与交际往来的意思。八是指馈赠与礼物。《元典章新集·刑部·禁骚扰》中载:“近年以来,内外诸衙门指与上司官员庆贺馈一切人情或私相追往,公然于所辖官吏俸钞科取。”这里的人情便是指人们相互赠送的礼物等。

(二)“人情”的异化

费孝通认为,在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下,人

与土地之间的不流动性,导致了不同空间中的人(或人群)彼此之间的孤立与隔膜。而在同一空间中的人及人群,则都由熟人组成,自然而然地发展出了注重人情的观念和文化。人情顽强的生命力有其历史合理性,它保证了家庭、邻里关系甚至整个社会关系的和谐有序,使中国社会带有礼治色彩。现代社会是法理社会,突出目的性;而乡土社会是情感社会,突出自然性。乡土社会中的人们离不开“熟悉”与“人情”,这也逐渐成为千百年来国人处事的方式。在乡土社会中,情感是人与人之间交往所不可或缺的东西,而在讲究公平公正、合理合法的现代社会,这恰恰成为了一种恶习与流弊。“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

中国人向来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人是社会性生物,无论是从农村到城市,从本土到他乡,从青丝到白发,任何人生阶段都离不开人情的流通。人情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渠道,是人之所以拥有社会性的本质所在。人情的存在,本是为了满足人最基本的精神需求,维持社会关系的稳定,保持内心的充盈。然而,当人情的功利性一面被无限发掘与扩大,使之成为一种办事手段和获利工具时,人情就会反过来成为人的负担。异化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是指主体演变成与自己相异的存在,反过来与自我相对立。人情的异化亦是如此,本该作为一种情感工具而存在的人情演变成一种利益工具,为了满足情感需要而进行的人情交流也势必会发展成为功利性与目的性的“人情投资”“人情回报”“人情社交”等,进而成为人情压力与人情负担。尤其是在政府机关和公务体系中,异化了的人情更是会衍生不良风气与贪污腐败,导致违法犯罪和不公正的发生。同理,人情的异化也会导致权力的异化。权力异化来自权力运行中权力所有与权力使用的背离、职位与职责的背离、公益与私利的对立。

二、“人情”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消极影响

(一)“人情”与腐败现象的联系

人情文化是诸多腐败行为得以滋生和蔓延的重要文化心理基础和社会环境因素。其一,人情是腐败行为的“温床”与“掩护”。人情为行贿者提供了看似“合情合理”的切入点(如“关心领导”“感谢帮助”),也为受贿者提供了心理慰藉(“人之常情”“盛情难却”),降低了双方的道德耻感与法律风险认知。其二,人情使腐败动机“合理化”。“知恩图报”“讲义气”“不能不给面子”等人情伦理,常被腐败分子用来为其行为辩解,模糊了是非界限。其三,人情使腐败形式“隐蔽化”。“人情”为长期性、持续性、小额多次的利益输送披上了“温情”面纱,

如通过节日、婚丧嫁娶、子女升学等节点进行利益勾兑,使得腐败行为更具隐蔽性和持续性,增加了发现和查处的难度。

(二)“人情”开辟的党员干部腐败路径

首先,介入人事任用:“任人唯亲”“裙带关系”。领导干部在选拔任用干部时,优先考虑“自己人”(亲属、同乡、同学、老部下等),而非德才兼备、群众公认者,导致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其次,干预资源配置:“打招呼”“批条子”。利用职权或影响力,为特定关系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土地审批、资金拨付、资源获取等方面提供便利或倾斜性照顾,破坏市场公平竞争。再次,扭曲执法司法:“说情风”“关系案”。对涉及亲友或关系人的案件处理中施加不当影响,干预执法、司法公正,导致有案不立、压案不查、重罪轻判或无罪开脱。最后,异化收受行为:“情感贿赂”“雅贿”。将收受他人财物行为包装在人情往来、感情投资的外衣下,如长期接受管理服务对象的宴请、旅游安排、贵重礼品(艺术品、名贵特产等)或为特定关系人“站台”牟利。

(三)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人情”困境与难题

1. 监督执行困境

首先是发现难。“人情”腐败常在小范围、熟人圈内进行,行为隐蔽,外部监督力量(如群众、媒体)难以触及。其次是核实难。利益输送常以“合法”形式(如市场交易、借贷、投资回报)或“人情”名义(如馈赠、帮助)出现,界限模糊,证据固定困难。最后是查处难。涉案人员基于人情网络形成攻守同盟,串供、销毁证据、对抗调查现象突出;“法不责众”心理导致处理尺度把握难,容易产生宽松软问题。

2. 制度虚化困境

首先是制度弹性空间被利用。即使有完善的规章制度,“人情”也能找到执行中的“灰色地带”或“例外情形”进行突破。其次是制度执行力被削弱。“熟人好办事”“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等观念盛行,导致制度在执行中变形走样,“破窗效应”显现。最后是选择性执行。涉及“自己人”或“关系户”时,制度往往被搁置或改变;反之则严格执行。

3. 价值观冲突困境

首先是角色冲突。党员干部同时作为“社会人”和“公共人”,在人情义务与公共职责之间面临艰难抉择,容易导致角色混乱和道德困境。其次是价值排序错位。“情”大于“法”、“义”高于“规”的错误观念,导致部分党员干部在面临人情压力时将私人关系置于党纪国法之上。最后是从众心理压力。在人情氛围浓厚的小环境中,坚持原则的干部可能被视为“不通人情”“不合群”,承受巨大心理压力和社交排斥,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三、党风廉政建设中“人情”问题的应对措施

(一)教育引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1. 树立正确的人情观

首先,要厘清边界。大力宣传教育,明确区分健康纯洁的人情交往与借人情之名行腐败之实的界限。强调党员干部人情交往须以党纪国法为红线,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要提升自警自省自律意识,因为同学、同行、同乡、同事等小圈子聚会,搞不好就会形成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圈子。其次,倡导“君子之交”。弘扬清爽纯洁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政商关系,推崇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反对庸俗化的“小圈子”“酒肉朋友”。最后,培育理性思维:引导党员干部理性看待人情,警惕“人情债”背后的陷阱,增强对“情感绑架”“人情围猎”的识别能力和抵抗定力。

2.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首先,强化宗旨意识。持续深化“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教育,须臾不可松懈对“权力姓公不姓私”的深刻体认,不断强化宗旨意识教育。任何将公共权力异化为个人工具,用于服务自身或小团体私利的行为,都是对人民厚重信任的无耻背叛,是对权力本质的根本颠覆。其次,破除特权思想。必须旗帜鲜明、毫无妥协地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思想及其衍生的特权现象,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形成清晰认知:更大权力必然伴随更重大职责和更严格约束,它绝不是可以肆意滥用以满足私欲的便捷工具。明确权力与责任共生共担的原则至关重要。最后,敬畏权力。必须引导党员干部清醒地认识到,权力乃双刃之剑,滥用职权、公权私用绝非低风险行为,任何以权谋私、僭越法纪之举,都将因制度的严密束缚和人民的最终问责,付出难以承受的沉重代价。要不断完善监督体系,压缩权力任性的空间。

3. 树立正确的政策观

首先,要牢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引导干部将工作实绩体现在为民办实事、解难题上,而非体现在为亲友、关系人谋取了多少特殊利益上。其次,要遵循客观规律和法治原则。强调做决策、干工作必须依法依规、实事求是,不能为了“人情”“面子”而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最后,要注重长远和整体利益。反对为了照顾个别“关系户”而损害全局利益、长远发展的短视行为。

(二)完善制度:消除人情应用的可能

1. 健全权力配置与运行制度

反腐败必须从改革权力结构入手,走制度反腐的路子。建立科学的权力制衡制度是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逻辑进路。首先,权力清单化、透明化:明晰各层级、各岗位的权力边界、责任清单和运行流程,

公开公示,压缩自由裁量权,减少暗箱操作空间。其次,落实分权制衡原则:在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等方面,严格执行集体决策、末位表态等制度,防止个人专断。

2. 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制度

首先,深化任职回避、地域回避、公务回避制度。严格执行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相关规定,切断利用人情关系谋利的直接通道。其次,完善招投标、政府采购、土地出让、资源开发等领域制度。运用电子化平台、引入第三方评估,强化信息公开,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干预。最后,规范领导干部社会交往。出台具体规定,明确领导干部接受宴请、礼品馈赠、参加活动的范围、标准和报备程序。列举领导干部、公职人员“人情往来”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加强对特定关系人从业行为的规范。

3. 完善干部选拔任用与管理制

首先,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完善干部考察考核机制,注重在重大关头、关键时刻识别干部,防止“带病提拔”。其次,严格执行干部交流轮岗制度。打破长期固化的关系网络,防止形成利益共同体。最后,落实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强化核查和结果运用,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性问题。领导干部与公职人员有关自身事项的报告要“严而实”“全而明”,严谨“形式汇报”。

(三)强化监督:提高人情应用的风险

1. 健全监督体系

一方面,强化党内监督。发挥巡视巡察利剑作用,紧盯“关键少数”,深挖利用人情关系搞腐败问题;做实日常监督,通过谈心谈话、检查抽查等方式及时掌握干部思想动态和社交情况。另一方面,贯通各类监督。加强纪检监察专责监督与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协调联动,形成监督合力。特别是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完善举报人保护机制。

2. 提升监督科技化水平

一方面,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领导干部廉政档案数据库,对干部及其关系人的财产、从业、投资等信息进行关联分析,主动发现异常情况(如特定关系人频繁中标、干部与特定商人密切资金往来等)。另一方面,建设信息化监督平台。大力推广电子政务,建设互联互通的数据共享平台,实现政务流程线上运行、可追溯、可查询,减少人为干预和人情勾兑机会。从而使权力运行关键环节全程留痕、可追溯、可预警。

3. 加大执纪执法力度

首先,坚持“零容忍”。对利用人情关系搞腐败

的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破除“人情网”“关系网”干扰,一查到底。其次,精准运用“四种形态”。抓早抓小,对在人情往来中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批评、纠正;对构成违纪违法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最后,强化通报曝光。选取利用人情关系搞腐败的典型案件进行剖析通报,发挥警示震慑作用。

(四)抓住重点:发挥领导的带头作用

1.领导干部以身作则

首先,要带头廉洁自律。领导干部必须成为践行正确人情观、权力观、政绩观的标杆,严格约束自身及亲属、身边工作人员,自觉抵制各种“人情”围猎。其次,要带头执行制度。在涉及人事、项目、资金等敏感事项时,模范遵守回避、报告等制度规定,不打招呼、不批条子、不徇私情。最后,要带头接受监督。主动将个人重大事项、家庭财产等情况置于组织和群众监督之下。

2.管好班子带好队伍

首先,落实“一岗双责”。各级党组织书记要切实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班子成员履行好分管领域责任。对队伍中出现的利用人情关系搞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敢抓敢管、严抓严管。其次,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在班子内部、同志之间形成讲原则、守规矩的良好氛围,抵制好人主义。最后,净化政治生态。“一把手”要带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坚决反对

和抵制“圈子文化”“码头文化”,以自身清正带动一方清廉。

四、结语

当前,我们不可否认中国社会中所存在且根深蒂固的“人情”问题,人情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骨子里和生活、工作方式之中。对此,要正确认识人情,在充分了解人情的内涵及其所导致的党风廉政建设领域的问题的情况下,合理对待人情。充分利用党员教育、制度完善、监督强化等实际手段来消除其在党风廉政建设领域的不良影响。抑制人情的工具性一面,发扬其情感性一面。将“人情”逐渐转化为公共服务领域中温情的代名词。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2]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 [3] 谭志坤.腐败的人情成因及其超越[J].求实,2017(5):55-65.
- [4] 侯勇,孙君.人情伦理对权力异化的作用机理及治理之策[J].河南社会科学,2021,29(12):27-36.
- [5] 邹庆国.探析党内关系异化的圈子文化之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5(5):51-57.
- [6] 李燕凌,吴松江,胡扬名.我国近年来反腐败问题研究综述[J].中国行政管理,2011(11):115-119.
- [7] 黄光国.人情与面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5(3):55-62.

Research o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RenQ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lean and Honest Party Conduct and Measures to Address It

CHEN Hong-yu

(School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00, China)

Abstract: “RenQing”, as an unavoidable term when discussing Chinese social culture, has been deeply integrated into the way of thinking, forms of communication and rules of doing things of the Chinese peopl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RenQing refers to people’s emotions, social conditions, common sense, and the hidden rules that arise from getting along with each other. In modern society, especially in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the public service system, the utilitarian aspect of “RenQing” has been infinitely expanded, gradually being alienated into a tool for obtaining resources and convenience, becoming a breeding ground for bad trends and corruption, and exerting an undeniabl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lean and honest government. Four aspects should be taken to deal with the negative impact of “RenQing”, and correct valu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rough education and guidance. Eliminate the application space of RenQing by improving the system; enhance the risk of RenQing through strengthened supervision; play a leading role by focusing on the key points of leading cadres.

Key words: RenQing; corruption; Party conduct and integrity building

生成逻辑·内容结构·时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师德师风重要论述的三维探赜

万星宇

(江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56)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师德师风重要论述的形成蕴含着独特的内在逻辑,需要在历史必然性和时代合理性的有机统一中进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师德师风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师德思想的理论赓续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师德精神的文化遗产,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宝贵师德师风经验的借鉴推进,同时包含着对习近平总书记独特人生经历的凝练体认。它深刻阐明了师德师风的核心要义、现存问题和建设理路,形成了科学系统的内容结构,在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时代新风尚、描绘高素质教师队伍队伍建设新图景、擘画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新蓝图上展现出鲜明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师德师风;生成逻辑;内容结构;时代价值

[作者简介]万星宇(1993—),女,湖北宜昌人,江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辅导员、讲师,研究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实践、师德师风建设。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汉大学校级科研专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与研究”(第三批)立项项目(项目编号:2023XYB15)。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3022>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中图分类号] G451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师德师风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一)理论赓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师德思想

教育、教师角色以及师德师风建设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重点关注、常研常新的关键领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直接系统地阐述过师德师风问题,但从其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以及阶级观点等核心要素中能够提炼出与师德师风紧密相关的深刻内容,这些要素内容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师德师风重要论述的形成夯实理论基础、厘清逻辑脉络,并从中生发出新时代师德师风的全新内涵。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强调了教师既要传授知识学问,更要注重铸魂育人,要促进人从内而外、由表及里的全面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经典表述,这一表述描绘出在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所有成员都完全充分地发挥自己才能和力量的未来图景,内隐地彰显了教师角色和教师育人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师德师风的重要论述将教育的终极目标聚焦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强调教师要成为

能在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等各个方面作示范当表率“的大先生”,促进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观点指出无产阶级道德观念不仅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更是汇聚了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道德遗产,强调了教师应该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始终忠诚于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正如恩格斯认为人们的伦理观念归根到底来自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其道德观念往往被打上历史演进和时代传承的烙印,因此教师应该始终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同时马克思主义阐明教育具有阶级性,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真正接受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有教养的资产阶级部分科学家只能盲目地接受和信仰宗教神学,正如马克思说“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资产阶级则恰好相反,“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罢了”。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影响下,习近平关于师德师风重要论述试图对资本主义社会教育与社会主义社会教育进行对比剖析,并在深刻领悟社会主义教育本质精髓的基础上,框定师德师风的政治立场和价值意涵。

(二) 文化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师德精神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秉持尊师重教、崇智尚学的优良传统。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教育理念,着重强调教师应坚持教育道德,发挥道德示范作用。孟子认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人生三大乐事之一,将教育提升至人生至乐的高度,同时评价教师“是王者师也”,将教师的社会影响力等同于君王。《荀子·大略》有云:“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把尊师重教看作国家兴盛的必要条件。扬雄在《法言·学行》有言:“师者,人之模范也。”把教师作为所有人的模范,“师范”一词就是从此处而来并沿用至今。

中华传统师德是对师生关系中道德教育活动的全面总结和“君师合一”理念的高度概括,师者不仅传授文化知识,更是学生道德精神的培育者,应该具备坚定志道、尚德品质、仁爱情怀以及广博学识,既要恪守为君之道,又要践行师者之德,既要满足道德对师德的客观要求,又要履行伦理关系中的修养义务,通过育人化人的方式实现立德、明道、至善、成性的道德境界。这一系列关于教师品质、师生关系的传统思想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涵养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

(三) 历史演进: 中国共产党师德师风的宝贵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面向全党、全军多次强调教育工作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面向全体教师提出了以高尚的品德和扎实的知识教育学生的基本要求。1917年,毛泽东在文章《体育之研究》中指出教师的言传身教可以使学生养成优良的道德品性,强调教师应以身作则,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发表讲话,重点确定了“姓党姓共”的办学治校原则,强调教师对党的教育事业必须保持绝对忠诚,要紧密围绕革命斗争和实际需求,通过知识传授与人才培养,为革命事业输送政治过硬、能力合格的干部及战士。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背景下“德才兼备”的人才标准,进一步强调“德”的极端重要性。他提出人才培养应达到“又红又专”的规格与标准,这一理念随后被纳入相关政策文件中,其中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中明确指出高等学校要努力培养“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并把认真教好学生,完成教学任务作为教师的根本任务,把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人才作为教学的重要目标。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要求在政治上“必须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提出广大教师应在提升个人政治素养和业务水平上下功夫,始终在又红又专的正确道路上坚毅前行,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这一时期,以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得以全面实施推进,师德师风建设也逐步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为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续承继中国共产党在师德师风建设上凝练的宝贵经验,瞄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远战略目标,对师德师风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党中央明确要求学校全面加强校风和师德师风建设,把德育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强调教师需在多方面发挥关键的引领作用,成为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创新思维的引路人以及奉献祖国的引路人。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师德师风建设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指明了方向,推动教师队伍在新时代展现新作为、新担当。

(四) 实践体认: 习近平总书记独特的人生经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师德师风的重要论述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有着深厚且丰富的实践基础,一方面,优良家风的长期熏陶与培育为其思想奠定了道德根基;另一方面,知青岁月的艰苦磨砺与锤炼,以及长期扎根基层的实践经历与智慧积累,共同构成了师德师风重要论述孕育生成的实践来源。

习近平总书记重视师德师风,并一以贯之地身体力行。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中记载着习近平的两位老师对他的提醒和告诫:要相信党,要守纪律,不要对老师做不恰当的事。1994年福州市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要建设一支具有“高尚的师德修养”的教师队伍,引导广大教师“进一步树立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光荣感和责任感”。2005年浙江省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建立健全有重点的师德师风教育机制,“进一步完善师德评估体系”。2007年教师节前,习近平再次强调教育始终处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求“要始终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大力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研究制定更加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当教师,努力让教师成为社会上最受尊敬、最令人向往的职业”。不论在何处工作,习近平都惦念着自己的老师。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每逢到北京便会抽出时间亲自拜访恩师、感怀老师的恩情,

他曾给自己的初中语文老师陈秋影致信,并将毛主席对其恩师徐特立老人所说的话“您过去是我的老师,现在仍然是我的老师,将来还是我的老师”写入信中。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对师德师风问题进行全面审视,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相关理论内涵,逐步构建起内涵丰富、系统完备且科学合理的师德师风理论体系。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师德师风重要论述的内容结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师德师风的重要论述围绕新时代师德师风“有何一为何一如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刻回答,阐释了新时代师德师风的核心要义、现存问题和建设理路,形成了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

(一)回答“建设怎样的师德师风”,阐明师德师风的核心要义

师德师风是指教师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师德师风的内核要义主要围绕教师素质展开,“爱国守法、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终身学习”作为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必备六条,体现了师德的本质要求和时代特征。师爱与责任两个关键内核贯穿其中,并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师德师风重要论述中得以阐发。关于师爱,习近平总书记在“四有”好老师的提法中强调要有仁爱之心,教育事业应当被视作一项“仁而爱人”的崇高事业,其核心在于以仁爱精神培育人才,好老师的核心标准应定位于“仁师”的伦理高度,缺乏教育爱心者难以企及教师职业的本质要求。有爱才有责,关于责任,习近平总书记认为选择教师职业就选择了爱与责任,好老师应当将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职业使命,具象化为日常教学与管理中的细微实践,以高度的责任感在平凡岗位上践行教育责任。

(二)回答“为什么加强师德师风”,剖析师德师风的现存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我国教育事业的深入洞察与高瞻远瞩的指导下,明确指出我国教师队伍在师德师风方面呈现出总体良好的态势。在当下的教育生态中,绝大多数教师坚定地秉持着敬业精神,这种敬业精神体现在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然而,教师队伍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应充分正视、高度重视并加以妥善解决。2019年至今,教育部先后十二次通报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的诸多典型案例,彰显了对师德违规行为“零容忍”的鲜明态度以及严肃惩处的坚定决心。通过对师德师风常见问题的梳理归纳,可以发现师德方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思想品德、学术道德和社会公德三个层面;而师风方面的问题则主要体现在学风、教风和生活作风

上。虽然这些问题仅属一定范围内的个别现象,但教师职业的特殊重要性决定了其任何不当行为都可能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因此,对于这些问题必须及时纠偏、严肃处理,以维护教师队伍的良好形象和社会声誉。

(三)回答“如何加强师德师风”,概括师德师风的建设理路

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指出师德师风建设“既要有严格制度规定,也要有日常教育督导”,为该领域的宏观建设路径提供了清晰指引。在制度构建方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作为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重要政策性文件,作出“构建完备师德师风制度体系,形成师德师风建设机制”的关键指示。《关于完善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体制机制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强调,要完善责任落实机制,根据职责权限和责任划分,对于履职不力的单位和个人,依纪依规严肃问责,确保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有效推进。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在教师群体及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宣传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弘扬其高尚品德,旨在通过榜样的力量,激励广大教师提升职业道德和个人修养,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这种刚柔并济、软硬兼施的方式,兼顾了师德师风建设的高线追求与底线管控,对于全面提升教师队伍素质、推进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师德师风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一)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时代新风尚

其一,习近平总书记师德师风重要论述指明了保障教师经济地位。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教育投入应更多向教师倾斜,持续提升教师待遇,让广大教师能够安心、热心地投身教育事业。遵循这一重要指示,从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完善中小学教师待遇保障机制,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到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进一步提出强化高中、幼儿园教师工资待遇保障,完善职业学校教师绩效工资保障制度,推进高校薪酬制度改革,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与推进是对保障教师经济地位这一指示的积极践行与回应落实。

其二,习近平总书记师德师风重要论述明确了维护教师职业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指出要让全社会深入了解教师工作的重要性与特殊性,使尊师重教成为社会风尚,同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

府热忱关心教师,让教师在岗位上充满幸福感、事业上拥有成就感、社会上具备荣誉感。基于此,各级党委和政府站在战略高度,切实重视、关心和爱护教师队伍。在实际工作中,在教师培养培训、专业发展、编制配置、职称评定、环境支持、待遇保障以及荣誉体系建设等多个关键方面提供持续且有力的支持。此外,关注教师身心健康,维护其合法权益,也逐渐成为学校、社会层面着重关心的内容。

其三,习近平总书记师德师风重要论述强调了提高教师职业声望。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考察期间,习近平指出:“教师是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的工作,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充分说明了教师及教师工作对客体“真理”和主体“人”的深刻影响。因而全社会应该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让教师获得应有的尊敬,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教师队伍建设以及全党全社会尊师重教需求更大、要求更高。习近平总书记在师德师风重要论述中多次强调重视教育,尊重教师,不断提升教师职业的社会地位,展现当代教师的良好精神风貌。只有维护师道尊严,教育才有坚实底气,国家才能迈向光明未来。

(二)描绘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新图景

其一,习近平总书记师德师风重要论述为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锚定总体目标。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教师队伍素质决定着大学办学能力和水平”,之后又系统阐述了“建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这一教师队伍建设的整体目标。这一目标既是对教师队伍建设的师德师风、知识能力、专业素养以及理想信念等方面全面要求的标定,也反映了教师队伍建设的从基本素养到专业素养的持续发展过程。

其二,习近平总书记师德师风重要论述为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指明准则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于道德败坏、贪赃枉法的“害群之马”要清除出教师队伍并依法进行惩处,对于侵害学生的行为必须坚持零容忍的态度和做法。一方面要明确教师职业道德的底线要求,即严格遵守法律以及国家相关部门所制定的教师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另一方面需强调崇高师德,以更大力度宣扬崇高师德,让更多教师向往崇高师德,将正面倡导和负面禁止、底线要求和高线追求相结合。

其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师德师风的重要论述,为构建高素质教师队伍的评价体系提供了完善依据。教育事业的发展,首要资源在于教师,其队伍建设的质量直接影响着教育的高质量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将师德师风作为评判教师队伍

素质的首要标准。这一标准源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尤其是其思想政治表现、个人道德水平及精神状态的强大示范效应,它不仅构成了强化教师思想政治建设、培育全社会尊师重教社会风尚的战略性举措,同时也为重构与完善高校教师评价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三)擘画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新蓝图

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师德师风所发表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体现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使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指出,教育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扎根中国国情办教育,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培育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目标的达成,关键一步在于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与道德水准不仅决定人才培养的方向和质量,更关系到教育强国建设的未来走向。作为知识传播者与道德示范者,教师高尚的师德与优良的师风,能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学生的品德和作风。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教师德育教育至关重要,而师德师风建设则是重中之重的核心环节。

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师德师风的重要论述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了明确的目标指引。自党的十九大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后,“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原则。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为教育事业绘就新蓝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师德师风系列论述紧密围绕这一核心方向与总体要求,在诸多重要场合深入阐释。他表明,我国教育服务于人民、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党和人民迫切所需。此外,他还强调建设教育强国“必须将教育事业置于优先发展的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进程,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战略进程标志着我国正式迈入加速推进教育现代化、迈向教育强国建设的历史新阶段。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3.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217.
-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9.
- [4]缪毅容.习近平指出要始终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 制定措施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当教师[N].解放日报,2007-9-7.

[5]霍小光,张晓松.习近平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考察时强调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 努力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J].人民教育,2016(18):6-9.

[6]习近平.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

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9-10(2).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

Generating Logic · Content Structure · Epochal Value: A Three-dimensional Exploration of the Important Exposition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on the Issue of Professional Ethics Style of Teachers

WAN Xing-yu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Jiangn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56, China)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style of work contains unique internal logic, which needs to be grasped in the organic unity of historical necessity and contemporary rationalit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style of work are the theoretical continuation of the thoughts professional ethics of the Marxist classics and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spirit of the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lso the reference and promotion of the precious experience of professional and style of work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ile containing the refined understanding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unique life experience. It profoundly elucidates the core meaning, existing problems and construction rationale of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style of work, and forms a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content structure, which shows distinct epochal value in creating a new trend of respecting teachers and education in the whole society, drawing a new picture of high-quality teacher team construction and drawing a new blueprint of strong education country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teacher ethics and style; generative logic; content structure; epochal value

民办高校“样板支部”培育创建的实践与进阶

——基于对G党支部的观察

龚渲棋,赵红梅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国际经贸学院,湖南长沙 410100)

[摘要]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教育、科技、人才定位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点,强调三大战略协同推进。在此战略导向下,职业教育亟需培育适配新兴产业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本研究基于三一集团创办的三一职院产教融合的办学实践,聚焦高校党支部作为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功能,以G党支部为样本,结合现状分析提出“样板支部”建设方案。通过优化组织架构、创新教育机制、提升服务效能三维施策,探索党建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的创新模式,为民办职业高校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范式与行动路径。

[关键词]样板支部建设;产教融合型党支部;职业教育创新;民办职业高校

[作者简介]龚渲棋(1993—),女,湖南益阳人,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国际经贸学院专任教师,硕士,研究方向:教育管理。赵红梅(1982—),女,安徽亳州人,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国际经贸学院教授,硕士,研究方向:高职教育管理。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3023>

[中图分类号] D267.6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多元化发展,民办高校已成为教育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党建工作在确保办学方向、提升治理效能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本文通过梳理近年研究成果,系统探讨民办高校党建工作的核心议题与实践创新路径。前人研究表明,民办高校党建不仅需坚守党的领导和建设的根本原则,更需与内部治理优化、文化精神培育及信息化转型深度融合,形成多维协同的发展格局。第一,党建引领与治理效能的协同发展。民办高校的治理特性决定了党建工作的核心价值。李延保(2024)指出,民办高校需在董事会决策机制中实现党的领导与依法治校的有机统一,通过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强化思政教育与政府督导功能,确保办学方向的政治性。任莹辉等(2023)进一步强调,党的政治领导力与民办高校治理需求高度契合,通过优化领导体制和组织建设,可显著提升治理效能。此类研究共同指向党建对民办高校治理结构优化的制度性支撑作用,其实践路径涵盖决策监督、思政引领与资源整合等多重维度。第二,党建档案建设的实践价值与创新策略。李转(2024)提出,党建档案不仅是党建工作的历史记录,更是推动学校发展的决策依据,需通过资源配置优化与管理方式创新提升其服务效能。於文博(2023)则指出,面对信息化时代挑战,党建档案建设需突破传统模式,探索数据驱动的动态管理方法,例如构建

“智慧党建”数据库以实现档案资源的精准利用。这些研究揭示了党建档案从“存史”向“资政”转型的必要性,强调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的双重路径。第三,现实困境与突破方向。当前民办高校党建工作仍面临多重挑战。朱江(2024)针对民办农业院校的调研显示,党组织设置松散、党员规模不足等问题制约了组织功能的发挥;任莹辉等(2023)进一步指出,学生党员参与度低、组织生活形式化等现实困境亟待破解。究其根源,既有民办机制下党建资源投入不足的客观限制,亦与工作方法创新滞后相关。对此,学者普遍主张构建“党建+”融合模式,例如将党建与专业特色结合(如“非遗+思政”实践),或通过社区化党建场景增强学生参与感。第四,创新驱动与未来研究方向。数字化转型为党建创新提供了技术支点。於文博(2023)倡导运用大数据分析党员需求,开发个性化学习平台;李转(2024)则提出“党建资源整合模型”,强调通过跨域协作(如校企党建联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综上所述,民办高校党建需进一步回应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将党建机制深度嵌入现代大学制度;二是如何通过文化载体(如校史叙事、非遗传承)增强党建认同;三是如何构建数据驱动的党建质量评估体系,实现从经验驱动向精准治理的转型。未来研究需强化实证分析,尤其关注党组织嵌入专业建设、产教融合等新兴领域的实践规律,为

民办高校党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具操作性的理论指引。本文选取了三一集团创办的三一工学院这一民办高校中的5大院系中的国际经贸学院的G党支部为载体,G党支部的发展劲头十足且领导人十分重视该党支部的发展,且该党支部的发展目标是建立样板支部,所以该党支部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支部目前共有53人,支部书记1人,副书记1人,宣传委员1人,组织委员1人,获得过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志愿服务团队等荣誉,支部书记荣获全省高校党建工作“双带头人标兵”称号。

一、G党支部党建工作的现状呈现

三一集团作为《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是全球工程机械行业领军者,以“品质改变世界”为使命,年均研发投入超营收6%,业务覆盖150余国。其旗下三一工学院是校企共建的职业高校,国际经贸学院作为三一工学院5大院系中的一个院系,聚焦跨境电商、国际工程管理等专业,培养“外语+技能+国际化”复合型人才。该院党支部依托集团党建资源,构建“党建+产业+国际化”三位一体模式:一是深化产教融合,将集团“一带一路”项目案例转化为教学资源,开设“跨境电商实务”等课程,联合开展跨境贸易技能竞赛,近三年获省级以上奖项23项;二是融合红色文化与企业文化,邀请集团高管讲授“工匠精神与党员担当”党课,结合海外建厂案例强化学生家国情怀;三是创新国际化党建,建立境外党员联络站,与集团驻外党支部共建“党建云平台”,开展跨文化沟通培训,助力学生参与“中国装备出海”实践。学生党员在海外服务中展现专业素养,学院获评省级“党建+产教融合”标杆,形成“以党建赋能企业全球化,以产业需求反哺党建创新”的良性循环,为职业高校党建服务中国智造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作为三一集团有限公司党组织体系中的基层战斗堡垒,G党支部始终以服务企业发展与人才培养为己任,通过构建“组织强基、制度赋能、数字创新、责任担当、人才兴业”的三维党建体系,成为校企协同育人的典范。第一,G党支部以清晰的架构与高效的执行力为核心,设立支委会、党小组及党员责任区,确保党建任务直达教学科研一线。党员们通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活动深化理论学习,并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服务师生的实际行动,如党员教师主动亮身份,在课堂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技术骨干成立“名师工作室”,攻克工程机械智能化改造难题,真正实现“一名党员一面旗帜”。第二,支部创新构建“积分制+三维培养”管理体系,推行党员积分制,通过“基础分+奖励分”动态考核,结合电子档案全程记录、季度核查、年度评优

的闭环机制,将积分与职称晋升、评优评先挂钩,形成“比学赶超”的良性竞争;另一方面实施“三维培养工程”,通过专题研修、跨校结对、实践锻炼三大路径,锻造出兼具政治素养与专业能力的复合型党员队伍。第三,支部将公益行动作为践行初心的实践课堂,牵头开展“关爱慢天使”特殊儿童帮扶项目,募集善款,定期组织党员与特殊儿童结对帮扶;设立“红色驿站”,为周边社区提供技能培训、就业咨询等服务。

二、G党支部对标“样板支部”的现实困境

尽管G党支部在党员教育、组织生活、服务群众等多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仍存在可提升空间与拓展潜能。应进一步提升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新能力,实现与“样板支部”的全面对标与超越。

第一,党建工作机制与体制不完善。民办高校党建工作普遍面临制度规范缺失与执行效能低下的双重困境。首先,党务机构设置不合理现象突出,多数民办高校未设立独立的党委办公室或组织部,党务职能常由行政部门代管,导致权责边界模糊。其次,制度执行流于形式,尽管国家要求建立“三会一课”、民主评议等制度,但民办高校常因管理层重视不足而简化流程,甚至出现“以会议落实会议”的形式化倾向。此外,党务干部队伍专业化水平不足,又面临“重业务轻党建”的考核压力。

第二,党员教育与管理的挑战。民办高校党员群体的多元化特征加剧了教育管理复杂性。从来源看,党员包含在校学生、专任教师、企业兼职教师及合作企业员工四类群体,利益诉求差异显著:学生党员侧重职业发展需求,教师党员关注学术科研支持,企业党员则更重视党建与业务融合。从流动性看,民办高校党员呈现“双向流动”特点——学生党员毕业即离校,企业兼职党员随项目变动频繁调动,导致党员信息更新滞后。此外,思想动态差异化问题突出,年轻党员受网络思潮影响较深,部分学生党员对“课程思政”“党建与专业融合”等议题存在认知偏差,认为“党建是形式主义”。

第三,经费与资源支持不足。民办高校党建工作的资源约束与其成本导向的办学定位密切相关。一方面,经费投入占比偏低,多数民办高校将年度预算的1%~2%用于党务工作,远低于公办高校5%~8%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硬件设施建设滞后,党建活动室设备配置以投影仪、桌椅为主,缺乏智慧党建终端、VR党史学习系统等现代化工具。更深层矛盾在于资源整合机制缺失,民办高校难以像公办高校那样获得政府专项拨款或校企共建支持。

第四,信息化建设与网络挑战。数字化浪潮

下,民办高校党建面临技术赋能与风险防控的双重博弈。从积极面看,数字技术显著提升了党建效率:如开发的“智慧党建”平台使党员学习完成率从67%提升至92%,在线组织生活会参与度增长40%。但更深层问题逐渐显现:其一,信息安全漏洞频发,曾出现学生党员信息泄露事件,可能导致网络诈骗案件。其二,教育质量参差不齐,例如,63%的在线课程停留在“视频播放+签到”层面,缺乏互动性;个别平台甚至出现“刷课产业链”,学生通过第三方软件代学代考。其三,技术依赖弱化组织功能,党支部借助直播开展主题党日,却因过度追求“点击量”,将原本2小时的研讨压缩为10分钟录播视频,导致党员参与感下降。

三、推动G党支部高质量发展的进阶路径

(一)G党支部未来建设的战略设想

“样板支部”建设是新时代高校党建与教育事业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通过机制重构与模式创新,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可推广的实践范式。“样板支部”建设是新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的创新实践,其本质是通过系统性机制重构实现党建引领与教育发展的深度融合。基于G党支部的典型案列,聚焦“组织力建设—融合发展—人才培养”三大核心维度,构建“理念创新—机制优化—实践验证”的研究框架,揭示新时代高校基层党建提质增效的可行路径。

在组织力建设层面,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遵循,更是“样板支部”建设的政治基石。党支部通过建立“标准+动态”评估体系,形成“目标设定—过程督导—成效反馈”的螺旋提升机制。创立“三会一课”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组织生活全程留痕与质量实时监控,相关经验争取纳入省级党建工作标准化建设案例库。

在融合发展实践中,支部应创新构建“党建+”双融双促模型。第一,教学改革领域设立“课程思政示范岗”,开发“红色基因微课矩阵”,培育省级一流课程。第二,科研攻关组建“党员突击队”,在国家项目申报中实现100%党员带头。第三,社会服务推行“项目认领制”,开展志愿服务,形成可复制的“需求采集—资源整合—成效评估”服务链。在融合发展实践中,应着力构建“党建引领—业务赋能—价值共生”的双轮驱动模型,使“样板支部”成为彰显新时代高校治理效能的示范窗口。

在人才培养体系中,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通过构建党建与教育事业深度互嵌的发展格局,使高质量党建成为驱动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实施“铸魂赋能”三维工程。其一,理论学习推行“书记领学+导师带学+朋辈互学”模式,建立党员成长档

案。其二,实践锻炼创设“产学研一体化”平台。其三,考核激励实行“积分制+星级评定”,将党性表现纳入教师职称评审指标体系,培育出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等典型标杆。

(二)G党支部的提升路径

1.加强党建专职人员队伍建设

健全专业化党务人才梯队是党建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支撑。首要任务是设立标准化专职岗位,确立党建工作战略支点地位,在二级学院及职能部门配置专职党建专员,构建覆盖组织策划、项目执行、日常运维的全链条管理体系。其次,实施人才强基工程,构建“引育并举”双轨机制。重点引进数字化治理经验丰富的复合型人才,同步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修与信息技术专项培训,锻造政治坚定、业务精湛、技术娴熟的新时代党务队伍。最后,建立多维激励机制,激发人才内生动力,推行绩效考核积分制,将政治表现、工作创新、信息化成效纳入干部选拔体系,完善与贡献度匹配的薪酬制度,通过荣誉表彰、职称评聘等柔性激励形成“能者上、优者奖”的良性生态。

2.优化信息化管理手段

高校党建与思政教育现代化亟需构建数字化管理新范式。首要举措是部署智能化管理系统集群,集成党员档案管理、组织生活纪实、学习资源共享、在线考评等功能模块,提升管理效能与决策科学化水平。同步推进新媒体矩阵建设,依托微信生态打造“指尖党建”平台,助力民办高校党支部标准化建设。运用数据挖掘与分析技术构建党建数据中台,实现多源数据实时分析与可视化,支撑精准决策。坚持虚实融合,线上搭建任务系统和云端社区,线下组织红色教育与企业联建活动,形成双向赋能的教育生态。最后构建三级信息安全体系,制定《智慧党建系统数据安全管理办法》等制度,采用区块链加密和动态口令技术,筑牢数据安全防线。

3.加强平台建设,丰富信息化、网络化内容

推进党建数字化转型与效能跃升需构建智慧党建生态系统。首要环节是打造智能化平台矩阵,融合5G或物联网等技术,集成资讯、教育、互动、管理功能的数智平台,实现业务流程全链条数字化改造。其次实施内容生态建设工程,建立动态更新的资源云库,整合政策解读、典型案例、红色影音等模块,开发互动答题、VR党史馆等沉浸式学习产品,构建思想性与趣味性兼备的教育场景。再次开展数字素养提升计划,构建分层培训体系,通过线上线下培训重点培养党员干部数据治理、智能应用等核心技能,推动信息技术从工具使用向思维转变。最后完善人才引进机制,制定“党建+技术”双专长

人才专项计划,通过校企联合培养、柔性引进等方式组建复合型团队,为智慧党建提供持久动能。

4.加强监督考核,确保信息化、网络化工作落到实处

高校创新构建“监督—考核—激励”三位一体长效机制提升治理效能。首要建立全周期动态监测机制,依托智慧党建平台对信息化建设进程实时跟踪评估,实施红黄牌预警制度,对滞后项目启动督导整改并通过约谈问责确保落实。同步构建“过程+结果”双轨考核体系,将党组织数字化转型成效纳入领导班子考核指标,设置量化指标并配套开发数据可视化看板。创新推行“星级评定+绩效奖金+评优评先”联动机制,对先进单位授予“智慧党建先锋单位”称号并给予经费支持,优秀个人纳入干部后备库,形成“比学赶超”良性竞争格局。

结语

民办职业高校样板支部的培育创建,既是破解民办教育党建难题的关键抓手,也是新时代职业教育“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实践载体。其研究成果将为民办高校党建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从“合规型”向“引领型”转型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对完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具有深远意义。依托三一职院产教融合办学实践,探究民办职业高校党支部作为基层战斗堡垒在协同育人中的引领作用与实践路径,G党支部以“党建强基、产业报国”为使命,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产教融合、服务社会”的特色之路。

其经验表明:高职院校党支部只有深度融入产业发展脉络,才能真正成为锻造大国工匠的熔炉、服务国家战略的先锋,为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红色引擎”。

参考文献:

[1]林颖遂.新时代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创建路径研究——以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4,24(6):58-60.

[2]张丹,赵岳,金鑫,刘艳丽.高校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路径研究——以“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创建为依托[J].时代报告,2024(9):10-12.

[3]林丽丽,张焜,孙德升.高校支部党建与思政教育工作深度融合的路径——以某高校全国样板教工党支部为例[J].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4,24(3):23-26.

[4]田万慧,杨乐,李晨毓.新时代高校党建“双创”型样板党支部创建实践与探索——以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为例[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4,23(13):274-276.

[5]范雪琦,叶润泽.新时代高校基层党支部品牌化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以“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创建为例[J].中国军转民,2024(10):90-92.

[6]王婉婷.高校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创建的探索与实践——以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党支部为例[J].世纪桥,2024(10):105-107.

[7]刘红凛.信息化时代的政党重塑与党的建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8]吴剑飞.新时代高校党建特色品牌创建路径——基于上海高校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的分析[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23,25(4):118-121.

Practice and Progress in the Cultivation and Creation of “Model Party Branches” in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 Observation of G Party Branch

GONG Xuan-qi, ZHAO Hong-mei

(International Trade College, Hunan Sany Industrial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Changsha Hunan 410100, China)

Abstrac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positioned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as strategic fulcrums for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emphasizing the coordinated advancement of the three strategies. Under this strategic orient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urgently needs to cultivate compound high-skilled talents that are compatible with emerging industries.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practice of Sany Group's Sany Vocational College, focuses on the core functions of university party branches as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Taking G Party Branch as a sample, it proposes a “model Party branch” construction plan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current situation analysis and innovative measures in three dimensions: optimizing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nnovating educational mechanisms, and enhancing service efficiency. It explores an innovative model for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Party building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viding a practical model and action path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ivate vocational colleges.

Key words: model Party branch constructio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Party branch; innov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private vocational colleges